

俄汉文学翻译变异研究

赵艳秋◎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责任编辑 唐 敏
封面设计 马晓霞 杨智仁


ISBN 978-7-309
9 787309 100761
定价：20.00元
www.fudanpress.com.cn



本书由复旦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俄汉文学翻译变异研究

赵艳秋◎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汉文学翻译变异研究/赵艳秋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309-10076-1

Ⅰ.俄… Ⅱ.赵… Ⅲ.俄语-文学翻译-研究 Ⅳ.①H355.9②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5501 号

俄汉文学翻译变异研究
赵艳秋 著
责任编辑/唐 敏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625 字数 126 千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076-1/H·2168
定价:20.00 元

序

俄罗斯翻译理论家加尔博夫斯基(Н. К. Гарбовский)在《翻译理论》(莫斯科大学出版社,2004 年)一书中写道:"翻译理论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的框架,因为所研究对象的特点要求吸收诸如逻辑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这证明了翻译作为对象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由不同的学科进行研究。……翻译研究需要跨学科的方法。"(同上,第 205—206 页)诚哉斯言!它概括地指明了当今翻译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跨学科的方法。

赵艳秋同志的专著《俄汉文学翻译变异研究》就是顺应这一趋势完成的。她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对翻译本质这一翻译理论中传统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探讨,取得了新的成果。不过,赵艳秋这次"超出了"语言学的框架,跨出了很大的一步。这一步并非跨入与语言学相关联的诸如逻辑学、文化学等人文科学,而是跨入了看似与翻译理论风马牛不相及的生物学!生物学有何"知识和方法"可供翻译理论工作者借鉴呢?赵艳秋作出了回答,她深受生物学变异现象启发,借用生物变异相关性、历史性和连续性三大特征观照翻译活动,认为翻译活动也有这三大特征。在专著中她逐一展开了这三大特征在翻译活动中的体现及其对这一活动的影响和作用。之后,作者强调,翻译变异并非她个人的心血来潮和生搬硬套,翻译变异是有理论依据的。翻译变异现象源自源语文本的开放性、两种语言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和译者个性等因素。但是这些导致翻译变异的因素不应该引发无限度的变异。翻译的变异是有限度的,即常言所谓的万变不离其宗。变异虽然林林

总总，但不得离其“宗”，这里的“宗”就是原著。据此，作者质疑传统的非此即彼的等值翻译观，指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译自同一部原著的译本可以是“变异”的，即多样的。以上种种在赵艳秋的专著中均有深入、全面、详细的论述，且配有丰富的例证，在此不再赘述。

巧的是，俄罗斯翻译学理论家莫杰斯托夫（В. С. Модестов）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他在《文艺翻译：历史、理论、实践》（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出版社，2006 年）一书中断言：“文学作品的原著只有一种，它是独一无二的，而它的译文，即与原著相似的，相互之间也相似的译本可能多的是。”（同上，第 28 页）作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列举了莎士比亚 129 首十四行诗的两句结尾及其十四个译文。此地为节约篇幅计，决定取其八例，一则以英译俄的译例佐证赵艳秋的观点，二则以飨同好。

原著		All this the world well knows, yet none knows well. To shun the heaven that leads men to this hell.
译文一	Н. Гербель	Всё это знает мир, хотя никто не знает, Как неба избежать, что в ад нас посылает.
译文二	А. Фёдоров	Для мира путь известный, Но всех приводит в ад его соблазн небесный.
译文三	С. Маршак	Всё это так. Но избежит ли грешный Небесных врат, ведущих в ад кромешный?
译文四	А. Финкель	Всё это знают. Только не хотят Покинуть рай, ведущий прямо в ад.
译文五	И. Гамарьян	Проторенным путем иду я — прямо в ад,

		Но всякий раз дороге этой рад.
译文六	П. Нерлер	От века так ... Но кто свернул назад С дороги в рай, ведущей в самый ад?
译文七	Вл. Орёл	Мы это знаем, но никто из нас Себя от этой радости не спас.
译文八	И. Фрадкин	И хоть об этом знаем стар и млад — Всех манит плотский рай, ведущий в ад.

（同上，第 28—30 页）

莫杰斯托夫还对这八个译例给出了点评：

译文一　在形式上最接近原著，有种不知所措、困惑不解之感；

译文二　过来人的一丝苦笑；

译文三　明显的怀疑态度；

译文四　一种挑战，甚至隐藏的喜悦；

译文五　听起来像格言；

译文六　译文的问题具有挑衅性；

译文七　故意使作者的哲学格言"接地气"；

译文八　在结论上像莎士比亚那样紧张、坦率。（同上，第 30 页）

莫杰斯托夫认为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在每一次诠释原著时都会体现出译者的个性，他的才能、趣味、文学体验和直觉，他的敏锐的鉴别能力和许多其他组成任何一位称职艺术家个性的东西"。（同上，第 28 页）

他没有从理论上探讨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于是，我就斗胆做出个大胆的设想，倘若莫杰斯托夫欲为此找一个理论根据的话，那么赵艳秋在本书中所提出的观点或许能成为他的一个选项。

吴克礼

2013 年盛夏

前　言

翻译等值是文学翻译实践的终极目标，然而译本的多样性和重译现象的客观存在都表明要达到“翻译等值”是十分艰难的。对词与词、句与句对应关系的传统研究已经无法对翻译活动做出完美的诠释，这就迫使我们寻找新的突破点来重新审视翻译现象。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以其巨大的理论魅力影响着人类发展的各个领域。生物界普遍存在的选择、淘汰、变异现象在语言演变中同样存在，在文化更替中依然恪守，在纷繁复杂的翻译活动中也比比皆是。我们从其他学科对生物变异的引用中得到启发，总结生物变异的理论精髓，将生物变异的规律纳入到翻译研究中，为翻译研究提供一个生物学视角。

本书以“变异”为突破口，通过分析生物变异、语言变异和文化变异等普遍规律，得出结论认为：翻译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变异行为，并将之命名为“翻译变异”。为此，本书的研究任务是从生物变异的角度对翻译研究中的翻译变异作出科学的界定，同时结合生物变异属性论述翻译变异的相关属性，研究影响翻译变异的原因，分析翻译变异的限制因素，在归纳翻译对等观的基础上提出翻译变异和翻译对等的相互转化关系，从翻译变异的角度揭示目的语文本、源语文本的关系问题。

本书的研究语料以俄罗斯名著汉译本为主，主要包括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草婴、周扬、智量、力冈四个译本片断，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韦丛芜、汝龙译本片断，《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译本片断，莱蒙托夫、普希金等诗歌中译本。理论阐述方面包括生物学、文化学、文本研究、哲学阐释学等相关资料以及国内外翻译理论的相

关专著和材料等。

全书由前言、七个章节、结束语及参考文献组成。

第一章“绪论：变异和翻译研究”。在这一章中我们首先对生物变异的相关规律做了简要回顾，对语言学和文化学中有关变异的研究作了必要总结，进而论证翻译变异研究的可行性。

第二章“翻译变异的界定”。通过对翻译中有关“变异”问题研究的简要回顾，我们提出“翻译变异”的概念，并将“翻译变异”概括为译者在同一时代或者不同时代，由于各种控制因素的影响而在目的语文本中表现出来的有一定允许度的不同表达。此外，我们提出对翻译变异的研究应该是“内”“外”兼修，即联系内外界因素研究翻译变异产生的原因。

第三章“翻译变异的属性”。在对翻译变异做了必要界定之后，翻译变异的相关属性成为关注的焦点，它是翻译变异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通过研究我们明确，生物变异所具有的各种属性在翻译变异中也同样存在。这些属性包括翻译变异的相关性、翻译变异的历史性、翻译变异的连续性。其中翻译变异的相关性如同生物变异的相关变异属性一样是翻译研究中应该予以强调的重点。

第四章“翻译变异的成因”。翻译变异既然存在，则一定有它存在的原因。翻译变异和生物变异的不同之处在于翻译变异要借助有智力的人来完成。因此，译者自身的差异对翻译变异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翻译变异的研究必须将内、外界因素联系起来，不能孤立、静止地看待事物的发展，语言差异、文化差异对变异的影响也就自不待言。在翻译过程中，还有一个特殊的对象，即文本。文本自身所具有的开放性特征同样促使翻译变异的发生。根据伊瑟尔的文本开放性特征，译者在阅读文本的时候总是要对文本中的空白点和未定点加以填充和具体化，但是由于不同译者的填充方式和具体化方式是迥然有异的，所以翻译变异也就不可避免。这也是我们认为产生翻译变异的最主要原因。

第五章“翻译变异的限制”。翻译变异在所难免，翻译变异的原因也普遍存在。但尽管如此，翻译变异也是有限度的。对翻译变异的限制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本的确定性使然，另一方面是

翻译规范的有效制约。首先，文本除了自身含有大量的未定点和空白点的开放型特征之外，文本自身的封闭性和文本理念意义的客观性限制了对文本的理解。其次，正是有了翻译规范的概念，才对翻译变异的限度有了最终评判的标准，并且在评判翻译变异行为的时候要时刻考虑到翻译规范历时性制约和共时性制约两个要素。

第六章“翻译变异和翻译对等”。对翻译变异的承认并未从根本上否认翻译对等的存在。这一章中我们首先简要回顾了翻译理论中的几种翻译对等观，之后对翻译历史长河中翻译变异的显隐问题做了必要的概括，最终认为翻译对等和翻译变异之间应该是相互转化、相互制约的关系。总之，翻译变异是有限度的变异，翻译对等是建立在翻译变异基础上的相对对等。

第七章“翻译变异和目的语文本、源语文本关系研究”。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关系问题是翻译理论中一直比较关心的问题，从翻译变异角度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并不多见。实践证明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之间是既同又异的关系。它们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也正是因为有了翻译变异这个“纽带”，才把不同的目的语文本也串成了一个连续体，使不同的目的语文本之间呈现出互补的关系，它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对源语文本作无休止的阐释。

“结束语”主要是对以上所探讨的内容进行总结和概括，指出本书的主要贡献，存在的不足和今后进一步探讨和改善的问题。

此书以探索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为起点，以生物变异的相关规律为基础，巧妙地将变异核心内容有机地“植入”翻译研究中，使我们更进一步认清翻译活动的本质：翻译对等是以翻译变异为基础的，正是有了翻译变异的存在才有了翻译对等的“度”。

作者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提出“翻译变异”的概念，指出翻译变异具有生物变异一样的重要属性：相关性、历史性、连续性。从翻译变异的界定到翻译变异的成因、再到翻译变异的限制为翻译变异研究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研究体系。

2）在探讨翻译变异的过程中发现翻译变异与翻译对等并非非

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转化的关系。这一方面颠覆了传统翻译对等观一统天下的定律，另一方面也避免出现解构主义学派以来对翻译对等观彻底否定的极端。

3）将翻译变异连续性属性用于目的语文本、源语文本关系研究，指出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之间应该是一种既同又异的关系，为目的语文本关系研究找到了新的理论依据。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变异和翻译研究

本书所讨论的“变异”一词是由拉丁语“variatio”一词翻译过来的。如果按照《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对它的解释，variatio 这个词本身有 5 个含义（词典中所注明的），1. 变化，变动；2. 当作为音乐术语的时候指乐曲的变奏；3. 芭蕾舞中一种经典独舞，技术水平要求很高，节奏很快；4. ［生物术语］：变种，变异；5. ［数学术语］：微积分的主要概念。[1]而俄语辞典中对这个词的解释是另外一种情形。根据《现代俄汉双解辞典》中的词条，вариант、вариация 这两个词在作为“变体，变种”这个意义上可以视为同义词，同时还可以表示“同一事物的不同说法、做法、方案”，除此之外，вариант 还可以指“（不同版本中的）一种版本、文本”：如出版不同版本的《普希金全集》，而 вариация 依然沿袭了拉丁语词 variatio 的第 2 和第 5 个概念，即数学上的变分、音乐上的变奏。作者继续查询了《汉俄辞典》里有关 вариация、вариант 的词条，通过比较发现，在“变”下面的众多条目里，只有“变异”用于解释［生物术语］вариация 和［音乐术语］вариация。我们再来看看汉语辞典中对这些彼此相近的概念是作何解释的。

> “变异”：同种生物世代之间或同代生物不同个体之间在形态特征、生理特征等方面所表现的差异。
>
> “变种”：有两个含义：1. 早期生物分类学上指物种以下的分类单位，在特征方面与原种有一定的区别，并有一定的地理分布。现在多指在单一互相交配而生育的种群中具有不连续变异的个体；2. 比喻跟已有的形式有所变化而实质相同的错误或反

① http://www.rubricon.com/qe.asp? qtype = 1&id = 1&ii = 1&srubr = 0&fstring = вариация.

动的思潮、流派等。

“变化”：事物形态上或者本质上产生新的状况。在《礼记·中庸》中对变化的解释更为细致：“初渐谓之变，变时新旧两体俱有；变尽旧体而有新体，谓之化。”

“变通”：依据不同情况，作非原则性的变动。

“变形”：形状、格式起变化。（以上参看《现代汉语词典》，2002：77—78）

从上面罗列的各种概念中，我们发现，这样一个拉丁语舶来词在自己的释义上，因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而显示出不同程度的差异。但尽管如此，无论是英语、俄语还是汉语，都同时保留了“变异”的生物学意义。我们的研究就基于“变异”这一传统含义之上。

其实，变异这个生物学概念从它一问世就已经广泛运用于各大学科了，这与当年该词语出现的社会背景不无关系。1859 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在整个欧洲掀起了一阵滔天巨浪。达尔文所宣扬的生物进化论思想完全打破了以往多个世纪以来神学占领统治地位的时代，宣称人不是神和上帝创造的，而是生物发展的自然规律。达尔文的这一重大发现开创了生物科学的崭新局面，达尔文本人也一举成为重新书写历史、为世人所瞩目的传奇人物。正是达尔文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将生物界普遍存在着变异现象的原理告知整个人类。一个世纪以来，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学说以其强大的理论功力远远超过了生物学本身，影响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经久不衰。

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对这一理论多方面的研究和应用来看，我们能否也换一个角度审视一下翻译活动呢？试想，翻译中是否也存在大量变异现象呢？如果存在，影响翻译出现变异的原因是什么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展开了研究。如前文所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都竞相使用变异理论来解释各自学科的发展，那么变异理论的内涵是什么呢？

第一节　生 物 变 异

生物变异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说“物生其类”是指生物界普遍存在的遗传现象，那么“一娘生九子，连娘十个样”，就是指变异现象了。达尔文通过长期考察，首先发现遗传过程中有变异发生。1859 年达尔文出版了在科学发展史上有深远意义的《物种起源》，他用比较的方法研究物种变异，认为不同动物或植物内部结构或者器官具有同源性，不同动物的胚胎在早期发育中也表现出来相似性，这些都意味着它们有着共同的祖先。后来，达尔文在他的回忆录中还继续说道：“同一根源产生的生物，其性状随着它们发生变异而有分歧的趋势。”（参看毕黎，1982：78）表面看来，亲代的基本特征总是强烈地传递给子代，但仔细观察亲代和子代之间以及子代和子代之间，又出现了各种微小的变异。那么这些细小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呢？达尔文认为有三个因素：1. 生活条件的作用；2. 器官的使用和不使用；3. 相关变异原则。从他对生物变异产生原因的研究中我们发现，生物变异虽然离不开生物自身遗传因素，但是外界条件的改变也同样不容忽视，而在这些因素当中，相关变异原则最为重要。

在生物变异过程中，相关变异原则是最值得达尔文称颂的：“变异性受许多未知的定律所控制，其中相关生长大概最为重要。”（转引自戚杉，1976：33）依据这一规则，“一个有机生物的个别部分的特定形态，总是和其他部分的某些形态相联系的，虽然在表面上和这些形态似乎没有任何关联。”（转引自戚杉，1976：34）

达尔文还指出，变异丰富了遗传的内容，但不是所有的变异都是可以遗传的。在有关遗传和变异的关系问题上，达尔文认为二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这就意味着，遗传既有保持祖代特征的一面，同时又有接受“新生事物”的另一面，能把父母所受影响而发生变异的东西，程度不同地遗传给下一代。总之，达尔文有关遗传和变异的论述一方面使得“物种在一定程度上的变异性得到了证实”，另一方面，“具有不同的种特征的有机体可能有共同的祖先这一点也得

到了证实”（转引自戚杉，1976：36）。

在遗传和变异理论的基础上，达尔文进一步提出生存斗争学说。在自然界中，在广泛而复杂的生存斗争中，有利于生物本身的变异不断地得到保存，形成了新的物种。这一适者生存的原理，达尔文称为“自然选择”。自然选择建立在“变”的基础上。微小的变异只要对任何物种的个体有利，能适合于变化以后的环境，就会被保存下来。经过自然选择，每一种动物都有一套适应环境，保存自己的特殊性状。由于生物体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一部分性状发生变异，其他意想不到的变异也会连带发生。生物物种就在这样的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规律下繁衍生息。以上就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主要内容。

历史在前进，自然科学也在发展，用现代生物学的水平回头看19世纪的达尔文学说，犹如站在高山之巅俯瞰低丘。但是，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创立的确推动人类向前发展迈了一大步，而他对生物变异研究提供给我们的研究方法和启示更具有无可厚非的重要意义。

首先，对生物变异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方法论：第一，比较方法。即通过比较的方法找出生物界物种之间的差异。比较过程中，研究对象不能仅仅是同代生物、同一物种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还包括同一生物、同一物种在不同时代的个体间差异。这样一来，研究变异必须考虑到时间的因素，正是变异将不同时代的各种差异联系起来。第二，联系外界因素。即研究变异产生的原因不能仅仅局限于生物自身内部矛盾的作用，还要联系生物体生活条件的改变，也即联系外界因素考察对生物变异的影响。

其次，对生物变异的研究给我们提供很多研究问题的视角：第一，相关变异规律使我们意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个别变异，还要考虑由变异所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第二，变异和遗传相互转化是生物界不容忽视的定律。遗传巩固了变异的成绩，变异丰富了遗传的内容。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问题。第三，变异是自然选择的基础。只有存在大量的变异才能进行“适应”、“选择”、“保留”、“淘汰”，有利的变异才会保留下来，不利的变异被自然淘汰。变异是选择的前提。

第二节　语 言 变 异

生物变异规律的巨大魅力迅速波及其他各类学科。语言学也不例外。研究语言历史的历史语言学家们首次将达尔文的理论引入语言研究。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施莱赫尔（Шлегель）。语言是天然的有机体，这是施莱赫尔的著名论断。他在《达尔文学说和语言学》中明显地运用进化论，把物种与语系、亚种与方言相对应，认为物种的起源、分化和生存竞争的现象不仅在生物界可以见到，在语言史中也同样俯拾即是。

语言中的变异现象也是随处可见的。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Сепир）、布龙菲尔德（Блумфилд）等人在他们各自的《语言论》中纷纷将语言变异纳入到语言研究领域，但首先从方法论角度去认识这种现象的是拉波夫（Лабов）。受到生物变异联系外界因素的启发，拉波夫意识到不能在孤立的、静止的语言系统内部来研究语言的发展。因为这一方面会将语言与社会联系之类的因素都排除在语言的“外”的领域，结果语言研究领域变得狭窄，另一方面只关注语言的共时状态，而排除历时因素，其结果只能是把语言视作一个僵化的死系统。

起初，变异遭到来自语言系统同质说的猛烈反击，同质说的代表们认为变异说会破坏结构的系统性。尽管索绪尔承认语言的共时状态中可能存在着变异，但他仍然坚持认为这些变化是微不足道的，可以忽略不计。然而，事实证明，语言是不断演变的，语言总是要服从于某一群体的交际需要。变异正好是丰富和推动语言发展的一针强行剂，正是它使语言更加完善，使语言更能满足全社会复杂的交际需要。

语言变异研究充分吸收了生物变异的研究机制，将语言作为一个有机体进行动态而细致的研究，从而为语言发展变化作出科学的阐述。通过拉波夫细致而全面的分析，他认为，语言的发展变化首先要联系社会环境来研究，尤其是年龄、地域、人们的发音部位等控制因素，都会对语言的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也因此，才会有那么多

形形色色的变异种类。“变异成分和某种控制因素（主要是非语言的异质要素）存在着一种共变关系。”变异成分遵循一定的变异规则。按照变异规则，一个成分“A 在 x、y 的语言条件下变成 g（B）。g（B）表示一组数值，具体表现为哪一个数值由控制因素 C、D、E 来决定，”即变异成分和控制因素之间存在一种函数关系。（参看徐通锵，1991：276）其他环节则只受语言内部变异的制约。这与生物变异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是同样的道理。拉波夫成功地将这种通过观察变异的结果来归纳影响变异控制因素的方法运用到语言演变研究中，再一次为我们验证了生物变异所提供的方法论。

中国语言学家徐通锵教授抓住了拉波夫语言变异理论的精髓，大胆将其结合汉语语言演变进行研究。他一方面高度评价，再也没有谁能像拉波夫那样对语言作如此细致深入的分析；另一方面指出变异理论仍需要完善的地方是继续研究变异是如何转化为结构的。因为，语言演变离不开“转化”这一环节。徐通锵教授高度评价了语言变异研究的价值：一方面，将语言共时状态中的一些细节和社会因素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避免孤立地看待语言系统，另外一方面它为解决重要的语言理论问题开辟广阔前景。比如说，将变异引入语言研究就等于把连续性引入语言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结合历史的因素来研究语言（参看徐通锵，1991）。

值得一提的是，在语言变异理论中“有序”是核心内容。“有序”具体是说“如果有些变异形式和非语言的异质要素（例如某一社会人群、某一种风格变体）或同质的语言结构要素有某种固定的联系，即可以由一定的条件来控制，那么这些变异形式就摆脱了无序的状态而进入有序的行列，开始了它的演变进程。”（徐通锵，1991：274）“语言只有在有序的变异中才能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结构。”（同上：274）“语言演变就是无序变异与有序变异在旧结构与新结构之间的一个自组织过程：旧结构——无序变异——有序变异——无序变异——新结构。”（参看徐通锵，1987：2—8）这实际上可以看作生物变异中遗传和变异的相互转化关系的演绎。试想，在生物变异规律中，变异的成分在逐渐适应新的生存条件会被永久保留下来而转变为新的遗传基因，而这种新的遗传基因又可以继续传递给自己的后

代，完成物种的演变。可见，语言变异的研究沿袭了生物研究的方法论，通过比较大量的语言变异成分，将语言“内”的变异和语言“外”的社会因素联系在一起。

总之，语言变异理论研究也使得我们受到极大的启发：首先我们明确了变异产生于结构又受结构制约的道理，即变异要从无序状态进入有序才能完成进化。这多少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种视角，即变异是空穴来风的，但变异也不是天马行空的。另外，把变异引入语言研究可以将空间和时间这两个对立的范畴结合起来。语言变异的空间就是它与周围环境的联系，而时间就是它的持续性和变异形式所体现的先后顺序。研究变异成分中各个变异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实际上就是在时间的长度中考察语言的运转和演变。这对我们研究翻译变异也大有启发。

至此我们发现，语言变异研究在引用生物变异相关规律的时候同样非常关注几个要素：第一，语言变异要联系周围环境因素，不能孤立、静止地研究。每一种语言的变化并非自生自灭的结果，而是受到各种控制因素的影响；第二，要联系时间因素对语言进行研究，要将共时和历时因素结合起来；第三，要研究变异和有序之间的转化关系，明确变异是有序之本，有序是变异之末，二者紧密联系相拥推动语言的运转。

第三节　文 化 变 异

文化变异的概念是由人类文化学家提出来的。从 17 世纪开始，许多学者相继对文化变异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比如，文化功能学派注重文化的社会功能而忽略文化变异；人类学重点研究文化变异；美国的文化相对论者鲍艾斯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肯定了文化的高度变异性；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卡·思伯与梅·思伯夫妇比较关注人类族群的文化变异，涉猎范围包括语言、食物获取、经济体系、社会分层、性与文化、婚姻与家庭、婚后居处和亲属关系、社团与利益集团、政治组织、心理与文化、宗教与巫术以及艺术各方面的变异（参看杜杉伞译，1988）；日本的祖父江孝男以实证研究的方式探索由文化

性质所规定的人类行为(参看季红真译,1987),内容涉及人类生理反应的变异、姿势和动作的民族变异、声音和色彩知觉、时间感觉、幻觉的地域变异等。

有关文化变异的分类,许苏民概括为两种情况“一是按照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变异,二是外来文化影响下的变异”(许苏民,1990:183),吕斌则区分文化变异为“文化发明”和“文化传播”两种形式。(参看吕斌,1994:106—164)无论哪种类型,新旧文化变异的交替是不可避免的。对文化变异的选择是文化进化的重要机制。

按照吕斌的研究方法,文化模式应该是文化研究的基本单位。文化模式是“由经济、政治、精神文化三个文化组面在特定的交流方式的基础上相互联系、相互协调而构成的自主的整体”(吕斌,1994:77)。文化模式之间各个文化组面不是单独存在和发挥功能的,而是以一定的相互结合的方式作为整体来发挥作用。以发明为例。文化模式内各种文化发明的表现形式不同,比如物质上的发明、制度上的发明、观念上的发明等。但是尽管发明之间有很多差异,本质上都是信息的生产、信息的创造或重新组合。文化发明具有连续性和相关性。连续性表现为任何新的发明都是在以往的发明基础上进行,或是改造、或是重组、或是抛弃。相关性表现为一种文化发明常常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会带来许多与之相关的新发明。比如,石油是现代社会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燃料,无论是汽车、飞机、轮船还是各种化工产品都要使用石油,离了它整个社会生活都会瘫痪。但是 100 多年前,石油并不是重要的资源。它的利用和发展是缓慢而逐步进行的。起初是需求煤油,用它作为油灯的燃料。汽油经常被看作生产煤油过程中的废物被抛弃,而现在汽油已经成为交通系统中的“粮食”了。

但是文化变异也是具有偶然性的。马林诺夫斯基曾经以海船为例来说明这种偶然,他指出“构造一浮海的船只,形式上有些要素是不变的,它们是规定于它所有用的活动的性质;有些要素是可以变异的,这变异或是起于同一问题可有种种不同的办法,或是起于任何解决所附带的不十分紧要的细节”(参看费孝通,1987:21)。

有关文化变异的问题还有很多,我们通过窥视冰山的一角试图

了解整个全貌。不管文化变异的课题还将如何继续下去,文化变异同生物变异一样受到控制因素的影响必然发生,并且同样沿袭了生物变异"相关"和"连续"的属性。这正是我们从文化变异研究中得到的最重要启示。

如上,我们只是列举了变异理论在语言和文化研究中的运用。无论是语言变异还是文化变异我们总能找到生物变异规律的痕迹。如前文所述,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正以它强大的生命力继续活跃在各个领域,难怪世界著名科学家 Janine Benyus 1997 年在《向生物学习》中发出惊人的慨叹:"所有人类的体系可以向大自然学习,从中找出规律与答案。"①正是因为变异理论强有力的解释力促使我们从生物学的视角来审视同样千变万化的翻译活动。

第四节 本书的意图

"翻译很可能是整个宇宙进化过程中迄今为止最复杂的一种活动。"这是英国著名文艺批评家理查兹(I. A. Richards)的感慨。为了研究翻译活动的机制,人类从有翻译活动之初就做着不懈的努力。纵观翻译发展史,各派观点"争相斗艳"。研究者们试图通过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为翻译研究找到新的突破口。

在达尔文变异理论经久不衰的今天,在翻译研究急需寻找突破口的今天,我们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将变异引入翻译研究的观点,我们同胡庚申教授的想法不谋而合。首先肯定一点的是,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关注达尔文的进化论。因为查尔斯·达尔文所创立的进化论正是由于思想方法的突破,导致科学研究的突破,从普通现象中发现了伟大的真理。受进化论的启发,胡教授通过提出假设,进而实例论证,从而为翻译立论这样的过程,运用"适应选择"学说来重新阐释翻译的基本规律。这是胡教授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本出发点。我们知道,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内容非常丰富,而生物进化论从内容上看又包括生物变异、生存适应和物种进化三个最基本内

---

① 参看 http://www.meikao.com/zhiku.htm。

容。在胡庚申教授的理论中主要是运用“关于生物体对环境‘适应’和环境对生物体‘选择’的基本思想和原理”，对“翻译过程中译者如何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和译者如何进行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等问题进行重点研究，因此，他的观点是基于“选择”、“适应”、“生存”、“淘汰”等观念，而“与特定的‘物种进化’和‘生物变异’等关系不大”（胡庚申，2004：66）。

但是，我们也很清楚，生物进化论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变异理论，可以说变异是选择的前提，是进化的前提，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前提。反映到翻译活动当中，我们似乎可以大胆设想，译者的各种行为，包括适应、选择、保留和淘汰可以说也是建立在各种翻译变异（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将在第一章中详细论述）的基础之上。试想，如果没有那么多的翻译变异存在，译者的选择又从何谈起？如果只有一个结果存在，译者的翻译行为又何来淘汰之说？也难怪利维在其构建的“生成模式”中提出：翻译活动的特点在于它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做出决策的过程”（李德超，2004：68）。这句话的潜在之意就是说，无论是在翻译的哪个阶段，包括从原文的选择、翻译策略的确定，到翻译时具体的遣词造句，译者都需从诸多的选项中做出唯一的选择。本文的主要意图就是希望通过对翻译中变异现象的研究和分析，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翻译活动，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从前文对变异理论的分析及其在其他学科中的应用情况来看，将变异引入到翻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要研究翻译变异，必须联系翻译活动的“内”、“外”相关因素，不能孤立地观察某一个或者某一次的变异现象，要将共时和历时因素综合起来考虑，要把翻译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进行动态研究，这样翻译研究就摆脱了静止的、规定性的研究从而转向更为开放的研究模式。其次，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有机体，要研究翻译变异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被选择、被保留和被淘汰，这也正是我们验证一部译作优劣的标准。第三，要研究翻译变异，必须考察大量的翻译变异和翻译对等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这就有如生物变异的遗传和变异相互转化，语言变异和有序的相辅相成一样，只有弄清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发现生物是如何进化的，语言是如何演变的，目的语文本是如何改善的。通过前文的

相关论述，本书所要解决的问题如下：翻译变异的界定；翻译变异的相关属性描述，包括相关变异性、历史性和连续性；翻译变异的成因；翻译变异的限制；翻译变异和翻译对等的相互关系等。总之，我们希望通过对翻译变异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翻译活动的规律，并在前人对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对进入目的语文化的目的语文本间关系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这也是翻译变异连续性给我们的启示。需要指明一点的是，本书主要关注的是文学翻译问题，其他类型的翻译问题是否适用这一规律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书中所列各例不涉及对译文优劣的评判，主要为说明本书的主要观点，为学习不同译者的经验。

第二章　翻译变异的界定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如前文所述，变异最初是个生物学概念，之后被广泛用于语言学、文学、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百转千回，经久不衰。通过研究表明，各个学科沿袭变异理论一脉相承的特点是把变异作为一个纽带，对各自的研究对象作动态分析。变异是一切选择的基础，没有变异就没有选择，没有选择也就没有发展。生物的进化是这样，语言的发展是这样，文化的进步也是这样。那么翻译呢？撇开翻译是逐渐进化还是退化的问题不谈，光是翻译中存在的大量选择、适应、淘汰现象已经让我们有理由将翻译研究和变异理论联系在一起。试想，哪一个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是经过深思熟虑，谨小慎微地做着不懈的选择，哪一个译者不是要对作者负责，对原文负责，对自己负责，对读者负责，对译文负责。在译者这样精挑细选之下，才最终落笔完成了一部部精美的译作。哪一部译作不是倾注了译者的全部心血呢？如果再继续思索，那么这些选择是在什么基础上建立的呢？被选定的那个答案一定是作者认为对等的答案，可是既然它是对等的，为什么重译的译者，包括他本人再次重译的时候也不一定要用原来对等的那个选择，而是用了另外一个选择呢？那么这个选择和先前的选择又有什么区别呢？它们之间应该是什么关联？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一连串的问题不得不引发我们思考。

在没有提出翻译变异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客观存在的译本多样性问题。列维（Левый）在谈到文学翻译多样性的时候指出，文学翻译是挖掘外国文学财富的主要形式，也即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每一种语言中都可以存在同一原作的译文，其中每一个译文都有理由

希望具有独立的美学意义。”（Топер П. М,1968：658）列维认为，不管译者的主观意图如何，也不管他传达原文的确切程度如何，译者都不可避免地参与与原作者的共同创作关系中。译文带有译者创作个性的痕迹，这种个性是在另外一种民族的，或者是在另外一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它的社会和审美观点某种程度上是与作者本身的观点相区别的。翻译作品的个性化得以产生另外一种译文，它可以代表一种新的，对原作的另外一种解读。如果说，原作有几种版本的情况很少见，①那么同一原作不同译文存在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这种多样性在诗歌作品的翻译中更为明显。由于诗歌形象相对于小说形象更概括，含义和语言中表达的情感非常紧凑，而这种复杂的思想审美概念是不可能直接用另外一种语言完全重现的。由于寻找等同性而引起的译文和原文的不一致不可避免地在所有文学翻译类型中都会存在，在诗歌翻译中也不例外，诗歌翻译可以非常清晰地显现出译者的创作个性。因此，一部诗歌作品常常会出现很多对原作有不同体验的译作。像歌德（Гёте）的《迷娘之歌》（«Песня Миньоны»），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兰（Верлен. П）的《秋歌》（«Осенняя песнь»）等在当时十分流行的诗歌都有数十种译本。在俄罗斯还曾经做过一种尝试，即一部诗集的主编经常把一部诗歌的2—5个不同译本放在一起，以这种方式尽量最完整地传达所选诗人的创作才华。例如《俄罗斯诗人翻译席勒的散文诗》（«Лирическ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Шиллера в переводах русских поэтов»），主编是海尔别里（Гербель）。他强调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来选择。”（Гербель Н. В,1857, т. 1. с. VIII）这种做法一直流传至今。可见，早在18世纪末，译本多样性的情况已经非常普及。苏联翻译理论家科米萨洛夫（Комиссаров В. Н）曾经指出由不同译者或者同一译者在不同时间完成的译作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当代俄罗斯翻译理论研究者茨维林戈（Цвиллинг М. Я）更坚决地认为“没有一个译本是被认为与原文唯一对应而无法取代的。”（Цвиллинг М. Я.，1991：179—

① 俄罗斯文学中出现这种情况的例子是安德烈·别雷的长篇小说«Петербург»，这部小说有1913年、1914年和1922年的不同版本。

193）

多种译本并存的例子随处可见，而“一千个译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是事实。那么，译本多样性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译者有自己的创作个性吗？如果不是只有这样一个原因，那么引起译本多样性的真正原因还有什么呢？这又是我们心中的问号。

对翻译变异的研究同样不可避免地会和重译现象联系在一起。虽然重译基本是基于对名著重译现象的思考，但是我们希望通过名著重译这只五脏俱全的麻雀来揭示重译现象对我们的启示。对于重译现象的认识，翻译理论界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那么名著为什么要重译，重译是否是一项画蛇添足的工作？只要客观地观察一下整个翻译实践史，谁也不会否认今天的翻译译本和30年前的译本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异。即使是同一时间的不同译本似乎也难逃这样一个规律。但是如果从理论上来加以研究情况就复杂了。尽管国内外的部分研究者对变异的问题都颇感兴趣：比如以色列的图瑞（Тури）通过比较译文和原文的差异，找出影响差异的原因，以求建立一个翻译规范体系就是对变异研究的一种尝试，但他对翻译变异只是略有提及，并未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来考察；比如中国道安的“五失本”原则虽然看到了原文和译文的不一致并且允许它们的存在，但也只是重于形式，而乏于意义；比如苏联翻译理论家烈茨盖尔（Рецкер）也曾指出“在词语之间确定变异对应（传统上译为“有选择的对应”）是当译语中存在几个词，可以传达原语同一个意义的时候”；比如什维采尔（Швейцер）也认为，“影响翻译结果的变量很多，借代手法（语境同义现象）的广泛运用也决定翻译方案不可能是唯一的”等，然而，以往的研究多是基于对翻译解决方法的具体分析，例如是直接逐词翻译原文的成语，还是以目的语的相同意象替换等，而且研究者们多集中在研究原语和译语的对应问题。大部分的翻译理论家宁愿避开这个“司空见惯”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基本都是一些零散的建议或者意见，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分析。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源在于从一开始人们给翻译的定位就是追求绝对的等值，因而忽略了翻译变异的存在。我们的研究任务就是要以翻译变异为研究基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翻译问题。

第二节 翻译变异及其相关概念

在对译本多样性和重译现象充分肯定之后，我们更加确信，翻译实践中普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变异情况，只是未能从理论的高度对这一现象做深入的总结。在初步分析了变异可能产生的原因（如译者的创作个性，这也是我们第四章翻译变异的成因中将要提到的一点）之后，我们要为我们所提出的翻译变异概念作进一步界定。前文说到，翻译理论中对变异的问题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涉猎，但我们认为，翻译中对“变异”的研究还是比较模糊和零散的，并且术语繁多，有的重合，有的相异。我们有理由先对这些相关的概念作一必要的梳理。

如前文所述，“变异”作为一个舶来词，从 19 世纪末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一炮打响之后，如雨后春笋般迅速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也不例外。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以及和中国文化的相互融合，“变异”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含义，从而使得这个词极具灵活性地被相继采用。例如，我们在第一章绪论中提到过的“语言变异”、“文化变异”等。如果说，这些词语搭配还可以保证与生物学最原始的“变异”术语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话，那么，在语言的发展进程中，人们对“变异”的界定已经越来越超出原始术语概念的逻辑性和严密性，而使该术语所包含的内容略显宽泛。也就是说，人们对“变异”概念的理解越来越扩大化了，这也就使得这个词语有了越来越多的相似或者相近的概念。

翻译中研究变异的问题同样会遇到术语界定的问题。但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变异”的一个最基本特征表现为“差异性”，即同一事物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具体到翻译理论中自然而然会让我们联系到译文和原文文本之间的差异。在这种认识基础上，翻译理论中时常出现的用于表现译文和原文差异的概念实际上为数不少。例如：有译文相对于原文的“偏离”（deviation）；有译文相对于原文的“偏移”；有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有文学文本的“翻译变形”；以及中国传统译论中的“五失本”原则等。那么这些概念和我

们所说的“变异”有什么异同呢？让我们逐一来分析一下：

“偏离”多数与英语中的 deviation 相对应。首先从这个英语对应词来看显然与我们所说的 variation 是两个概念；其次，文学翻译中的偏离问题虽然针对的也是译文和原文之间的差异或者不一致问题，但大多数研究者并未将这种偏离产生的原因作比较客观的分析，即通过这些偏离去探究隐藏在偏离背后的深层原因，也许得出的结论不是评价孰对孰错，而是如何以正确的、积极的态度对待这种偏离。

“创造性叛逆”是比较文学中使用的术语，谢天振教授把“创造性”界定为“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把“叛逆”界定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1999：137）这种“叛逆”表现在形式上就是翻译中的删减、添加和意译。通常“创造性叛逆”的主体被认为是译者，在翻译中体现为译者有意而为之的行为，体现为翻译是一项极具艺术性的创造活动。但实际上“除译者外，读者和接受环境等同样是创造性叛逆的主体”。（谢天振，1999：13—14）的确，尽管本书研究的主要目的并非是翻译主体的界定，但是“创造性叛逆”的研究提醒我们引起变异的因素不应该仅仅是译者。简而言之，“创造性叛逆”包括译文相对于原文的所有不一致，甚至译文相对于原文某种程度上的背离。正是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为译者的发挥提供最广阔的自由度。然而，随之而来的疑问是，译者的自由度到底有没有限度呢？这同样也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创造性叛逆”与我们所要研究的“翻译变异”相似度最大，甚至有研究者将“翻译变异”和“创造性叛逆”作为同义词来使用，例如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 年第 6 期的一篇文章里，正标题是“文本旅行与翻译变异?”，副标题是“论加里 · 斯奈德对寒山诗的创造性‘误读’”。（即创造性叛逆，笔者注）尽管如此，我们所研究的“翻译变异”还是有区别于“创造性叛逆”的特殊属性的，具体内容请详看之后论述。

再来谈谈“翻译变形”。虽然有研究者把翻译中的变形情况具体为语言形态变形，内在逻辑形态变形和文化形态变形（参看程爱华，2001），我们也认为这样做的突出贡献在于使研究译文和原文的差异

问题具有直观性、层次感和可操作性,但是,这种“翻译变形”的研究也同样是正确和错误全盘接收,只要是表现为形态上的各种差异均归为“变形”的研究范围。国内允许译文和原文不一致的是佛经翻译理论家道安(314—385)。道安虽然能够看到两种语言的不同,允许“五失本”,但是,“他的研究只局限于从形式上要求译文比较接近汉语的规格,没能从译文的表意上作出更大的突破”。(《译学辞典》,2004:62)

上面我们所列举的各种情况并没有使用我们即将用于研究的概念“变异”,其实在翻译理论中直接使用“变异”的也不乏其人。例如,翻译理论家范·鲁文兹瓦特(van leuven-Zwfrt)用来表示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译素(transemes)之间出现的第三类转换时用的术语就是“变异”。该词的英文表达是 mutation。具体指如果两译素之间不能建立任何关系,那么就可以说出现了变异。按照范·鲁文兹瓦特的解释,变异应该有三种情况:“增加从句或短语;删除子句或短语,以及彻底改变意思”。(参看《翻译研究词典》,2005:150)显而易见,鲁文兹瓦特的“变异”将“彻底改变意思”也列为变异的表现。这在我们看来已经不是简单的“变异”而是“变化”了。而在笔者查到的一篇以“初探文学翻译的变异现象”为题的硕士论文中,作者所提到的“变异现象”仍然是指“偏离”(deviation),除了包括删减法、改译法等外,其中还包括那些错误的译文和低劣的译作。(参看易芳,2002)由此可见,翻译理论中即使使用的是“变异”这一术语,但彼此之间涵盖的内容是各有千秋。

顺便提及由华中师范大学的黄忠廉教授提出的“变译”概念。他认为变译的本质是允许有大幅度的变通,甚至是内容与形式上的“大起大落”、“断章取义”和“随意为之”。这样一来,变译包含了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以及述评、译评、改译、阐译、译写、参译等十多种形式。变译是在微观和宏观上突出“变”。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宏观上,异化全译观念已变,否定原作信息有变,凸显内容价值在变;微观上,特殊需求决定了变,译者操作促成了变,为读者对原作施变,攫取战略规约了变,变通手段展示了变,信息集约结果在变”。(参看黄忠廉,2002)尽管我们并不否认黄忠廉教授提出的这样一个

自成体系变译理论的价值，但是我们更愿意将他所指的“变译”内容归为对翻译形式的一种广义理解，即他所指出的各种变译是指广义的翻译形式。而我们的研究仍然是基于狭义的传统翻译形式之上。因此，尽管我们的变异也有“变通”的需求，但是他所认为的各种变通形式已经大大超出了我们的研究范围。

综上，通过对所列举的现有翻译理论中与“变异”相近概念的比较和分析，我们进一步对上述各“变异”概念的异同作一个大体概括：首先，所有概念一脉相承的特点都是关注译文和原文之间的差异或者不一致问题；其次，大部分研究者允许差异存在的程度不同，有的是正确、错误、差异全盘接收（如偏离），有的是有选择性地允许差异的存在（如五失本原则）。我们认为，划分正确和错误固然重要，但是如果能客观地、宽容地对待各类变异也许对翻译研究更有价值；再次，都是着眼于译文和原文之间的关系而很少或者根本不予理睬译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比如，无论是“背离”、“创造性叛逆”、“五失本”等都是译文相对于原文的表现，是关注译文和原文关系的。这样，他们对变异现象的考察都局限在译文和原文之间，而没能将译文和译文之间的差异联系起来研究，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没能将“变异”概念自身所具有的历史性包括进去，割裂了历时和共时的关系，使研究乏于单调而不够立体。我们的任务正是要为共时和历时架起一座桥梁。这正是“变异”的魅力所在。

总之，对上述概念的界定和区分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混淆发生，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即将研究的“翻译变异”作相应铺垫。

第三节　翻译变异的界定

通过以上描述，我们对翻译理论中与“变异”相关概念的主要研究内容有了初步认识。这里我们需要重申几点的是：以往的“变异”研究一定是用来描述差异性的，以往的“变异”研究大多包含翻译错误类型的，以往的“变异”研究基本都是关注译文和原文关系的。那我们又将如何界定“翻译变异”呢？

“变异”作为一个生物学概念，它所代表的是同种生物世代之间

或同代生物不同个体之间在形态特征、生理特征等方面所表现的差异。如果说“一娘生九子，九子各不同”是对变异现象的真实写照，那么我们将生物学中变异和翻译学相联系，自然而然会将“娘”同翻译过程中的“原文”或者“绝对等值的译文”相类比，把“九子”与彼此有异的不同译本相类比，也即原文的各种变异形式。如果再缩小一下范围，则所有这些译本的不同正是由形式、风格、内容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所体现的。据此，我们联系生物变异为翻译“变异”界定，即，**翻译变异是指译者在不同时代或者同一时代通过对源语文本的不同阐释，在目的语文本中有一定允许度的不同表达**。以下我们对这个概念做几点补充：

首先，研究翻译变异要考虑几个重要因素：译者、时代、原文、译文、差异。通过这个定义，我们初步判断，翻译“变异”可以将差异表现的共时和历时状态联系起来，同时也使不同的变异个体之间有了紧密的联系。这样一来，我们所界定的变异应该不仅指译文和原文差异，还包括译文和译文之间的差异。这比以往的诸如“偏离”、“创造性叛逆”、“偏移”等概念涵盖的差异范围更广。

其次，从生物学角度来看，生物的变异大体上是指在个体特征以及一些细节上表现出来的差异，包括形态特征、生理特征等。但它们在本质上代表的仍然是同一类生物，他们有着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性质的普遍特征，以此来区别不同种类的生物。这一点在语言变异中也同样体现，例如普通话的“我”和上海话“阿拉”尽管发音不同，但它们所表达的内容是一致的。再比如，即使是同样的书写形式发音也会有所不同，像东北话末尾单词常常读降调，而北京话常常带儿化音等。从这一点上来看，翻译“变异”在内容、形式、风格等方面所表现的差异可以具化为对原文中的同一语言要素的不同表达形式，并且这些不同表达形式之间的关系不应体现为孰对孰错，而只是在表达细部上有所区别，受不同控制因素的影响，突出原文的某一特征。

最后，研究翻译变异要注意方法。生物学中研究变异要联系生物的生存环境，语言学中研究变异要联系社会环境，翻译学中要研究变异同样要联系翻译变异的语言“内”“外”控制因素。根据变异的规则，变异成分往往同控制因素存在一种共变关系，因此，影响翻译

变异的各种控制因素自然而然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除此之外，变异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具有连续性和相关性的特点，因此，在研究翻译变异的时候同样要考虑到这两个属性。而通过变异所引发的其他思考我们将在以后各章中逐一论述。

第三章　翻译变异的属性

上一章中我们结合生物变异提出翻译变异的概念,并对翻译变异的界定做了几点补充说明。既然生物变异现象同翻译变异现象非常相似,那么翻译变异也应该具有生物变异同样的相关属性。

第一节　翻译变异的相关变异性

相关变异性是生物变异的一个重要属性。如前文所述,我们为翻译变异的界定是建立在达尔文对生物变异的相关研究基础之上的。变异是用来描述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所以说差异是关键。在达尔文的生物变异研究中,保证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则是相关变异法则,该原则是被达尔文极其推崇并反复强调的。比如,他在《物种起源》中曾经指出:"相关变异法则的重要性绝不能忽视,它能保证某些差异的发生。"相关变异理论是有机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规律。"我们得注意,根据相关定律,当一部分性状既发生变异,并为自然选择所累积,则其他意想不到的变异,亦将连带发生。"(参看戚杉,1976)这也就是说,生物的全部结构,在其生长和发育过程中,彼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如果有任何部分发生了轻微的变异,并且被自然选择所积累,那么其他部分也要发生变异。当一部分变异了,某些其他部分永远或几乎同时发生变异,这时它们便受相关变异的法则所支配。比如,动物中,家鸽随着它的喙长增大或减小,舌头也会增大或者减小;长肢的动物差不多一直是长毛;如果是无毛的狗,则牙齿一般不全;绵羊的绒毛越卷曲,角就越螺旋等。植物中,阔叶植物的植株整体向周围张开的范围较大,线形叶植物的植株整体较高耸苗条等。这些都是相关变异规律的具体表现。

其实,在我国汉代,对马的品种进行选择的时候曾经流传着这样

一种说法即“鼻大则肺大，肺大则能奔”，这种从外部形态可以看出内部构造，从而发现相关功能变化的方式同样也是相关变异的实际体现。如果再向前追溯，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公元前 460—377 年）曾经将有关生物相关变异的观点用于人体构造，说如果身体上有很小一部分发生病变，那么全身都会感到痛苦，原因在于身体中的各个部分是相互关联的，细部的变化会传播给所有的部分。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发现相关变异的重要意义，将它用于叙述劳动如何使猿变成人，在他看来，相关变异规则暗含着难能可贵的唯物辩证法原理。难怪达尔文高度重视生物变异的这一重要属性，在《物种起源》中反复强调。

相关变异这样一条普遍规则同样被广泛移植。如我们前文所说的语言变异。根据徐通锵教授的研究，“和阶级、年龄、风格等社会因素一起共变的变异成分的变异也可能会在语言系统中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徐通锵，1991：278）这正是相关变异法则在语言演变中的体现。文化变异也同样离不开这一规则。比如，吕斌在他的《文化进化导论》中将发明视为文化变异的一种形式。他认为，一种文化发明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会带来许多与之相关的新变异或者导致与之相抵触的文化因素的失效。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内部相互联系着的体系，一种新发明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加，还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与失效的文化信息相联系，在功能上协调的一切文化信息也将会相继失效，而与新的文化发明相适应、相协调的文化发明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并发挥功能（参看吕斌，1994：114—117）。

相关变异规律是生物变异的重要规则，它也同样是翻译变异的重要属性。我们说，文本自身就是一个相互联系、作为整体而发挥作用的体系。在组成这个体系的形、音、义等各个要素中，一个要素的变异势必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让我们通过几个实例来证明。首先我们来看看形式相关变异的体现。

Несмотря на то, что недослушанный план Сергея Ивановича о том, как освобожденный сорокамиллионный мир славян должен вместе с Россией начать новую эпоху в

истории, очень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л его, как нечт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овое для него, несмотря на то, что и любопытство и беспокойство о том, зачем его звали, тревожили его, — как только он остался одним, выйдя из гостиной, он тотчас же вспомнил свои утренние мыли. И все эти соображения о значении славянского элемента во всемирной истории показались ему так ничтожны в сравнении с тем, что делалось в его душе, что он мгновенно забыл всё это и перенёсся в то самое настроение, в котором был нынче утром.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ч. 8, т. 2, стр. 412)

译文 1：虽然列文没有听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理论——就是说一个拥有四千万人口、解放了的斯拉夫社会应该如何和俄国同心协力来开辟历史上的新纪元，作为一种完全新的看法，使他感到很大的兴趣；虽然因为不知道基蒂为什么要叫他去而感到诧异和不安——但是他一离开客厅，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他立刻又回想起早上的思想。所有关于斯拉夫人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那套理论同他心里所起的变化比起来，他觉得是那么微不足道，以致他转瞬之间就完全遗忘了，又回到早晨那种心情中去了。（周扬，1997：1056）

译文 2：列文对于哥哥关于获得解放的四千万斯拉夫人应该同俄国一起开辟历史新纪元的新理论虽然很感兴趣，吉蒂叫他去究竟有什么事也使他不安，但当他一离开客厅，剩下自己一个人时，早晨所想的事又立刻浮上心头。斯拉夫人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同他内心的感受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他一下子就把它置诸脑后，又恢复了早晨的那种心情。（草婴，1989：996）

译文 3：尽管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有关四千万被解救的斯拉夫人应如何与俄罗斯人携手共创历史新时代的计划他颇有兴趣，这对他实在是闻所未闻，他却没能听完；尽管心中感到有些异常，也忐忑不安，不知道为什么要喊他去，不免为此惊慌，——而当他一走出客厅，剩下一个人时，他立即想起了自己上午的种

种思想。于是所有这些关于斯拉夫因素在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性等的考虑，跟他心灵深处所发生的事情相比，他便觉得是微不足道了，所以在转眼间他便忘得干干净净，重又进入了他今天上午的那种情绪状态。（智量，1996：704）

在这段描写中有一个重要的句子结构——圆周句，它是托尔斯泰最擅长使用的。圆周句是一种极富韵律和音乐性的结构。它由一系列结构相同而匀称的因素构成。在内容上，扩展性的叙述同一主题，在形式上，次序严整而具有韵律。圆周句通常是由非常复杂的句子结构组成，其目的正是通过这些匀称的、完整的句子结构表达复杂而深邃的道理，试图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力，从而深化主题。在上例中，整段的节奏感是由两个连续的让步从句创造出来的，语调是逐渐升高，第一部分结尾时达到顶点，接下去是停顿，整个圆周句的最终结尾用降调。这种句子类型是俄语特有的一种修辞手段。它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文艺语体和政论作品以及演说词等，以求增加文本震撼力和乐感。在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尽量保持原来句子的形式特点当然是译者的责任，但能否真正做到把原文的形式、内容和韵律都表达出来呢？我们看译文 1 对圆周句形式特点的处理是用了两个“虽然……但是……”：“虽然列文没有听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理论——就是说一个拥有四千万人口、解放了的斯拉夫社会应该如何和俄国同心协力来开辟历史上的新纪元，作为一种完全新的看法，使他感到很大的兴趣；虽然因为不知道基蒂为什么要叫他去而感到诧异和不安——但是他一离开客厅，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他立刻又回想起早上的思想。”但是我们读这个句子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虽然这样处理形式特征保住了，但是在韵律上就稍稍差了一点。译文 2 的处理没有表现非常对仗的形式特征，但是却运用汉语的表达习惯而制造了某种韵律：“列文对于哥哥关于获得解放的四千万斯拉夫人应该同俄国一起开辟历史新纪元的新理论虽然很感兴趣，吉蒂叫他去究竟有什么事也使他不安，但当他一离开客厅，剩下自己一个人时，早晨所想的事又立刻浮上心头。”然而这种韵律已经不可能和原文所创造出来的那种韵味相一致，只能算是比较接近但无法等同的韵味，

况且它是以牺牲形式特征为代价的。译文 3 的处理是:“尽管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有关四千万被解救的斯拉夫人应如何与俄罗斯人携手共创历史新时代的计划他颇有兴趣,这对他实在是闻所未闻,他却没能听完;尽管心中感到有些异常,也忐忑不安,不知道为什么要喊他去,不免为此惊慌,——而当他一走出客厅,剩下一个人时,他立即想起了自己上午的种种思想。”同样是和译文 1 有异曲同工之处,笔者认为“他却没能听完”,“不免为此惊慌”这两个词组相互对应,在某种程度上制造了部分乐感,但是这样的对仗已经完全打乱了原文的词序,也就是不可能和原文建立完全等值的关系了。除此之外,笔者尝试提供另外一种翻译:

> 译文 4:“尽管列文没有听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那些令他颇感兴趣、那些令他闻所未闻的关于被解放的四千万斯拉夫人应该同俄国一起开辟历史新纪元的新理论,尽管对吉蒂叫他过去究竟有何事情也令他诧异和慌乱不安,——但当他一走出客厅剩下孤身一人的时候,他还是立刻想起了早晨的种种思考。这些斯拉夫人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意义问题同他内心的感受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他刹那间就忘掉了这一切,重又恢复到早晨的那种思绪中。”(笔者译)

通过这四个译文我们可以比较看出,形式上的变异伴随着韵味的相关变异,也就是说,在文本整体中有部分做了改变,其他相关部分也会随之改变。并且如果是形式上的改变,那么韵味很难保全,这正是相关变异规则的完美体现。翻译变异也具有生物变异相类似的属性。翻译变异的相关性也是不可避免的。这里翻译变异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这也是我们即将谈到影响翻译变异的语言因素。再看一例形式结构相关变异的情况:

> Он посмотрел на княгиню, которая так мила была ему минуту тому назад, и ему не понравилась та манера, с которою она, как к себе в дом,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ла этого Васеньку с его лентами.
>
> Даже 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который тоже вышел на

крыльцо, показался ему неприятен тем притворным дружелюбием, с которым он встретил Степана Аркадьича, тогда как Левин знал, что брат его не любил и не уважал Облонского.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ч. 6, т. 2, стр. 151)

译文1：他望着一会以前他觉得那么和蔼可亲的公爵夫人，他不喜欢她欢迎那个戴着帽带的瓦先卡就像欢迎他到自己家里来的那副神气。

甚至那个也走到台阶上，带着一脸装模作样的友好神情来迎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使他很不痛快，其实列文是知道他哥哥既不欢喜又不尊敬奥布隆斯基的。(周扬，1997：739)

译文2：他望望公爵夫人，一分钟以前他还觉得她很可爱，但此刻他也不喜欢她像在自己家里那样热情地招待这个帽带飘飘的维斯洛甫斯基。

他甚至不喜欢柯兹尼雪夫，因为他也走到台阶上，装出友好的样子欢迎奥勃朗斯基。列文知道他哥哥一向不喜欢也瞧不起奥勃朗斯基。(草婴，1989：700)

译文3：他望了望公爵夫人，一分钟前他还觉得她是那么可爱，他也不喜欢她欢迎这个上有飘带的瓦辛卡的神气，就好像是在自己家里似的。

他甚至觉得，这时也站在门廊里的谢尔盖·伊凡诺维奇也让他不愉快，谢尔盖·伊凡诺维奇装出一副友好的模样欢迎斯捷潘·阿尔季卡季伊奇，而列文明明知道他哥哥既不喜欢也不尊重奥勃朗斯基。(智量，1996：495)

译文4：他望望老夫人，刚才他还觉得她可亲可爱的，现在他也不喜欢她像在家里似的迎接这个带飘带的维斯洛夫斯基的那股味道儿。

柯兹尼雪夫也走到台阶上，很亲热地迎接奥布朗斯基，列文也很不喜欢哥哥这种虚伪的亲热劲儿，因为列文知道他不喜欢也不尊敬奥布朗斯基。(力冈，1992：625)

在处理第二句定语从句“Даже 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который тоже вышел на крыльцо, показался ему неприятен тем притворным дружелюбием, с которым он встретил Степана Аркадьича, ...”的时候，四位译者的语序略显不同：译文 1 的处理是“甚至那个也走到台阶上，带着一脸装模作样的友好神情来迎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使他很不痛快，……”这个句子和原文的不同在于主人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出场稍显滞后，虽然译者竭力希望把修饰这个主人公的定语全都放在前面，这也正是俄语句式特点，即喜欢用定语从句来修饰主语，这种翻译变异的结果是使整个汉语句子略显冗长，改变了汉语的表达习惯，也会给读者造成一种不同于原文的那种沉重压抑感，这是原句和原译者所没有料到的相关变异的结果。译文 2 的处理是“他甚至不喜欢柯兹尼雪夫，因为他也走到台阶上，装出友好的样子欢迎奥勃朗斯基，……”此例中，译者突破了原文的句子结构，加上了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连接词，按照汉语的表达习惯使一个定语从句变成了几个前后逻辑性很强的短句，这种翻译变异保持了通顺，但是却发生了相关的形式结构变异。译文 3 的处理是“他甚至觉得，这时也站在门廊里的谢尔盖·伊凡诺维奇也让他不愉快，谢尔盖·伊凡诺维奇装出一副友好的模样欢迎斯捷潘·阿尔季卡季伊奇，……”这句的相关变异情况与译文 2 很相似，似乎比译文 2 的处理更显拖沓，但是基本意思是表达清楚了。译文 4 的处理是“柯兹尼雪夫也走到台阶上，很亲热地迎接奥布朗斯基，列文也很不喜欢哥哥这种虚伪的亲热劲儿，……”这句的翻译变异将指代主人公的那个定语从句直接融为一体变成一个主谓句，和后面的主谓语形成一种递进关系，虽然表达了作者想要表述的内容，但是读者对原作者的表达方式想象一定发生了相应的变异，此时我们已经很难找寻到原文定语从句的痕迹了。以上这些翻译变异正是译者在跳出原文语言结构桎梏的时候所伴随的相关变异。再来看看意象的相关变异情况：

Анна улыбалась, и улыбка передавалась ему. Она задумывалась, и он становился серьёзен. Какая-то

сверхъестественная сила притягивала глаза Кити к лицу Анны. Она была прелестна в своём простом черном платье, прелестны были её полные руки с браслетами, прелестна твёрдая шея с ниткой жемчуга, прелестны вьющиеся волосы расстроившейся причёски, прелестны грациозные лёгкие движения маленьких ног и рук, прелестно это красивое лицо в своём оживлении; но было что-то ужасное и жестокое в её прелести. («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ч. 1, т, 1, стр. 95 – 96)

译文 1：安娜微笑起来，而她的微笑也传到了他的脸上。她渐渐变得沉思了，而他也变得严肃了。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把基蒂的眼光引到安娜的脸上。她那穿着朴素的黑衣裳的姿态是迷人的，她那戴着手镯的圆圆的手臂是迷人的，她那挂着一串珍珠的结实的脖颈是迷人的，她的松乱的卷发是迷人的，她的小脚小手的优雅轻快的动作是迷人的，她那生气勃勃的、美丽的脸蛋是迷人的，但是在她的迷人之中有些可怕的和残酷的东西。（周扬，1997：109）

译文 2：安娜微笑着，而她的微笑也传染给了他。她若有所思，他也变得严肃起来。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把吉蒂的目光引到安娜脸上。安娜穿着朴素的黑衣裳是迷人的，她那双戴着手镯的丰满胳膊是迷人的，她那挂着一串珍珠的脖子是迷人的，她那蓬松的卷发是迷人的。她那小巧的手脚的轻盈优雅的动作是迷人的，她那生气勃勃的美丽的脸是迷人的，但在她的迷人中包含着一种极其残酷的东西。（草婴，1989：107）

译文 3：安娜微笑着，她的微笑也传染给他。她若有所思时，他也变得严肃起来。某种超自然的力在把吉蒂的眼睛引向安娜的面孔。她那身朴素的黑色长裙是很美的，她戴着手镯的丰满的双臂是很美的，她围着一串珍珠的挺拔的头颈是很美的，她蓬松的发式，卷曲的头发是很美的，她纤细的手足那轻盈雅致的动作是很美的，她这张正激动着的漂亮的面庞是很美的；然而，在她的美之中，有着某种可怕、残酷的东西。（智量，1996：73）

译文4：安娜微笑，他就微笑。她沉思起来，他也收敛起笑容。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把吉蒂的目光吸引到安娜的脸上。她穿着朴素的黑衣裳是很美的，那戴着手镯的丰满的手臂是很美的，她挂着一串珍珠的玉雕般的脖子是很美的，那蓬松的卷发是很美的，那一双纤足和手臂的轻盈优雅的动作是很美的，那洋溢着生气的娇艳的脸是很美的，不过在她的美艳之中有一种可怕的、残酷的意味儿。（力冈，1992：95—96）

在这段对安娜形象的描写中，我们是很容易发现翻译变异的相关变异特点的。比如，4位译者在处理"полные руки с браслетами"这个形象的时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翻译变异，到底是"戴着手镯的圆圆的手臂"还是"戴着手镯的丰满胳膊"？到底是"圆圆的手臂"迷人还是"丰满的胳膊"更美？再看"твёрдая шея с ниткой жемчуга"这句，到底是"结实的脖颈"还是"挺拔的头颈"抑或是"玉雕般的脖子"？这样三种变异在读者心目中对安娜的形象把握能是一致的吗？没有产生差异吗？再看"вьющиеся волосы расстроившейся причёски"这句，不同译者的翻译变异情况分别是"松乱的卷发"、"蓬松的卷发"、"蓬松的发式、卷曲的头发"，那么卷发到底是"松而乱"还是"松而不乱"呢？最后再来看"грациозные лёгкие движения маленьких ног и рук"这句，译文1是"她的小脚小手的优雅轻快的动作"；译文2是"她那小巧的手脚的轻盈优雅的动作"；译文3是"她纤细的手足那轻盈雅致的动作"。译文4是"那一双纤足和手臂的轻盈优雅的动作；"这样的四双手臂和双足又是哪一双让人更加怜爱和迷恋呢？我想读者在阅读这段描写的不同译本的时候，心目中一定各有各的对安娜具体形象的想象。这样，四位译者对形象的不同翻译变异也引发了安娜形象在人们心目中的种种猜想和变异。想必这是四位译者在翻译原文的时候所没有料到的结果。更绝妙的还有这样一例：

— Минуты . . . минуты увлечения . . . — выговорил он и хотел продолжать, но при этом слове, будто от физической боли, опять поджались её губы и опять запрыгал мускул щёки

на правой стороне лица.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ч. 1, т. 1, стр. 18)

译文1:"一刹那的情欲……"他说;一听到这话,她就好像感到肉体上的痛苦一样,嘴唇又抿紧了,她右颊的筋肉又抽搐起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还会说下去的。(周扬,1997: 16)

译文2:"一时的冲动……"他继续说,可是一听到这话,她又像身上给扎了一针似的,抿紧嘴唇,右颊的肌肉又抽搐起来。(草婴,1989: 17)

译文3:"几分钟的冲动嘛……"他开口了,还想继续说下去。然而一听见这句话,好像出于肉体的伤疼,她的双唇又闭紧了,右边脸颊上的肌肉又在抖动。(智量,1996: 11)

译文4:"一时的冲动呀……"他说出这话,还想说下去,可是她一听到这话,好像被戳了一刀,嘴又紧紧闭上,右腮的肌肉又跳动起来。(力冈,1992: 16)

四位译者对"будто от физической боли"的处理笔墨不同:译文1——"好像感到肉体上的痛苦一样",译文2——"像身上给扎了一针似的",译文3——"好像出于肉体的伤疼",译文4——"好像被戳了一刀",这里是"针""刀"上阵,为的就是表达主人公内心的那种烦闷和伤痛。然而是针扎得更刺骨,还是刀划得更伤痛只有原作者心中有个最佳的尺度。我们不能否认译者似乎感受到了主人公身上那种刀扎针刺的肉体疼痛,因此他们这样的不同变异处理也不为过,但是随之而来的原文中疼痛的程度是不可避免的改变了。

这样几组例子,无论是音韵的改变,还是句子结构的调整,抑或是形象的变异都会导致风格的改变,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事。而且,由于我们个人的经历不同,通过这些意象组合所生成的整体画面都是有所差异的。简而言之,翻译变异具有相关变异的属性。

第二节 翻译变异的历史性

历史性是一个时间范畴。它应该既包括共时状态也包括历时状态。"共时现象和历时现象毫无共同之处:一个是同时要素间的关

系，一个是一个要素在时间上代替了另一个要素，是一种事件。”（转引自徐通锵，1991：273）

考察翻译活动，如果只在共时状态下研究，那么翻译就会被视为一种僵化的活动，即单方面研究此时此刻，或者彼时彼刻对一部作品的不同翻译行为，而不能将“此”与“彼”时刻的翻译行为联系起来，即对一种翻译行为在“此”时刻代替“彼”时刻的现象进行研究。如果想把历时和共时因素联系起来就需要把变异引入翻译研究领域。因为，“变异”概念本身就已经暗含着同代和不同代这样两个共时和历时因素。试想一下，不同译者所处的不同于作者的特定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等因素必然影响和制约着不同译者对文本的看法。同时，受历时因素制约的不仅有译者，而且还包括文本本身，因为文本在不同的传统和历史条件下也会有不同的意义。而将变异引入翻译研究，就可以在翻译活动的共时和历时状态中架起一座桥梁。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多是注重对译文和原文等值的追求，尤其是以语言的共性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翻译语言学观更是关注封闭的符号系统中符号和符号之间的关系，结果把“时间”的概念完全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在翻译理论语言学派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翻译是一项与社会隔绝的一种自足体系，只能是在文本范围内就语言手段来分析翻译行为，而不能求助于非语言的其他要素，而且在共时分析中还必须排除历时因素的干扰和变异的捣乱。在这样一个封闭的文本分析过程中，文本的意义似乎是原文作者通过语言的规律设定出来的，而读者或者译者虽然与原文作者处于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历史情景中，但是他们还是可以根据语言将这种意义传达出来。传统翻译理论的研究者，尤其是语言学派的代表们不遗余力地制定各种对等或者等值的规则，其目的就是能为译者提供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不受任何限制的翻译模式，译者的主要任务就是灵活地掌握这些模式并熟练应用。在他们看来，文本总是有一个确定的意义有待于我们遵循。我们一定能找到一个很完满的答案。然而，事实上，这种追求翻译活动固定模式的出发点不仅抹杀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同时更将“时间”的因素一并掩盖。也就是说，在寻求翻译等同的努

力中,"功能对等"或者"翻译等值论"暗含着"一切都是可译的"的观点,但是这种可译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可能又暗含着将变化的历史性视作永恒的、静止的东西;不仅人的文化、语言的差异性(对等无视差异的功能,它只关注'差异消失后达到的'作用的共同性)在这种理论中被消除,而且连人的文化、语言的差异性在时间意义上的表现也被同化"(蔡新乐, 2001:60)。结果,语言变成了一种非历史性的东西。相应地,由语言所完成的翻译行为也成为一种非历史性的存在。以翻译变异为出发点正是为这种断代的研究牵了一条线,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同一时期和不同时期翻译变异的特点去揭示隐藏在变异背后的翻译理论和思潮,从而更加真实地、准确地把握翻译活动的实质。翻译变异能够架起翻译历史长河中共时状态和历时状态的桥梁,解释翻译活动中许多以往无法解释的现象。

其次,时间的问题在加达默尔"历史效果"和"视域融合"那里体现最为明显。根据加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文本总是含有作者视域和对这文本进行解读之人在具体时代形成的新视域两部分。文本中隐含的作者视域与译者的新视域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这种由时间间距和历时情景变化引起的差距,是任何理解者都不可能消除的"(参见王岳川,1999:210)。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视角,人们对同一文本的理解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误读和偏见。在加达默尔的提醒下,我们始终牢记:不同历史阶段人们对文本的理解方式会有明显不同。体现在翻译中,则表现为译者对文本的解读会随着时间的距离而引起不同程度的变化。在具体的翻译策略上则表现为不同时期如何对待传统的"直译"、"意译"和现代的"归化"、"异化"等表达方式。有学者已经明确提出,"人们不应该用静止的观念去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某种翻译策略进行认定。在目的语读者看来是异化的翻译到了另一个历史时期有可能被视为归化的翻译"(孙会军,2005:46)。因此,要把译文放到特定时期、特定的读者群中去判定到底是归化了还是异化了,脱离了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读者群来孤立地讨论归化、异化问题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取的。此时,我们重新回想起德里达在突出"差异"绝对性时所指出的"差异具有时空的普遍性"(孙会军,2005:95)。

"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耳边再次想起勒弗维尔的忠告。我们认为,翻译变异是蕴涵着时间因素的概念,它可以把跨越几百年甚至几个世纪的翻译活动用时间的链条串在一起,我们可以根据现在已经得到充分验证的原则为历史上已经完成的各种翻译变异作出一些合理的解释,用现在的翻译变异去解释过去,正如我们可以用过去来说明现在一样,对整个翻译活动中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作一些理论性的归纳和总结,避免我们孤立地看待翻译活动。

翻译变异体现历史性的显著例子是文学文本译名的变化。比如,果戈理的长篇巨著 «Мёртвые души» 最早单行本是鲁迅从德语译本并参考日语译本,于 1935 年 11 月出版的。当时的译名是《死魂灵》。此版本《死魂灵》后经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 16 次,东北中苏友好协会再版 1 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5 次,收入 1938 年版《鲁迅全集》第 20 卷,1958 年版《鲁迅译文集》第 9 卷。1983 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满涛翻译的《死魂灵》,当时译者沿用了鲁迅的译名。1987 年,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许庆道和满涛的译本,和鲁迅译本同名。同年,由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陈殿兴的译本更名为《死农奴》,另有上海译文出版社于 2004 年一月出版的娄自良翻译的《死农奴》译本。从 1935、1983 年的《死魂灵》到 1987、2004 年的《死农奴》,我们说,译本名字的改变是翻译变异历史性的真实写照。一方面,83 和 87 译本都是《死魂灵》译名,如果按照在共时状态下研究翻译,那么或许同时代的译者会视《死农奴》为另外一部作品,因为读者的心目中"死魂灵"已经是 мёртвые души 无可厚非的替代物了。然而从历时的角度去考察《死农奴》,它也并非是一个错误的译法,并且已经越来越得到普遍认同。原来,душа 这个词,在俄语的辞典里释义很多,当然,即使有那么多的释义也是不能穷尽 душа 这个词语的全部含义的。鲁迅在翻译这部作品的时候正是 19 世纪上半叶,他在回忆译事之难的时候,还曾经调侃自己过于自大而"小觑了"《死魂灵》,结果"苦"字上头:"其写法虽然平铺自叙,但到处是刺,有的明白,有的隐藏,想要保持原作的'锋头',颇不易。而 19 世纪上半期诸多器物都是'陌生家伙',翻译起来也很难。这就势必至于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转引自程义伟、李春林,2004: 29)。而关于"死

魂灵”的提法也是逐渐被人们所熟悉的曾经的“陌生家伙”，这种译法在当时看来是一种转译，并且一直沿用。到了80年代和现代，译者更倾向于将这个原本模糊的事物具体化，结果出现了直译形式的《死农奴》译本。目前这两种译名均能被读者所接受。

另有一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有一封信是卢仁写给拉斯柯尔尼科夫母亲的。信的原文是：

“Милостивая государыня Пульхе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имею честь вас уведомить, что по происшедшим внезапным задержкам встретить вас у дебаркадера не мог, послав с тою целью человека, весьма расторопного. Равномерно лишу себя чести свидания с вами и завтра поутру, по неотлагательным сенатским делам и чтобы не помешать родственному свиданию вашему с вашим сыном и Авдотьи Романовны с ее братом. Буду же иметь честь посетить вас и откланяться вам в вашей квартире не иначе как завтрашний день, ровно в восемь часов пополудни, причем осмеливаюсь присовокупить убедительную и, прибавлю к тому, настоятельную просьбу мою, чтобы при общем свидании нашем Родион Романович уже не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л, так как он беспримерно и неучтиво обидел меня при вчерашнем посещении его в болезни и, кроме того, имея лично к вам необходимое и обстоятельное объяснение по известному пункту, насчет коего желаю узнать ваше собственное истолкование. Имею честь при сем заранее предуведомить, что если, вопреки просьбе, встречу Родиона Романовича, то принужден буду немедленно удалиться, и тогда пеняйте уже на себя. Пишу же в том предположении, что Родион Романович, казавшийся при посещении моем столь больным, через два часа вдруг выздоровел, а стало быть, выходя со двора, может и к вам прибыть. Утвержден же в том собственными моими глазами, в квартире одного,

разбитого лошадьми, пьяницы, от сего умершего, дочери которого, девице отъявленн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выдал вчера до двадцати пяти рублей, под предлогом похорон, что весьма меня удивило, зная, при каких хлопотах собирали вы сию сумму. При чем,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я мое особое почтение уважаемой Авдотье Романовне, прошу принять чувства почтительной преданности.

вашего покорного слуги

П. Лужина".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ч. 3.)

译文1:

亲爱的夫人,普里契利亚·亚历山特罗夫那,我谨奉告你,因为突然发生的一些阻滞的缘故,使我不能到车站去接你们;我曾派一名很妥当的人办理此事。同样我明天早晨也无缘面见你们,因为参议院的事务不容耽搁,并且还有,在你会你的儿子,亚孚陀沙·罗马诺夫那会她的哥哥的时候,我可以不擅自打搅的。我至迟不过明天晚上八点钟整将获拜访你们并往你们寓所向你们致敬的荣幸,并且我附带提出我的诚恳的,而且我还可以说是必须的请求,就是在我们会见的时候,罗提宏·罗马诺维支可以不在场的——因为他昨天病中在我拜访他的时候,加我以大大的空前的凌辱,并且,因为我想亲自从你那里得到关于某一点之必须的详细的解释,关于这方面我愿得知你自己的解说。我谨预先奉告你,倘若,不顾我的请求,我竟遇见罗提宏·罗马诺维支,我将不得不立刻退出,你只能责备你自己。我写这信,是假定罗提宏·罗马诺维支,他在我拜访时看来十分有病,忽然迟两个钟头便复原了,能够离开住宅,因此也可以拜访你们的。我在一个被马车压倒,以后死了的醉人的寓所里,亲眼看见,他以葬礼为藉口,给那人的女儿——一个行为为人所共知的年轻女人——二十五块卢布,那使我大大发惊,我知道你们筹那笔款受了什么样的痛苦。谨附笔向你的可尊敬的女儿亚孚陀沙·罗马诺夫那表示特别的敬意,并求你接受我的敬礼。

你的卑微的仆人，

彼·卢辛　　　　　　　（韦丛芜译，《罪与罚》，1947）

译文 2：

普尔赫莉稚·亚历山大罗夫娜夫人，我荣幸地奉告：我遇到猝然发生的障碍，未能到车站月台上去迎接你们二位，为此业已派遣一名颇为能干的人前往。同样，明日早晨我也无缘同你们二位相会，因为枢密院的事务不能耽搁，同时我也藉此避免打搅您与您的儿子，以及阿芙朵嘉·罗曼诺芙娜同她哥哥的合家团聚。不过，明天晚上八点钟整，我定当赴尊驾寓所荣幸地奉访，并向你们二位问安，同时我冒昧地附带提出一项恳切请求，并顺便指出该项请求务希照办，即我们相会时，罗季昂·罗曼内奇千万不可在场，因为昨天我在他病中前往探望，不料他对我不顾礼节，横加侮辱。再者，必须你们自己做出必要的解释，我深盼听到你们本人的意见。同时，我荣幸地预先提出警告，倘若你们违背我的请求，硬要我和罗季昂·罗曼内奇相遇，我就不得不立时告退，到那时候你们只好责怪自己。我之所以写这些，是因为罗季昂·罗曼内奇在我访问时虽然似乎病得很重，不料过了两个小时就霍然痊愈，因此我推测，他既然能走出门外，也就可能到你们那儿去。我敢于肯定这一点，是因为昨天我亲眼看见一个寓所里有个酒徒因被马车轧伤而死，他的女儿是个行为不端，声名狼藉的女人，你的儿子却藉口供殡葬用而送给她二十五卢布，这使我异常惊讶，因为我知道您费了多少心血才凑足这笔钱。在此，我向尊敬的阿芙朵嘉·罗曼诺芙娜谨致特殊的敬意，并请您接受我的敬重和忠诚。

您的恭顺的仆人

彼得·卢仁　　　　　　　（汝龙译，《罪与罚》，1999）

在这两个译本中，译文 1 除了个别人名译音不够准确外，句子结构相当欧化，使这部作品相对于现代白话文读者来说略显“文理不通”，读者只能勉强理解其中的意思。但是，在白话文运动开始不久的 1930 年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谅解的。时代的印记在这篇译文中

相当明显,但是我们并不能否认这种表达方式存在的必然性和历史性。而译文2的特点是"意译"居多。这与90年代后期翻译研究出现的一些新倾向紧密相连。其中之一就是意译之风的上扬,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的增强。因此,在译文2中以"通顺"为主,尽量体现汉语的表达习惯。

再比如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翻译也有相似经历。有学者将1981年耿济之《卡拉马佐大兄弟》版本与1947年的《卡拉马助夫兄弟们》版本相比较,结果发现很多不同之处。首先是语言表达上的不同(括弧内为1981年版):长子被摔脱了出去(被扔在一边的长子);长老(长老们);到了修道院(来到修道院);不大有信仰的女太太(信念不坚的太太);这样的人活着做什么(这样的人活着有什么用);热衷职业的神学生(向上爬的宗教学校学生);仆室内(下房);辩论(争论的时候);喝了白兰地以后(喝着白兰地的时候);裂创在客厅里(客厅里的折磨);裂创在农舍里(农舍里的折磨);最后在清洁的空气里(在清新空气里);司米尔加可大手持弦琴(斯麦尔佳科大弹吉他);同聪明人说话是有趣的(跟聪明人谈谈也是有好处的);腐味(腐臭的气味);那个时间(那样的时刻);葱(一棵葱);谵语(梦呓);潘尔霍金职业的开始(彼尔霍金官运的开端)等。我们在这种历时译本的比较中发现了现代汉语词句的发展,一些文绉绉的用语都改译得更加平实且贴近生活:如"裂创"变成"折磨","职业"和"热衷职业"分别变成了"官运"和"向上爬","腐味"变成了"腐臭的气味";我们还发现了很多句型的变化,从40年代不熟悉进行时态到90年代该句式的普及:辩论→争论的时候;喝了白兰地以后→喝着白兰地的时候;我们还纠正了一些因为语言体系不同引起的造作的笑话,如"女太太"直接改为"太太"等;我们还注意到人们对外国事物的接受程度在变化,比如"弦琴"变成了"吉他",即音译词取代了意译词,这也表明人们已经习惯了"吉他"这种洋玩意儿。其次是人名译名的变化。例如,费道尔·伯夫洛维奇·卡拉马助夫(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阿莱莎(阿辽沙),司米尔加可夫(斯麦尔佳科夫),曹西玛(佐西马)等。在这些人名变化的背后隐藏着文化的重大变迁。比如,"曹西玛"变成"佐西马",读者不再会将这位长老误

解为是一个姓曹名西玛的中国人,而是一个有类似发音名字的外国人。

总之,时代的不同,时空的不同,翻译变异也各不相同。我们通过对不同时代翻译变异的研究不仅能发现翻译活动本身的演变规律,还能有很多惊喜的发现。例如,翻译活动中直译和意译风尚的转变使翻译变异有所不同,而翻译变异同时也反映语言和文化的变迁等。

第三节　翻译变异的连续性

把变异引入翻译研究,也就把连续性引入翻译学。把连续性引入翻译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要求翻译研究者辩证地把翻译活动作为一种在时空中运转的活体来研究,而不是解剖一具与时空无关的完全静态的"僵尸"。

在谈到翻译变异连续性的时候,我们不禁回想起令人耳目一新的彻斯特曼(Эндрю Честерман)翻译理论。正是他将源于生物社会学的"文化基因"概念引入翻译研究。文化基因特指文化传播和模仿的单位,彻斯特曼在此概念基础上创造了"超文化基因"这个术语来指代那种具有更高概括、包容能力的文化基因。按照彻斯特曼的观点,传达和反映翻译以及翻译理论的文化基因即为翻译文化基因,而翻译中的"超文化基因"分别是:原文-译文,等值,不可译性,意译和直译,所有的写作均为翻译。根据彻斯特曼的总结,到目前为止翻译经历了八种不同的翻译文化基因占主导地位的阶段。这八种不同的翻译文化基因按出现的先后顺序分别为:词(关注词语)、神语(关注源语文本,源语文本中赋有含义的语法形式不可改变)、修辞(关注读者,强调译文流畅)、逻各斯(关注译者的创造性和语言的塑造力)、语言学(关注语言体系之间的差异和关系)、传意(关注信息的功能和语用意义)、目标语(关注目的语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发挥功能的方式)和认知(关注译者的头脑,探询译者作出决定时的理由)。

他的这种新异的研究方式将翻译作为一种具有历史性和继承性的现象来看待的确为我们的研究注入新的亮点。把翻译史看作是不

同翻译文化基因的更替,或是文化现象的传递过程,这与我们强调翻译变异的连续性不谋而合。具体而言,每种翻译现象都不是孤立、杂乱无章的,它们彼此之间会在某些地方有些许的关联,而彼此关联的纽带就是由彻斯特曼所提倡的诸多翻译文化基因。翻译史上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有一个或者几个翻译基因占有显著地位,这些翻译基因在时间上略有先后顺序,但是也有很多重合之处,它们逐一累积,而非严格的前后相继。它们互相共存,但彼此并不排斥,并且各自在特定历时阶段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不完全相同。

受到彻斯特曼翻译文化基因的启发,再对生物变异不断更替地深入思考,我们不妨大胆地设想一下,如果说彻斯特曼翻译文化基因的连续性是宏观上文化现象的更替,是宏观上翻译思想的更替,是翻译历史长河中对传统的一次次发展和继承,那么我们所谈论的翻译变异的连续性则是微观上语言表达方式上的更替,是微观上译者技艺的更替,是翻译过程当中字字句句、清晰可见的差异更替。其实,我们再退一步思考,彻斯特曼所提出的八种翻译文化基因是用来总结翻译发展史,解释翻译中的研究对象和发展的各个阶段的,而我们的翻译变异正是联系不同阶段差异的纽带。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翻译文化基因的更替正是有赖于翻译变异的更替才实现的。译本比较是最好的证明方式,在彻斯特曼本人看来,“好的译本是不存在的。评论者中有的认为翻译中最重要的是忠实原著,有的认为优美的风格更重要,况且这些标准会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变化,文本自身的类型对此也会有影响”。[①](参看 Chesterman 1997,转引自 M. H. Михайлов,笔者译)每个时期的译本都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整个面貌,通过比较,我们能发现各个时期语言、读者要求等情况,甚至可以了解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快慢。我们试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 На вершине пологого холма, сверху донизу покрытого только что зацветшею рожью, виднелась небольшая деревенька.

---

① http://www.smolensk.ru/user/sgma/MMORPH/N - 9 - html/mihailov/mihailov.htm.

译文1：在自顶至麓都满布着放花的裸麦的隆起的高原的瓴脊，有一个小小的村落。（陆蠡译，1936）

译文2：在一带山坡上，自顶至麓都满布着刚刚放花的裸麦，山脊上远远望见有一个小小的村落。（陆蠡译，1957）

译文3：在缓缓倾斜的山坡顶上，从上至下覆盖着一片刚刚盛开的黑麦花，望得见一个不大的村子。（黄伟经译，1984）

译文4：在一个地势平缓的小山坡上，从上到下遍地都是刚刚扬花的黑麦，可以看到，山顶上有一个小小的村子。（磊然译，1990）

从整体来看，不同时期的译本在语言的修辞色彩上表现出由书面语体向口语语体过渡的特征，比如"自顶至麓→自顶至麓→从上至下→从上到下；""高原的瓴脊→山脊→山坡顶→小山破。"即便只是几个词语，我们也还是能发现语体上的明显变异，同时在这些细微翻译变异的背后，影射着特定的历史阶段中语言习惯、观念、文学风格等各种因素的变迁。

注意到翻译变异的连续性使我们在研究翻译现象的时候不会断代般地看待问题。翻译变异的连续性是和翻译变异的相关性和历史性紧密相连的。正是有了历史的变迁，又通过不同翻译变异的不断更替，才使得翻译变异形成一个连续的时间"流"，它并没有凸显在人们的视线里，却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翻译活动的长河中流动。我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它的的确确存在。研究翻译变异就是要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清它的存在。

坚持翻译的历史性、连续性，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历史是没有尽头的，每一次翻译变异都是一个连续转动链条中的一个有条件和有限的环节，我们的任何翻译都离不开过去，在过去的基础上形成现在的翻译，在现在翻译的基础上孕育着未来的翻译，立足过去，必须面向未来，面向未来，必须立足过去，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链条，它们在翻译的历史长河中涌动。

第四章　翻译变异的成因

要找出影响翻译变异的因素,我们要先从方法论上确立几条原则,首先要在文本内部寻找原因,因为毕竟翻译是对原文文本进行的翻译,体现给读者的是译文文本。文本在翻译过程中是最为看得见、摸得到的客观实在。文本自身的特点是否会对翻译变异有影响不得不令我们深思。第二,不能仅仅局限于文本内部,要将文本以外的因素同样考虑进去,这也正是"变异"给我们提供的方法论要求,即要联系内、外控制因素去考察各种变异。生物体变异自身的基因因素固然重要,但是外界环境的改变、时代的差异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体现在翻译过程中,我们要十分关注语言、文化和语境对翻译变异形成的影响。第三,最最要引以为重的是整个翻译活动的施动人——译者,这是翻译变异同生物变异的不同之处。生物变异无论是亲代特征明显地传递给子代,还是外界环境促使生物改变某些特征以求适应生存环境,所有的变异都是生物自身完成的结果。而文学翻译活动翻译变异的产生必须借助人来完成,因此,译者在翻译变异形成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我们说,翻译过程一般分为两个阶段:即译者对原作的理解阶段、译者对译文的表达阶段。原作必须有译者主动的、创造性的翻译方可成为译语文化中的文学作品,而翻译文学作品还必须有译文读者的主动参与方可完成,否则也永远只是一个艺术半成品,没有什么生命力和价值。

在理解阶段,译者的主要目的是要准确而忠实地对源语文本作出自己必要的解释。从这一点上来看,对文本意义的解读就成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首要一步。那么,文本的意义是什么呢?文本的意义确定的方式是不是唯一的呢?

在表达阶段,译者的主要任务是要将自己所理解的含义用语言

表达出来。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似乎没有哪个流派可以忽视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而开展自己的研究。但是，以往研究者们多是以语言的共性论为基础，以语言共性论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翻译理论认为可以找到对等的规律完成翻译。然而，语言只是具有共性吗？如果说语言之间的差异在翻译中的体现已经为大家所共识，那么文化之间的差异则越来越引起翻译理论界的重视。从静态地对微观文化因素的强调（指在翻译过程中揭示原文中所隐含的文化信息）到动态地对宏观文化功能的传达（指在翻译过程中使源语文本在译语的文化里发挥跟在源语文化里一样的功能），翻译变异在这里体现得最为彻底，文化因素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翻译文化学派的应运而生则是最好的证明。无论是对文本意义的理解、语言的表达、文化信息的传递都离不开翻译的主体——译者。而译者由于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的不同，个人兴趣爱好和性格脾性的不同，智力水平和表达能力的不同，人生观和世界观有别等，都会导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根据不同的翻译标准、翻译目的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从而形成不同的目的语文本，使目的语文本之间呈现差异。

由此，我们按照翻译完成的顺序来考察各个阶段影响翻译变异的因素，具体从四个方面来探讨，它们分别是：文本的特征、语言因素、文化因素、译者因素。

第一节　文本的开放性和翻译变异

翻译活动始于对源语文本的分析，始于对文本意义的把握。什么是文本？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文本可以是一个句子也可以是整本书。与“文本”相对应的英语词是“text ”，而“text”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含义。比如，在语言学中，“它既可以指口头话语又可以指笔头话语”（黄国文，1988：7）；在接受美学中，它仅仅是指笔头话语中具有文学性的那部分话语，即文学作品。我们的研究就是基于这样的文本理解。那么文本的意义是如何确定的呢？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文本的意义并非作者的意图而是所说的事实本身。文本的真正意义存在于不同时代、不同人对它的不同的理解中。

从接受美学角度来看，作者以文字形式创造好的还未进入阅读过程的文本并不是最终的文学作品，因为任何文本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获得意义。接受美学这种对文本的开放性理解为我们研究翻译变异的成因打开了出口。

20 世纪 60 年代，以源语文本为中心的翻译观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源语文本已不再被看作是一个封闭自足的语言系统。文本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无论什么时候，文本的语言、结构等形式因素都是不能绕过的。在对文学文本进行结构分析的时候，德国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伊瑟尔（Изер）的文本阅读方式给我们极大的启发。伊瑟尔在分析读者阅读文学作品过程的时候，将读者摆到了重要的位置。在他看来，文本不再被看作语言中静止不变的标本，而是读者理解作者意图并把它创造性再现于另一文化的语言表现。伊瑟尔在分析的过程中，详细论述了文本的特征，指出文本是由未定点和空白组成的图式化结构。那么什么是文本的未定点和空白呢？举个例子来说：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对房屋的描写，但是无论作家写得多么具体、多么细致，总还是能发现很多不能或不必要描写的部分和细节。那么这些部分和细节就有待于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去填充，伊瑟尔把这种需要填充的细节和部分称作“未定点”。如，Родители одели детей со вкусом. 我们知道的事实是父母给孩子穿得很时髦，但是具体是什么款式，什么颜色文中并没有说明，读者可以展开自己的想象做合理的填充。“空白”是指由于文本的各个组成要素（叙事者、人物、情节、读者（暗含读者））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有时间上的先后和空间上的间隔，因此，文本中会呈现出很多“空白处”，它是文本内容和结构各构成成分联系的纽带和背景，恰恰就是这些“空白处”诱发读者去填充、去联结，使文本经过阅读而产生不同的审美形象，从而完成读者和文本的互动关系。总之，根据伊瑟尔所言，文本本身其实并没有意义，它只有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才能产生，文本的意义依赖于读者的创造性，它是文本和读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要靠读者的想象去填补文本中的“未定点”和“空白”。正如波兰哲学家罗曼·英伽登所指出的那样，“文学作品的本文只能提供一个多层次的结构框架，其中留有很多未定点，只有在读者一边阅读一边将它

具体化时，作品的主题意义才逐渐地表现出来”。（参看张隆溪，1986：196）文本的这种组成结构使每一个读者可以尽情运用自己的经验和想象，对文本中存在的“未定点”和“空白”加以填补，加以具体化。由于不同的读者阅读同一文本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因此，不同的读者对空白的填补和对未定点的确定也会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手段。译者作为阅读过程中的一个暗含读者，同样要经历文本中“未定点”和“空白”提供给他的审美体验。而译者在对文本并未用文字表达出来的各种空隙进行填充的时候，同样会因为各自不同的理解和想象而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

我们说，正是文本的这种未定性和开放性特征是导致翻译变异的重要原因之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尤其是在表达阶段），只能从对未定点或空白的各种可能的填充方式中选取一种，并在作出选择的同时被迫放弃可能同样有效的其他填充方式。任何一个目的语文本都是译者对诸多确定方式或填充方式进行选择并加以确定的结果。总之，正是文本这种开放性特点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想象创造了条件，译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文本进行解读，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文本的“未定点”和“空白”加以填补和确定，从而形成不同的译本。让我们来看一例。

> Проводив гостей, Анна, не садясь, стала ходить взад и вперёд по комнате. Хотя она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 (как она действовала в это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о всем молодым мужчинам) целый вечер делала всё возможно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возбудить в Левине чувство любви к себе, и хотя она знала, что она достигла этого, насколько это возможно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 женатому честному человеку и в один вечер, и хотя он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ся ей (несмотря на резкое различи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мужчины, между Вронским и Левиным, она, как женщина, видела в них то самое общее, за что и Кити полюбила и Вронского и Левина), как только он вышел из комнаты, она перестала думать о нём.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ч. 7, т. 2, стр. 294)

译文 1：送走了客人以后，安娜并没有坐下来，却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虽然整整一晚上她都无意识地（就像她近来对待所有的年轻人的做法一样）施展出全部魅力来唤醒列文对自己的爱，虽然她非常喜欢他（尽管由男人的观点来看，弗龙斯基和列文有着显著的不同，而她，作为一个女人，却在他们身上看出使得基蒂爱上了他们两个的那种共同的特点），但是他一走出那间屋子，她就不再想他了。（周扬译，1997：912）

译文 2：安娜送走客人，没有坐下，却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整个晚上，她都无意识地竭力使列文拜倒在她的脚下（近来她对年轻男人都是这样）。她知道，她使一个已婚的正派男人，在一个晚上对她倾倒的程度达到了顶峰，而且她也很喜欢他（尽管从男人看来，伏伦斯基和列文的共同之处，也就是吉蒂能同时爱他们两人的原因），但是等他一离开屋子，她就不再想他了。（草婴译，1989：865）

译文 3：送走客人以后，安娜没有坐下，在房间里来回地走动。虽然整个晚上她都在下意识地（近来她对所有的年轻男人都是这样）使尽全身解数在列文心中激起对她的爱恋之情，虽然她知道她已经达到目的，只用一个晚上便能让一个结过婚的正派人对自己拜倒到如此程度，这已是登峰造极，虽然他非常讨她欢喜（尽管从男人们的观点看，伏伦斯基和列文截然不同，而她作为一个女人，却能看出他们的共同之处，所以吉蒂才会又爱伏伦斯基，又爱列文），但是，他一走出房门，她就不再去想他了。（智量译，1996：608）

这是选自《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个段落，所描述的是安娜在列文离开她房间之后的一段心理活动描写。在这样一种平铺直叙的文字中充满了大量的未定点和空白。上述三位译者在确定未定点和填充空白时各自采用了不同的手法，从而对同一文本作出了不同的翻译变异。为了更清楚地看出这三种译文的不同之处，下面我们试图从以上段落中选取几个小句来进行详细的比较。例如：

Хотя она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 (...) целый вечер делала всё возможно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возбудить в Левине чувство любви к себе, ...

周译：虽然整整一晚上她都无意识地(……)施展出全部魅力来唤醒列文对自己的爱，……

草译：整个晚上，她都无意识地竭力使列文拜倒在她的脚下，……

智译：虽然整个晚上她都在下意识地(……)使尽全身解数在列文心中激起对她的爱恋之情，……

从这个句子的不同译文中，我们大概都能得到这样一个比较普遍的印象，即“她无意识地想要吸引列文，并且使用各种可能的方式”。可以说，这是这个句子中可以称得上比较确定的地方，也正是这种确定性才使我们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把握了作者的原意。但是，如果我们再细分析一下，便会发现，就是在这样一个十分平实的句子里，依然包含着好几处未定点。我们来看看三位译者是如何处理的。比如，原句的意思虽然很明显，即她要吸引他，而且竭尽她所能之事，但是，我们照样可以问：她本来希望在多大程度上吸引他呢？她的吸引实际上付出了多少努力呢？比如，草译仅用“竭力”二字将她的努力很平淡地一带而过，而周译却用了“施展出全部魅力”明显地注入了更多的心思，而智译的“使劲全身解数”同样地表明了“她”所付出努力的程度之深。可以看出，以上三位译者对这个尺度的把握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们认为，三位译者之所以会得出三种不同的变异形式，得到三个不同的译文，除了他们的审美情趣各异，风格不同，汉语水平有别之外，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源语文本自身包含了一些让人无法确定的未定点和空白，因此我们在翻译时，会根据自己各自不同的体验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些未定点和空白具体化，从而出现不同的翻译变异，从而得到了不同的译文。作者自己的心里也许会有个尺度，但是，读者(包括这里的译者)在读到这个句子时，脑海里所想象的尺度会与作者原本所想象的尺度完全吻合或者非常接近吗？究竟谁能真正地把握住作者心中

的那个尺度呢？这个问题也许只有作者本人才能给予我们答复。从这个例子中我们还发现，得到这样三种翻译变异结果也并非译者自身能力所为，而是文本的开放性特征给译者提供的空隙，它并不是以译者的意志为转移，是文本自身特征使然。

让我们再看一例：

> Проходя через первую гостиную, Левин встретил в дверях графиню Боль, с озабоченным и строгим лицом что-то приказывавшую слуге. Увидав Левина, она улыбнулась и попросила его в следующую маленькую гостиную, из которой слышались голоса. В этой гостиной сидели на креслах две дочери графини и знакомый Левину московский полковник. Левин подошёл к ним, поздоровался и сел подле дивана, держа шляпу на колене.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ч. 7, т. 2, стр. 275)
>
> 译文 1：列文穿过第一间客厅时在门边和波尔伯爵夫人遇上了，这位太太正心事重重地板着面孔给一个仆人吩咐点什么事。一看见列文，她脸上现出一丝笑容，请他进一个小客厅，那里边有人说话。伯爵夫人的两个女儿和一位列文认识的莫斯科的上校坐在那间客厅的安乐椅里。列文向他们走过去，问好之后，在长沙发旁落座，帽子放在膝盖上。（智量，1996：593）
>
> 译文 2：他走进头一间客厅，在门口遇见博利伯爵夫人，她心事重重，板着脸正对一个仆人下什么命令。看见列文，她微微笑了一笑，请他到隔壁的小客厅里，那里传来了嘈杂的人声。在那间房里，安乐椅上坐着伯爵夫人的两个女儿和列文认识的一位莫斯科的上校。列文走过去，寒暄了几句，就在沙发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帽子搁在膝头上。（周扬，1997：889）
>
> 译文 3：列文在穿过前客厅的时候，在门口遇到心事重重、正板着脸对女仆下命令的保尔伯爵夫人。她看到列文，笑了笑，就请他到隔壁小客厅里去，那里有说话的声音。在小客厅里坐在椅子上的是伯爵夫人的两个女儿和列文认识的一位莫斯科的

上校。列文走过去,同他们打过招呼,就在长沙发旁边坐了下来,把礼帽放在膝盖上。(力冈,1992:749)

译文4:列文穿过前客厅,在客厅门口遇见保尔伯爵夫人。她正板着脸,心事重重地对女仆吩咐着什么。她一看见列文,微微一笑,请他到隔壁小客厅里坐,那里有说话声传来。在小客厅里,伯爵夫人的两个女儿和列文认识的一位莫斯科上校坐在安乐椅上。列文走过去,同他们打了招呼,在长沙发旁坐下来,把帽子搁在膝盖上。(草婴,1989:844)

显而易见,即使在这短短的四句话里,不同译者对原文的翻译依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异。比如,第一句"Проходя через первую гостиную, Левин встретил в дверях графиню Боль, с озабоченным и строгим лицом что-то приказывавшую слуге."译文1的处理是"列文穿过第一间客厅时在门边和波尔伯爵夫人遇上了,这位太太正心事重重地板着面孔给一个仆人**吩咐点**什么事";译文2的处理是"他走进头一间客厅,在门口遇见博利伯爵夫人,她心事重重,板着脸正对一个仆人**下什么命令**";译文3的处理是"列文在穿过前客厅的时候,在门口遇到心事重重、正板着脸对女仆**下命令**的保尔伯爵夫人";译文4的处理是"列文穿过前客厅,在客厅门口遇见保尔伯爵夫人。她正板着脸,心事重重地对女仆**吩咐着**什么"。这里的"приказывавшую"到底是"下命令"还是"吩咐着"?接着第二句Увидав Левина, она улыбнулась и попросила его в следующую маленькую гостиную, из которой слышались голоса. 的处理:译文1是"一看见列文,她脸上现出一丝笑容,……那里边有人说话。"译文2是"看见列文,她微微笑了一笑,……那里传来了嘈杂的人声。"译文3是"她看到列文,笑了笑,……那里有说话的声音。"译文4是"她一看见列文,微微一笑,……那里有说话声传来。"这里在对伯爵夫人的微笑处理,不同译者显示了不同的态度,到底是因为"一看见列文"就改变了原来板着脸的态度,就立刻表示出欣喜甚或惊喜而笑了笑,还是礼貌性地"看到"或者"看见"列文而自然而然用微笑打个招呼?在对"голоса"的处理上,四位译者的态度也不一样,我们不禁

会问，到底另外一间客厅里只是“有人说话”、“有说话声”、“说话的声音”还是完全“嘈杂的人声”？这些词的选择有没有区别？当译文读者读到这几个不同的译文时会不会产生不同的印象？而且，哪一种译文在语气上更能体现出原作者所想要描述的客厅里的氛围呢？我们说，这些都可以认为是源语文本给译者所留下来的空白点和未定点，从而使不同的译者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填充这些空白，得出不同的译文。再如：

Левин, глядя на это крошечное жалкое существо, делал тщетные усилия, чтобы найти в своей душе какие-нибудь признаки к нему отеческого чувства. Он чувствовал к нему только гадливость. Но когда его обнажили и мелькнули тоненькие ручки, ножки, шафранные, тоже с пальчиками, и даже с большим пальцем, отличающимся от других, и когда он увидал, как, точно мягкие пружинки, Лизавета Петровна прижимала эти таращившиеся ручки, заключая их в полотняные одежды, на него нашла такая жалость к этому существу и такой страх, что она повредит ему, что он удержал её за руку.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ч. 7, т. 2, стр. 309)

译文 1：列文望着这个可怜的小东西，想在心里找出一点父爱的痕迹，但是徒然。他对他只感到厌恶。但是当他脱光了衣服，他瞥见了那番红花色的小胳臂小腿，却也长着手指和脚趾，甚至大拇指还跟其余的大不相同；当他看见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如何把那双张开的小胳臂拉拢在一起，好像它们是柔软的弹簧一样，而且把它们包在亚麻布衣服里的时候，他那样可怜这个小东西，而且那样害怕她会伤害了他，以致他拉住了她的臂膀。（周扬，1997：930）

译文 2：列文望着这个可怜的小东西，竭力想在自己心里唤起做父亲的感情。他对他只觉得厌恶。但是，当接生婆揭开襁褓，列文看见番红花色的小手臂和小腿，上面也长着手指和脚趾，大拇指同其他手指也显然不同，还看见接生婆把那双张开的

小手臂像柔软的弹簧一样夹拢来用襁褓包住时，他忽然怜悯起这个小东西来，唯恐接生婆把他弄伤，竟一把拉住她的手。（草婴，1989：881—882）

译文3：眼睛望着这个小而又小的可怜的东西，列文极力在自己心灵深处寻找对他的任何一点儿父子之情的迹象，但是却找不到。他只觉得他讨厌。但是包被打开了，孩子裸露着，伸动着那细而又细的小手小脚，颜色像番红花色的，也长着一个个小小的指头，还有一个跟别的指头不一样的大指头呢，列文看见，丽莎维塔·彼得罗芙娜把那只柔软得像弹簧似的伸来伸去的小手捏住往包里塞，他发现自己非常可怜这个小东西，非常害怕她会弄伤了他，便把她的手抓住。（智量，1996：620）

在这一小段描写中，我们依然能够找到很多未定点和不确定因素，例如三位译者在处理 глядя на это крошечное жалкое существо 时，译文1和译文2都是"望着这个可怜的小东西"，而译文3是"望着这个小而又小的可怜的东西"。"小东西"和"小而又小"是不是有程度上的差异，读者在读到这三个译文的时候是否对译文3中的小东西会更多一份怜悯和同情？再如"Но когда его обнажили и мелькнули тоненькие ручки, ножки, шафранные, тоже с пальчиками, и даже с большим пальцем, отличающимся от других," 这里的"шафранные"三位译者都译成"番红花色的"，我们知道番红花原产欧洲南部，花色有白、紫、橙、黄等。每个译者眼中的番红花到底是什么颜色？而译者读到这里脑海又会是什么颜色？有没有被译成"红里泛着黄"的可能性呢？再说最后一句"Лизавета Петровна прижимала эти таращившиеся ручки, заключая их в полотняные одежды, на него нашла такая жалость к этому существу и такой страх, что она повредит ему, что он удержал её за руку"中，

译文1：……而且把它们包在亚麻布衣服里的时候，……以致他拉住了她的臂膀。

译文2：……一样夹拢来用襁褓包住时，……竟一把拉住她

的手。

译文3：……伸来伸去的小手捏住往包里塞，……便把她的手抓住。

Заключая 到底是“包”还是“塞”？ удержать 到底是“拉”还是“抓”，有没有可能是“握”？ 而以上三种译文所表现出来的区别，从根本上说，这些差异并非仅仅是表达形式不同，或者说，并非仅仅靠“直译”还是“意译”、“归化”还是“异化”来分析对错，而是对“尺度”的把握问题，对未定点和空白处填充的不同程度问题。比如，细心的读者是否能从这两三个未定点的具体化形式中感受到列文对这个小东西的感情程度差异呢？他更多的是对这个小东西产生了厌恶之情，还是动了恻隐之心，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呢？答案只有作者心中有数，也或许他正是想给读者一个想象的空间。

总之，文本的这些未定点为译者提供翻译变异的自由度很大，每个译者会根据他的理解对这些未定点加以具体化，从而得出不同的译文。诗歌的变异情况更为严重。“在诗歌这一独特的体裁中，高度精练的文学形式与无限丰富的内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译者几乎无所适从——保存了内容，却破坏了形式，照顾了形式，却又损伤了内容”（谢天振，1999：137—138）。由于诗歌的语言更加凝练，意象更加飘忽不定，文本中的未定点和空白点更加多，结果译者对某些未定点和空白的把握更加困难，因此，当译者在向目的语文本“移植”这些未定点和空白的时候，就可以采取更多的填充方式，结果使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之间产生一定的距离。

第二节　语言差异和翻译变异

翻译变异还是语言差异的必然结果。语言之间的差异是翻译研究中被关注最多的问题。无论是哪一个翻译学派都不可以忽视语言差异的存在。翻译最终还是要通过语言手段的运用来实现，翻译往往被批评为“不通顺、呆板和没有文采”，其原因并非是原文文本固有的，而是在于文本之外。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原文和译文语言的

差异。但是由于研究者们对语言差异关注程度的不同,翻译变异的允许度也有相应变化。

早在中世纪时期,意大利影响较大的翻译理论家阿雷蒂诺(Аретино)提出有效的翻译在任何两种语言之间都是可能的观点,批评那种认为语言差异在翻译中是不可逾越的障碍的观点,并认为这种观点实质上"是译者用来掩盖自己能力低而放出的烟幕"。(谭载喜,1991:54)。他的这种主张得到20世纪强调语言共性论的现代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如费道罗夫(Федоров)、雅克布逊(Якобсон)、纽马克(Ньюмарк)和奈达(Найда)的继承和发挥。比如,奈达(Найда)就曾断言:"所有的语言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结构是十分相似的,语言的普遍性远远地超过了语言的差异"。(Nida,1993:106)德国的歌德(Гёте)也曾经指出,"语言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交织的关系。不同的语言在其意思和音韵的传译中有着彼此相通的共性"(李文革,2004:31)。德国的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Лебниц)认为一切自然语言都是同源的,乔姆斯基对一切自然语言共同逻辑形式的追寻正是基于他的观点。以上对语言共性论的探索为语言的可译性找到了佐证。以语言共性论为基础的翻译理论家们纷纷认为语言的共性是普遍的,而差异只是语言的一种特殊现象,因此,操不同语言的人们基本上可以达到互相交际、彼此了解的目的。

然而这种语言共性论越来越遭到翻译理论家的质疑,比如,张春柏在批判以语言共性论为基础的等值论时指出,"各种语言中的有些独特的语言现象(包括音韵、词汇、语法和语义结构)和操这些语言的民族的思维方式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文化差异越大,语言之间的鸿沟就越大,翻译的困难也就越大"(张春柏,1998:93)。

语言、思维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洪堡(В. Гумбольдт)的语言世界观、萨皮尔-沃尔夫假说(Гипотеза Сепира-Уорфа)、奎因(У. Куйн)的不可知论成为翻译理论界一时探讨的焦点。德国的语言学家洪堡所提出的两元论语言观在当时并未引起特别的重视,却在20世纪成为翻译理论家们所热烈探讨的课题之一,他从语言的本质特性出发,对翻译坚持了一种辩证立场。他根据

自己的翻译实践认为语言相互之间既有个性又有共性。洪堡指出，语言对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不同的语言不仅仅是人类意识的不同外壳，更是不同的世界图景（видение мира, картина мира）。“每一种语言都具有独特的世界观。……所有语言都在描述其所属民族的周围事物，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脱离这个圈子，取决于他能在多大程度上立刻进入另一个语言圈。”（转引自 Мечковская，1996：62）语言总是以独特的方式去划分世界，对客观事物进行分类。如果我们把语言记载下来的对世界的认识看成一幅景观的话，那么很难找到完全一样的语言世界图景。洪堡的观点对美国的萨丕尔和沃尔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核心是语言决定思维。语言对思维、行动和人们对世界的看法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之一。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表现在语言上就是语言结构的不同。而语言结构的差异又反映了思维方式的不同。毋须多言，不同的语言中所呈现的世界图景是有很大差异的。“根据 RT 奥利佛（Oliver）的观点，人们对环境的观察及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人们准备如何观察这一具体物体的方式所预先决定的”。（杨仕章，2003：139）而美国当代著名的逻辑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奎因受自然主义和行为主义意义观的影响认为，“语言的意思并不是一种客观的符号功能，而是一个行为和有关社会因素相关联的现象”。（李文革，2004：110）俄罗斯语言学家波捷布尼亚（А. А. Потебня）和库尔特内（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则把语言个性当作社会语言形式和集体规范的储存器以及各种社会语言范畴的交汇点加以研究，并提出了语言与“人的心智”、“人的世界观”等相关的重要思想。（转引自赵爱国，2003：11）

这样一些鲜明的语言哲学观点明确地告诉我们，语言之间的差异性根深蒂固。语言的差异与思维密切相关。高健先生通过自身的翻译实践总结出若干条汉语和英语之间的差异，从而进一步论证了语言的固有个体属性（参见高健，1999：57—62）。语言差异所表现出来的语言的个性不得不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语言观的转变促使人们越来越强调语言之间的差异性。正如刘宓庆所言，认识语言的同质性固然重要，但每种语言的特殊属性也绝对不能忽视（参见刘宓

庆,2001:128—130)。

如此一来,语言的共性论和语言的相对论观点反映在翻译理论研究中自然就形成了两大派别"个性派"和"共性派"。个性派强调语言的特殊性和不可译性,共性派强调语言的共同特点,认为翻译的基础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和生活经验,语言是可以互译的。随着现代语言学的深入和发展,语言既有个性又有共性的观点基本被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在翻译研究领域,翻译研究者们也基本能达成共识,即翻译是可能的,但翻译也是有限度的。但不管怎么说,语言之间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

具体到汉俄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我国有不少学者在这个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从50年代开始,半个世纪已经过去,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列举了丰富翔实的例子,他们的不懈努力使我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俄汉两种语言的个性更大于共性。俄汉两种语言之间所存在着的本质上的差异,导致了俄汉互译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翻译变异,从音、形、义到整个译文的整体风格都将遭受不同程度的变异。我们分别举例说明一下。

1. 音韵

翻译中音韵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语音以及构成音韵美的独特手段。俄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决定了音韵的完全移植是绝对不可能的,即使在某些特殊的翻译(如在诗歌翻译为了在行末押韵)中译者力图保留原来的音韵,但是这种保留也只能是"拆了东墙补西墙",然而一个文本,尤其是诗歌文本,整体的音韵不可能通过只是保留一两个词的发音而完整或近似地保留下来的。我们以莱蒙托夫的《帆》为例。

Парус

Лермонтов

Белеет парус одинокий
В тумане моря голубом!...
Что ищет он в стране далекой?

Что кинул он в краю родном?...
Играют волны-ветер свищет.
И мачта гнется и скрыпит ...
Увы! Он счастия не бежит!
И не от счатсия бежит!
Под ним струя светлей лазури,
Над ним луч солнца золотой ...
А он, мятежный, просит бури,
Как будто в бурях есть покой!

在莱蒙托夫的这首诗歌中,作者以四音步的抑扬格(ямб)诗步形式创造了整部诗歌的节奏,即非重读音节在前,重读音节在后,比如第一小节我们所作的划分;而在韵律方面则主要采用了交叉韵:比如 ий →ом →ой → ом;щет → ит →щет→ ит;ри →ой →ри→ой。这种节奏和韵律所营造出来的诗歌的美感就是我们常说的音韵,它之于诗歌有如人的情绪。中国古诗以"顿"创造音韵,即注重声音上的连续,相当于俄文诗歌的"诗步"(стопа),而中国白话诗的节奏流于自然,趋向于非形式化,倾向于语言的自然节奏。比如卞之琳的《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那么,我们在诗歌互译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忠实于原诗歌的情绪呢？仅仅用汉语的"顿"来代替俄语的"诗步"就可以达到忠实原诗歌了吗？就算是真的达到音韵效果一致(如果真能完全符合的话),那么内容上就没有一点损伤吗？风格上就没有一点遗失吗？我们的答案是未必如此。我们仅以顾蕴璞译本第一小节为例:

帆

蔚蓝的海面雾霭茫茫,

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
它到遥远的异地找什么？
它把什么抛弃在故乡？……
呼啸的海风翻卷着波浪，
桅杆弓着身在嘎吱作响……
唉！它不是要寻找幸福，
也不是逃离幸福的乐疆！
下面涌着清澈的碧流，
上面洒着金色的阳光……
不安分的帆儿却祈求风暴，
仿佛风暴里有宁静之邦！

（顾蕴璞译）

在这一小节中，我们说译者基本做到了以汉语诗歌中每行的“四顿”代替了原诗每行的“四步”，即

Беле\ет па\рус о\динокий
В тума\не мо\ря го\лубом!...
Что и\щет он \в стране \далекой?
Что ки\нул он \в краю \родном?...
蔚蓝的\海面\雾霭\茫茫，
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
它到\遥远的\异地\找什么？
它把\什么\抛弃在\故乡？……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顾译本达到了与原文韵律上的神似，但这四行诗句的韵律却是以牺牲原诗歌的语序变异为基础的，这也正是前文我们所提到的翻译变异相关性的直接后果，那么在改变了语序的译本即使做到了音韵节奏上的一致效果，它还能和原诗所要表现的意蕴一样吗？我们说，原诗的整个韵味是不可能只靠部分音韵的保留而完整地保留下来，这正是俄汉两种语言差异所导致的后果。再比如普希金的诗歌：

Туча
Последняя туча рассеянной бури!
Одна ты несёшься по ясной лазури,
Одна ты наводишь унылую тень.
Одна ты печалишь ликующий день,
Ты небо недавно кругом облегала,
И молнии я грозно тебя обвивала;
И ты издавала таинственный гром
И алчную землю поила днём.
Довольно, сокройся! Пора миновалась,
Земля освежилась, и буря промчалась,
И ветер, лаская листочки древес,
Тебя с успокоенных гонит небес.
译文：

乌　云

风雨后留下一朵乌云！
你独自一个在碧空逡巡，
向万物投射阴郁的影子，
在欢乐的日子撩起愁思。
你不久以前密布在天边，
身上缠绕着可怕的闪电；
你时而发出隐隐的霹雳，
用雨水浇灌贪婪的土地。
够了，躲开吧！你早该敛迹，
大地清新，风雨已沉寂，
清风温柔地抚弄着树叶，
将把你逐出这平静的世界。

（转引自郑泽生，耿龙明，1985（下）：147）

在这首诗歌的翻译中，译者尽量保留了原诗末尾押韵的特点，但是译者只能是在汉语中寻找相类似的押韵手段达到一种音韵效果。

由于两种语言的差异，译者所使用的音韵显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与原诗歌的音韵相一致了。这也可以通过翻译变异的相关性做解释，即语音面貌的变异必然伴随着音韵的变异，即使达到了一定的押韵效果，仍然无法同原作相一致。

2. 形式

前文我们说过，思维方式影响语言形式，语言形式体现思维方式。语言形式上的差异导致翻译变异是最为明显了。有的学者指出，从本体论角度看，东方人注重和谐，受《易经》哲学影响，强调从多归一的思想；而西方人，包括俄罗斯人，是分析的，强调由一到多的思想。由于西方人采用焦点视思维方式，中国人采用散点视思维方式，表现在俄汉语的句式上，则俄语句式多以主谓为核心（焦点）控制句内其他成分（如短语、从句），由主到次，由一到多，有人将这种句式称为"营造学法"或者"空间型构造法"；而汉语句式多以动词为中心，按照时间的先后逻辑顺序，由先到后，由多归一，有人将这种句式称为"时间造型句法"或称"编年史法"。俄汉句式上的这种差异有时会使翻译在语言形式上出现变异，翻译的时候，我们常常需要改变原文的表达形式，代之以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表达形式。

其实在描述西方语言和汉语言区别问题上，英汉对比研究者的成果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比如通过汉英对比研究，有的学者指出，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因此英语句式多呈"聚集型"，汉语句式则多呈"流散型"（参见连淑能，1993：29）。有的则更形象地把英语句子比作树式结构，把汉语句子比作竹式结构（潘文国，1997：197）。这种形象的比喻在俄汉语言中也同样适用。树式结构即以主谓为主干，像一棵大树一样，生出许多分枝。主干和分枝分别代表了句子的主要成分和次要成分。此外，分枝上还可添加上新的从句，越分越细，其结果形成了俄语纷繁冗长的主从复合句。由个体思维决定，俄语注重形合，遵守"中心透视"原则，强调结构完整和形态严谨。竹式结构即指"汉语句子一般简短明快，很少长句，恰似一根春竹，一节之后又生一节，中间掐断无伤大雅"（潘文国，1997：198）。这一形象比喻正好体现了汉语的主要特征——流线性和简约性。也可以概括为

汉语遵守的是“线性透视”原则。受整体思维影响，汉语遣词造句异常灵活，往往不受外形影响，而是从总体上通过逻辑事理来把握语义，即汉语注重意合。无论是“空间构造”还是“时间造型”，也无论是“线性透视”还是“中心透视”，语言形式和思维方式紧密结合。那么在翻译的时候，如果要考虑到汉语的表达习惯，势必会使原来俄语中的句式发生变异以适应目的语规范，同时，由语言形式所体现出来的逻辑思维也随之发生变异。让我们来看一例：

> Шум и грохот на лестнице, визг половиц в коридоре, — и в контору не вошёл, а влетел коренастый мужчина в кубанке, лихо заломленной на самый затылок, в стеганке защитного цвета, туго перетянутой военными ремнями. Нахлестывая плеткой по голенищу, словно расчищая себе дорогу, он стремительно, враскачку, прошагал к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скому столу, бегло окинул присутствующих лихорадочно блестевшими глазами. (转引自郑泽生、耿龙明，1986(下)：68)

这是一段对人物形象刻画描写。在这段描写中，作者试图勾勒出一个专横跋扈、欺上压下、官僚气十足的农庄主席形象。原文中只有两句话，如果按照空间型构造法将它分割则在第一句中主谓核心是“не вошёл, а влетел ... мужчина”，由这个核心句支配着其他成分，如 куда влетел, какой мужчина 等。第二句中主谓核心是“... он ... прошагал ... окинул”，控制着其他成分，如 как он, прошагал к кому-чему, окинул что，как окинул 等。这样看来，整个句式基本是由一到多，由主到次形成一种树型结构，注重形合。我们来看看译文：

> 译文1：楼梯上发出了一阵轰轰的喧闹声，走廊的地板吱吱呀呀地响着——一个头上歪戴着库班帽、身穿一件绗过的草绿色棉上衣，腰间紧紧地束着一副武装带的矮墩墩的男人，不是走进而是飞进办公室。他像扫清道路似的，用皮鞭使劲抽打皮靴筒，急匆匆地甩着膀子，大步走向主席的办公桌前。然后用两只

狂热的亮眼睛把在场的人闪电般地扫了一下。(同上,68)

译文2:楼梯上响起蹬蹬的脚步声,接着走廊的地板,吱吱呀呀地尖叫起来,一个矮墩墩的男人,一阵风似的闯进了办公室。他头上那顶库班羊皮帽,潇洒地歪扣在后脑勺上,他身穿一件绗过的紧身草绿色棉袄,十字交叉地斜束着一副武装带。他抡起马鞭,劈劈啪啪地抽打着马靴筒,仿佛在为自己净街开道,他大摇大摆地晃着膀子,大步流星地走向主席的办公室,然后用狂热的眼睛,一扫在场的人。(同上,69)

译文1在个别句式的处理上,前半部分是遵照俄罗斯人的习惯,用一连串的修饰语来说明中心语,遵于形合,但是后半部分无论如何摆脱不了汉语句式的个性特征而流于松散,求于意合。

译文2其实就是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语言形式上的变异,它通过将俄语的形合句转换成汉语的意合句,将俄语的空间性构造转换为汉语的时间性句法,使译文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同时,语言形式的变异暗含形象思维的变异是在所难免的:我们在阅读译文的时候,依次映入我们眼帘的意象已经不再是按照俄罗斯人的思维习惯冗长而拖沓,而是完全按照汉民族的思维习惯那样简短明快、结构紧凑。这表明,汉俄语言形式之间的差异常常需要译者对原文的语言形式甚至逻辑思维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变异。

3. 语义

在文本内容的传达上,传统翻译理论往往要求译文内容应该尽可能忠实于原文,既然承认翻译只是尽可能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而不是完全彻底、毫无遗漏地传达,那么,内容上的翻译变异也就不言而喻了。俄汉两种语言对语义的把握角度不同,因此,文本的内容也有相应的改变。

汉语在语义上的特点是重"神"轻"形"。事物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事物观察的角度。比如"鹤"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是个单义词。汉民族对鹤的观察多取其灵性、神态、气质、品格和习性,并由此产生某些联想意义。例如:

丹顶宜承日，霜翎不染泥。（鹤的纯洁）

——唐·刘禹锡《鹤叹》

声断碧云外，影沉明月中。（鹤声的洪亮）

——唐·白居易《失鹤》

黄鹤远连翩，从鸾下紫烟。
翱翔一万里，来回几千年。（鹤的飞翔力强）

——唐·李峤《鹤》

田鹤望碧霄，无风亦自举。（鹤的超凡脱俗）

——唐·钱起《田鹤》

鹤有思颙意，鹰无恋遁心。（与隐士相处）

——宋·王安石《重游草堂次韵》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与神仙同游）

——唐·崔颢《登黄鹤楼》

凡此种种，经过长期的沿用和积淀就形成了"鹤"自身清高隐逸的民俗意义，于是就有了"松鹤延年"、"梅妻鹤子"等国画的传统主题。

而俄语中，根据《俄汉详解大词典》黑龙江 1998 年版的注释，журавль 有三个含义：1）（天文学）天鹤星座；2）（动物）"鹤"，搭配的词组有"～ уссурийский 丹顶鹤"，"белый ～ 白鹤，仙鹤"，"серый ～ 灰鹤"；3）（井上的）汲水吊杆，桔槔 колодезный ～，或者简式起重装置。很明显，鹤的第三个含义源于鹤的外形特点，因为二者有相似之处：脚细长，头小颈长等。在《俄罗斯语言国情辞典》中，журавль в небе 还可以用来形容非常遥远的事物，没有把握的事。如：Буду писать пьесу без умцы. Впрочем — это журавль в небе.（Горький）。当然，万事都不是绝对的。如汉语中也常常出现"鹤立鸡群"的比喻，"鹤嘴镐"的称名（一种挖掘土石用的工具），以及见诸于文学创作中的形象类比："他颤巍巍地在胸口划了个十字，他那鹤一样的长腿颤抖着。"（《收获》，2001：49）

所以只能说，汉语特点更重于神似，俄语文法更偏于形似。因此，当中国人一提起"鹤"这一词，脑海里更多闪现的是鹤的飘逸、更

倾向于鹤的美好寓意。这样一来，翻译的时候究竟是追求神似还是形似就需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有一点需要指明，就是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会促使翻译有不同程度的变异。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鹤和журавль已经不可能代表相同意象，从而不可能达到相同的翻译效果。

这样，语言的差异使翻译在音韵、形式和语义等各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异，译者无论选择何种翻译，由这些因素所共同构成的译文的神韵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异。

第三节　文化差异和翻译变异

翻译变异还是文化差异的必然结果。任何一种语言都浸润着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这些文化特征在翻译时根本无法完整地传递给目的语读者。可以说，语言中文化因素的存在是使翻译变异客观存在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每一种语言都代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比如，以"一举两得"这个熟语来看，俄国人会说"одним выстрелом убить двух зайцев"（一枪打死两只兔子）、德国人说"Beide fleign mit einer klappe zu schlagen"（一个拍子打死两只苍蝇）、中国人则还可以用"一箭双雕"来表达这层含义。就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中也同样反映出各个民族自身独特的文化色彩。

文化差异在语言中的体现比比皆是。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两种不同语言中的文化转换。译者不能单纯地将翻译看作是一种语言转换的工具，要将文化和语言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文化因素在翻译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在考察翻译和文化的关系上，苏联文艺学派的代表人物加切奇拉泽（Гачечиладзе Г）曾引用前苏联翻译家奥格涅夫（В. Л. Огнев）的话指出"人类的健康血液通过它（翻译）的微血管进行输换。这是一种人类真正财富的自然选择。正如没有力量能阻止历史前进一样，人为地阻止交流文化信息的滚滚洪流也是不可能的"（加切奇拉泽，

蔡毅：28）。在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的领军人物中，巴斯奈特和勒弗菲尔是绝对不能不提的。勒佛菲尔明确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观，他主张译者应该学会自上而下的处理过程，即文化-文本-文本结构-段落-句子-短语-词。他把文本看作文化的一部分，认为译者的最终落脚点应该是文本，而不是停留在词和句子上。巴斯奈特一贯坚持将文化作为翻译单位，提出翻译对等就是原语和译语在文化功能上的等值的观点。以色列翻译理论家图瑞的描写翻译理论则以译语文化为背景来考察译作，探索文本以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而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对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强调证明了翻译对文化发展的重大影响，从而改变了文学界对翻译作品的认识。从这些学者的研究倾向我们更可以肯定，文化和翻译活动的紧密关系不容忽视。德国的弗米尔在对翻译活动的历史和内涵进行了认真分析之后指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转换。译者应精通两种或多种文化，由于语言是文化内部不可分割的部分，译者也就要相应地精通两种或多种语言。其次，翻译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行为。换句话说，它是一种'跨文化的行为'"（廖七一，2001：364）。翻译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文化传播和文化阐释。国内的学者也以清醒的文化意识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比如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重点研究了"翻译对于文化（尤其是译入语文化）的意义和影响，它在文化史上的作用，以及文化对于翻译的制约，特别是在通过翻译摄取外域文化精华时，翻译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发生什么样的变异"（王克非，1997b：4）。刘宓庆的《文化翻译论纲》站在翻译学的视角对语言中的文化信息、文化翻译新观念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探索。

具体到俄汉两种语言对文化因素的关注也可谓由来已久。除了最初王秉钦的《文化翻译学》到后来的杨仕章的《文化翻译论略》，以及李磊荣的《民族文化可译性》等相关专著和论文之外，还有许多文章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指明俄汉文化差异在翻译中的体现。在翻译中如何处理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差异，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具体实践中都是一个重大的课题。韦努蒂曾把对文化差异进行不同处理的翻译方法区分为"归化"（одомашнивание）和"异化"

（очужестранивание）。归化是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把外国的价值观归化到目的语文化中，异化则是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表现出来。早在60多年前，我国著名学者鲁迅也提出，在动笔翻译之前"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罗新璋编，1984：301）。尽管东西方学者对异化还是归化的翻译方法各抒己见，我们认为还是郭建中先生说得好："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互为补充的。文化移植需要多种方法和模式。……译者既可采用'归化'的原则和方法，也可采用'异化'的原则和方法。至于在译文中必须保留哪些源语文化，怎样保留，哪些源语文化的因素又必须作出调整以适应目的语文化，都可在作者意图、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读者对象等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做出选择"（郭建中，1998：17）。

比如《红楼梦》这样一部凝聚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巨著犹如中国文化的大百科全书一样，吸引着全世界人们的目光。这样一部东方文化韵味十足的作品别说是西方人很难读懂，即便是中国不具备较高文学素养的人也未必搞得明白，难怪"红"学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这样一部充满众多意象的作品在翻译过程中终究会有所损失和改变。试举一例：

例：宝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这边来。（曹雪芹、高鹗，1982：23）

译文1：Но шёл он медленно, шаги дела маленькие, не больше **трёх вершков**, поэтому путь занял довольно много времени.（В. А. Панасюк. «Сон в красном тереме». 1958）

译文2：Шёл он медленно, семения ногами, каждый шаг не больше **трёх цуней**, и путь до покоев госпожи Ван занял довольно много времени.（В. А. Панасюк. «Сон в красном тереме». 1995）

在这个例子中，有一个长度单位"寸"，译文1中的表达是"вершок"，译文2中的表达是"цун"。译文1如果说在表达"很短、很小、很慢"这个转义上还勉强与原文等值的话，那么 вершок 自身

的长度大小则给译文的读者带来了差异，要知道一俄寸等于 4.4 厘米，而一寸等于 3.33 厘米，二者在数量上还是有差别的。而译文 2 的 цун 倒是保留了汉语的音，有心的读者可以去查阅一下 цун 相对应的汉语的“寸”的解释，也许能明白曹老这里到底要说个啥。两种译文各有利弊，又各有损伤，也许搭配起来欣赏看最合时宜。文化差异对翻译变异的影响立竿见影，对中国读者来说，中国诗词中的一棵垂柳就可以油然而生很多联想，而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情形就不一样了。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部作品都有若干个互补的译文，但是有一点毫无疑问，多种译本一定会有互相补充并从不同角度诠释原著的能力。

第四节　译者个性和翻译变异

翻译活动是离不开译者的。我们说，翻译过程中有了译者的参与才能使语言符号免于静止的状态而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化。因此，翻译活动必须有译者的积极参与才能使翻译呈现出动态性。从有翻译活动开始，译者的显性和隐性问题一直都是关注的焦点，并且只要翻译活动不止，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也不休。

我们说译者的创造性在翻译语文学派伊始就得到极大的满足。西方翻译的文艺学派主要关注的是译文，强调的是翻译的创造性特征。在古罗马时期，译者就曾经被比作一个“侵略者”形象，而原文的内容则是译者的“俘虏”。布拉格学派代表人物吉里·列维（Левый）曾经高度评价文学翻译中译者个性的作用，把它与原作的创造性主体相提并论，认为任何一种批评方法都无法把译者的个性全都包容其中（李文革，2004：40）。他还为研究译者的个性提出了几种方法。可见，在翻译活动文艺学派初期，译者的地位曾经一度显赫，表现出很强的个性。

翻译的语言学派一改文艺学派零散式、随笔式的翻译漫谈，试图借助语言学的发展成果为翻译理论研究建立科学体系。在翻译语言学派发展的进程当中，等值是语言学翻译理论永恒的话题。他们大部分认为只要找到语言和语言之间基本翻译的对等方法，那么语言

之间的翻译问题基本就可以解决。正是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翻译理论处处以语言学为依托，制定和规定出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等值的各种转换模式，从最初将翻译研究深入到词、短语和句子的层次上，到突破单个词和句子的局限扩大到话语结构和交际功能的研究上，再到以篇章作为翻译单位，以求从内容和形式上寻求语言之间的等值等，翻译的语言学派总是关注源语文本，总是围绕等值的问题展开细致而繁琐的分类。因此，在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中虽然也提及译者的重要地位，但是种类繁多的等值规则对译者的创造性似乎视而不见。译者的任务就是能最大限度地保证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的等值，超过这个等值的界限，译者则会背负没有能力、没有责任的恶名而招致批评。翻译的语言学派擅长制定出语际之间转换的规则和程序，但是视野过于狭窄，缺乏对翻译应有的动态研究。他们把作者和译者的关系看成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对源语文本或原作者唯命是从，他们要求译者尽量保持"中立"，排除偏见，避免自己对目的语文本的干扰，以使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在神韵或接受效果上达到最大限度的近似或对等。总之，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由于过分地将自己局限于语言学的研究范围、过分地依赖于采用语言学研究所擅用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并将自己的研究对象过分地局限于对语言规律客观性的发掘，而忽视了始终操纵着翻译过程的重要主体——译者——的研究，从而在研究过程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棘手问题。

由于对语言学派的不满，翻译研究者们另辟蹊径，开始将翻译研究纳入到整个文化的范围内进行。翻译研究学派的创始人霍尔姆斯打破翻译理论以原著为中心的思想，认为翻译过程中所作出的抉择和决定都是主观的，而这些决定的不同则取决于译者本身的素养、最初的选择、语言修养等。以色列翻译理论家图瑞相继提出了以译文为中心的翻译理论，使翻译活动受制于译入语文化里的各种常规。而到了翻译文化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勒弗菲尔(Лефевр)则提出"翻译就是重写的一种形式"的论断，彻底为译者的随意行为提供最好的注脚。在文化学派看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受到的制约其实并不是来自源语文本，而是来自目的语文化中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各方

面的因素，在目的语文化规范的"授权"下，译者好像有无限地支配和操纵源语文本的权利。在对译者权利张扬的大潮中，功能派翻译理论中的目的论突破了对等理论的限制。弗米尔的目的论所强调的是译者不必对源语文本或原作者唯命是从，而应该考虑翻译的服务对象，每一个译文都直接指向一个预期的读者。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个特定的译文接受者群体为对象，使译文在目的语环境中具有某种功能。

由此一来，译者从一个隐居的道士成为一个越来越占有主动权的君主，这种角色的转变也正如袁莉所指出那样，"当我们不再把对翻译的理解停留在字词的层面上，不再试图去寻找与原文本对等的影子，而是把翻译文本看作经过变形和改造，融入译者的主观审美意向和历史存在的一种自足的艺术创造产物时，立刻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面临关于翻译主体性及其能动空间的提问"（袁莉，2002：402）。

因此说，译者是翻译活动的施为者，译者是翻译链条上的重要一环。译者的创造性行为在翻译过程中越来越得到彰显。而由于译者本身的语言修养、审美能力、个人经历、对原作的解读水平和译入语表达能力的不同，使译本不可避免地带有译者的主观色彩。译者的目的、功能、审美观点也是导致翻译变异出现的重要原因。总之，文学翻译从解读到表达，译者的能动性参与尤为重要，而译者的能动性越明显，翻译变异的发生越可能，译文和原文的差异也越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此不必赘述。

第五章　翻译变异的限制

“存在即是合理的”是黑格尔的一句名言。我们运用这一种哲学的视点来看待翻译变异问题似乎对变异存在的态度宽容了很多。我们有必要先从观察翻译变异的表现形式入手，剖析翻译变异存在的原因，从而探索翻译变异内在的规律。

在第三章中，我们分析了影响翻译变异的主要因素，其中文本的特征即开放性为译者的翻译变异提供了机会。但是否会有人产生如下的疑问，即翻译变异可以是随意而为的吗？翻译变异是否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呢？如果有，那么制约翻译变异的因素又是什么呢？我们回头再仔细想想上几章的那些例子，似乎并没有哪一个译本几乎完全变异得走了样子，基本还是保证原著的风貌不变。各个译本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译者翻译行为所要掌握的尺度。那么这种度应该受到什么来限制，又是在何种范围内才算是合理的呢？我们从文本的确定性和翻译规范两个角度分别对这个问题探讨。

第一节　文本的确定性对翻译变异的限制

1.1　文本的确定性

前文在谈到影响翻译变异因素的时候，我们指出第一个基本的影响因素即是文本的开放性特征。正是因为文本中具有大量的未定点和空白处，需要译者进行填充，所以不同的译者会因为各自理解的不同、经历的不同、表达手段的不同，使得译文呈现出不同。我们说，这一点或许可以认为不是以译者自身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文本的开放性特征所决定的。但是，文本的开放性并非为译者的翻译行为敞开无限的大门，即译者的理解和解释并不是所有都是同等有效的。文本除了这种开放性的特征之外，还有自身的确定性特征。我们说

文本是开放性的，因此填充空白和确定未定点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说开放性也是有限度的，开放的程度要受到文本自身确定性的制约。那么文本的确定性因素具体指什么呢？我们从文本的结构、文本的理念意义两个角度加以论述。

从文本的结构来看，任何一个文本都有其独特的内在结构，这种固定的结构对于文本意义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在谈到文本结构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提到英伽登的图示化结构。根据英伽登所言，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图示化结构，"作品的图式化结构由于其内在的未定点和空白而为读者提供了想象的自由"（转引自朱立元，1997：138），"读者的作用根据历史和个人的不同情况可以以不同方式来完成，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文本的结构允许有不同的完成方式"（转引自张隆溪，1986：200）。正是由于这种文本自身的不确定性才引起了文本翻译变异的发生。（参看第四章第一节）但是，图示化结构"自身的封闭性"又为阅读提供了基本限制。"因此，正确而有效的阅读就是那种在作品图式化结构所允许的范围内自由想象的阅读。"（同上，138）

这也就是说，文本作为图示化结构，并不只是含有未定点，除了未定点之外，它还包含着无数的确定性因素。美国诠释学家简·汤普金斯也曾经指出："在任何情况下，文本的'具体化'都要求读者的想象力有所作为，每一读者都以自己的方式填补文中未形诸文字的部分，填补'空白'或'不确定'之处。但这并不是说，由此得到的文本纯属读者的主观臆造，为读者的创造活动带来众多的解释，被看作是文本意义'不可穷尽'的明证"（转引自张廷琛，1989：226）。

伊瑟尔吸收英伽登的理论，继承并发挥了文学文本的未定点理论。伊瑟尔在充分肯定读者创造性的同时，指出"读者的反应无论多么独特，都总是由作品本文激发引导出来的"（张隆溪，1986：199）。"文本的意图可以是多元化，但是它们无不是发端于作品本身，隐含在作品之中，受到作品的制约，并且最终都可以回溯到作品中去"（转引自张廷深，1989：226）。

这样看来，文本是一个集未定和确定、开放和封闭于一体的图示化结构。它一方面由于文本图示化结构中充满的大量未定点和不确

定性因素而呈现出开放性特征,使得隐含的读者(译者)在对文本理解的过程中会因此而表现出差异。具体到翻译中表现为不同的翻译变异形式;而另一方面译者的任何翻译行为都是针对某一个源语文本,那么他就势必会受到该源语文本自身封闭性的制约。

从文本的理念意义来看,根据胡塞尔的意义构成理论,正如同一对象具有以无限多样的方式呈现给意识的可能性一样,一个文本的理念意义也有着以无限多样的方式向读者意识呈现的可能性。这无限多样的呈现体现为文本的个别意义或变形意义,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则体现为对各种个别意义的体验。从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观点出发,我们认为理解具有客观性,而其客观性体现在,所有的理解或阐释都是从文本的理念意义出发的,都是对理念意义的充实和实现。文本的开放性体现在,而且仅仅体现在理念意义并不设定任何一个个别意义的实际存在,它只设定虚拟、虚设的诸种变形。换句话说,理念意义只规定它的变形意义应该如何如何,而不说它的变形实际上是怎样怎样。

这样,文本自身图示化结构的封闭性以及文本理念意义的客观性构成了文本的确定性因素,正是文本的这些确定性因素对读者(译者)的翻译变异有了一定的限制。翻译变异的产生绝对不应该是译者的马虎或者译者"天马行空"任意挥洒的行为,而应该是译者理智地受到文本确定性因素的制约。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正是由于文本自身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双重属性,使得以文本为对象的译者的翻译行为呈现出自由和约束辩证统一的关系。翻译变异在具有自由度的同时必然有来自文本自身的限制。正如伊瑟尔所言"从一篇作品的整体来看,空白总是处于上下文的制约之中,这种制约机制给译者的'具体化'过程加上了一定的规范。因此,空白其实并不是一些可以任意倾注读者日常体验与情感的空穴,而是相反,空白往往具有向某一方向、性质的想象活动开放的限定性"(转引自张廷深,1989:33—39)。

1.2 文本的确定性对翻译变异的限制

翻译是一项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它必然要指向一定的对象,

这个对象就是文本。上一小节中我们从两个方面论述了文本在具有开放性特征的同时还不能忽视它自身的确定性因素。在这一小节中，我们着重论述一下文本的确定性是如何对翻译变异进行限制的。

我们说任何文本都因为它自身的未定点和空白的存在而具有不同的确定和具体化方式，所以才会导致同一源语文本在不同的时代，甚至是同一时代，可以拥有不同的、多个同样有效的译本。但是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思考，无论一部作品被重译多少次，由谁来重译，是在不同的时代还是相同的时代重译，无论《安娜·卡列尼娜》有多少个汉译本，它们都依然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相似，会体现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某些基本特色。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译者或者读者所得到的文本的意义是完全等同于或近似于作者的意图，是否和作者意图完全吻合似乎只有求证于作者本人才知道。如果恰巧和作者意图一致，那也只能是一种偶然。但是纵然是无法和作者的意图一致，我们敢肯定一点的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绝对不会被译成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也绝对不会被翻译成普希金的《村姑小姐》。正如金圣华教授所言“不同译者个性有异，禀赋相殊，经他们的手笔，自然产生不同的译品，但基本上，伟大的演奏家不会将贝多芬弹成莫扎特，肖邦弹成德彪西，成功的翻译家，亦当如是”（崔永禄，2003：前言）。我们说这正是文本的确定性因素使然。这种确定性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翻译变异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我们来看一例：

> Весна долго не открывалось. Последние недели поста стояла ясная, морозная погода. Днём таяло на солнце, а ночью доходило до семи градусов; наст был такой, что на возах ездили без дороги. Пасха была на снегу. Потом вдруг, на второй день Святой, понесло теплым ветром, надвинулись тучи, и три дня и три ночи лил бурный и тёплый дождь. В четверг ветер затих, и надвинулся густой серый туман, как бы скрывая тайны совершавшихся в природе перемен. В тумане

полились воды, затрещали и сдвинулись льдины, быстрее двинулись мутные, вспенившиеся потоки, и на самую Красную Горку, с вечера, разорвался туман, тучи разбежались барашками, прояснело, и открылась настоящая весна. Наутро поднявшееся яркое солнце быстро съело тонкий ледок, подёрнувший воды, и весь тёплый воздух задрожал от наполнивших его испарений отжившей земли. Зазеленела старая и вылезающая иглами молодая трава, надулись почки калины, смородины и липкой спиртовой берёзы, и на обсыпанной золотым светом лозине загудела выставленная облетавшаяся пчела. Залились невидимые жаворонки над бархатом зеленей и обледеневшим жнивьём, заплакали чибисы над налившимися бурою неубравшеюся водой низами и болотами, и высоко пролетели с весенним гоготаньем журавли в гуси. Заревела на выгонах облезшая, только местами ещё не перелинявшая скотина, заиграли кривоногие ягнята вокруг теряющих волну блеющих матерей, побежали быстроногие ребята по просыхающим, с отпечатками босых ног тропинкам, затрещали на пруду весёлые голоса баб с холстами, и застучали по дворам топоры мужиков, налаживающих сохи и бороны. Пришла настоящая весна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ч. 2, т. 1, стр. 170—171)

译文1：春天姗姗来迟。大斋期后两三个星期天气一直是晴朗而严寒的。白天，在阳光下温暖得可以融解冰雪，但到了晚间，却冷到零下七度。雪面上冻结了一层厚冰，以致他们可以坐着车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过。复活节的时候还是遍地白雪。但是突然之间，在复活节第二天刮了一阵暖和的风，乌云笼罩大地，温暖、猛烈的雨倾泻了三天三夜。到礼拜四，风平息下来了，灰色的浓雾弥漫了大地，好像在掩蔽着自然界变化的奥妙一样。在浓雾里面，水流淌着，冰块拆裂和漂浮着，溷浊的、泡沫翻飞的急流奔驰着；在复活节一周后的第一天，傍晚时候，云开雾散，乌

云分裂成朵朵轻云,天空晴朗了,真正的春天已经来临。早晨,太阳灿烂地升起来,迅速地融解了覆盖在水面上的薄薄冰层,温暖的空气随着从苏醒的地面上升起来的蒸气而颤动着。隔年的草又返青了。鲜嫩的青草伸出细微的叶片;血球花和红醋栗的枝芽,和桦树的黏性嫩枝都生机勃勃地萌芽了;一只飞来飞去的蜜蜂正围绕着布满柳树枝头的金色花朵嗡嗡叫着。看不见的云雀在天鹅绒般绿油油的田野和盖满了黄褐色污水的洼地和沼泽上面哀鸣;仙鹤和鸿雁高高地飞过天空,发出春的叫喊。脱落了的毛还没有全长出来的家畜在牧场上吼叫起来;弯腿的小羊在它们那掉了毛的、咩咩叫着的母亲身边欢蹦乱跳;敏捷的小孩在印满了赤脚痕迹的干巴巴的路上奔跑,可以听见在池旁浣衣的农妇们快活的闲谈声,和农民们在院子里修理犁耙的斧声。真正的春天已经来临了。(周扬,1997: 200—201)

译文2: 春天温暖得很慢。大斋期最后两三个礼拜还是晴朗而严寒的天气。白天冰雪在阳光下开始融化;夜里,气温降到零下七度;路上还结着厚厚的冰,马车在没有路的地方也可以通行。复活节依然一片积雪。复活节的第二天,忽然吹来一阵暖风,乌云笼罩大地,下了三天三夜温暖的暴雨。到星期四,风停了,灰色的浓雾弥漫大地,仿佛在掩盖自然界辩护的秘密。在雾中,春潮泛滥,冰块拆裂、漂动,泡沫翻腾的浑浊的溪水奔腾得更加湍急。在复活节后的第七天,从傍晚起雾散了,乌云碎裂得像一块块羔皮,天空晴朗了,真正的春天到了。早晨,灿烂的太阳升起来,迅速地吞噬了水面上薄薄的浮冰,温暖的空气带着充满苏醒过来的大地的水蒸气晃动着。隔年的老草和刚出土的嫩草一片葱绿,绣球花、醋栗和黏稠的桦树都生意盎然地萌芽了。金黄色花朵累累的枝条上,一只蜜蜂嗡嗡地飞来飞去。看不见的云雀在天鹅绒一般的田野上空,在盖满冰块的流茬地上哀鸣;鹤和雁发出春天的欢呼,高高地在上空飞过。牧场上,脱毛还没有长好的牲口嚎叫起来;弯腿的羊羔在咩咩叫着的掉了毛的母羊周围欢蹦乱跳;活泼的孩子在留有赤脚迹印的刚干的村路上奔跑;从池塘旁边传来洗衣妇快活的谈话;家家院子里扬起修理犁

耙的斧声。真正的春天来到了。(草婴,1989: 194—195)

译文3: 春天来得还不够畅快。大斋期的最后两个礼拜天气一直是晴朗而严寒的。白天阳光下冰化雪消,而夜晚又冷到零下七度;雪面上结了厚厚一层冰,节后的第二天,便刮起一阵暖风来,天空乌云密布,下了一场三天三夜的暖和的暴雨。到礼拜四风平息下来了,又是一场浓密、潮湿的大雾,仿佛要把大自然变化的奥秘都掩盖起来。在大雾下,春潮泛滥了,坚冰破碎、漂动了,浑浊的、泡沫翻滚的河水流淌得更快了,到复活节后的第七天傍晚,大雾消散,浓云散裂成一朵朵白云,天晴了,真正的春天也终于露面了。早晨升起了明亮的太阳,水面上的一层薄冰迅速消失、苏醒的土地上蒸腾的热气充满着天空,使得温暖的大气也颤动起来。隔年的绿草泛绿了。新草长出尖尖的嫩芽来;雪球花、醋栗树,和那黏糊糊的、带酒味儿的白桦树都绽出了新芽,在布满金黄色小花的一枝树条上,一只刚被搬出室外的蜜蜂嗡嗡地绕来绕去。几只看不见的云雀在毛茸茸的绿草地上和仍带薄冰的割过留茬的庄稼地里婉转地歌唱,麦鸡与大雁高高飞起,咕咕地迎接着春天。牧场上,脱了毛还没全长出来的牲口在阵阵吼叫,弯腿的小羊羔在它们剪过毛的、咩咩叫着的母亲身边蹦跳着;快腿的孩子们在小道上奔跑,他们的光脚印子把路上的污泥踩得干起来了,农妇们在池塘边上洗着粗麻布衣裳,一边快活地唧唧喳喳交谈着,院子里传来农夫们修整犁耙的斧头声。真正的春天来到了。(智量,1996: 133)

译文4: 春天很久不肯露脸儿。大斋期的后两三个星期一直是晴朗而寒冷的天气。白天里,冰雪在阳光下融化;到晚上,气温又降到零下七度。雪面上结起厚厚的冰壳子,坐马车可以在上面行驶。复活节时候还是满地冰雪。复活节后第二天,忽然刮起暖洋洋的风,乌云涌来,下了三天三夜暖和的暴雨。到星期四,风息了,涌起灰蒙蒙的浓雾,好像是为了掩盖大自然变化的秘密。在雾里,水流动起来,河冰碎裂,漂动,泡沫翻飞的浑浊的流水流得更快了,到了复活节后第一周周末,傍晚浓雾消散,乌云化作朵朵白云四散奔逃,天空晴朗了,春天露出了真面目。

第二天早晨，明亮的太阳升起来，迅速吞食了水面上结的一层薄冰，整个温暖的大气因为充满了复苏的大地的水蒸气而颤动起来。老草绿了，嫩草冒出尖尖的芽儿。血球花树、醋栗树和黏黏的、带酒香的桦树都鼓出芽儿，在缀满金色小花的柳枝上，有一只开始外出采蜜的蜜蜂嗡嗡叫着。望不见的云雀在绿茸茸的草地和结了冰凌的庄稼茬地上空歌唱，凤头麦鸡在灌满黄褐色积水的洼地和沼泽地上空如怨如诉地叫着，仙鹤和鸿雁带着春天的欢叫声高高地飞过。脱了毛、只长出一片片新毛的牲口在牧场上放声大叫，弯腿的羊羔在掉了毛的咩咩叫的母亲周围欢蹦乱跳，腿脚灵活的孩子在到处是光脚印子的小路上奔跑，洗衣妇女都快活的声音在池塘边叽叽喳喳响个不停，家家院子里响起庄稼人修理犁耙的斧声。真正的春天来到了。（力冈，1992：173—174）

这是摘自《安娜·卡列尼娜》中一段描写春天的文字。虽然看上去清新怡人，朴实无华，但文中仍然充满着很多未定点和空白处需要读者来填充。自然而然，每个读者对这段春天的描写会因为各自不同的经历和感受而大不一样。人们的脑海里会浮现出对各种细节不同的想象，结果不同读者面前春天的景象是不同的。译者，作为一个特殊的读者，同样要经历这样一个想象的过程，而他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深入地把握各种细节的形象，还要用译语的表达手段表达出来，而他对那些未定点和空白处的填充自然就会通过他具体的翻译行为表现出来，这样，不同的译者会因为各自确定和填充空白点方式的不同而对同一段描写产生翻译变异。

我们试着来看几处描写。比如，四位译者在处理“... разорвался туман, тучи разбежались барашками, прояснело, и открылась настоящая весна.”的时候，周译“……傍晚时候，云开雾散，乌云分裂成朵朵轻云、天空晴朗了，真正的春天已经来临”；草译“……从傍晚起雾散了，乌云碎裂得像一块块羔皮，天空晴朗了，真正的春天到了”；智译“……傍晚，大雾消散，浓云散裂成一朵朵的白云、天晴了，真正的春天也终于露面了”；力译“……傍晚浓雾消散，

乌云化作朵朵白云四散奔逃，天空晴朗了，春天露出了真面目”。这里，雾到底是“浓雾”还是“大雾”或者只是淡淡的“雾”气，四位译者带给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同样，在描写乌云散去的时候，四位译者的变异形式也不一样，是“乌云分裂成朵朵轻云”，还是“乌云碎裂得像一块块羔皮”，是“浓云散裂成一朵朵的白云”，还是“乌云化作朵朵白云四散奔逃”。显而易见，力译在处理的时候加入了“四散奔逃”这个拟人的形象，令我们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朵朵白云迅速向四面飞散开去的动态画面，而其他的译文并没有包含这种想象，这正是文本的未定点和空白处提供给不同译者的想象空间所致。

再看下一句，“Залились невидимые жаворонки над бархатом зеленей и обледеневшим жнивьём, заплакали чибисы над налившимися бурою неубравшеюся водой низами и болотами, и высоко пролетели с весенним гоготаньем журавли в гуси.”

> 周译：“看不见的云雀在天鹅绒般绿油油的田野和盖满了黄褐色污水的洼地和沼泽上面哀鸣；仙鹤和鸿雁高高地飞过天空，发出春的叫喊。”
>
> 草译：“看不见的云雀在天鹅绒一般的田野上空，在盖满冰块的流茬地上哀鸣；鹤和雁发出春天的欢呼，高高地在上空飞过。”
>
> 智译：“几只看不见的云雀在毛茸茸的绿草地上和仍带薄冰的割过留茬的庄稼地里婉转地歌唱，麦鸡与大雁高高飞起，咕咕地迎接着春天。”
>
> 力译：“望不见的云雀在绿茸茸的草地和结了冰凌的庄稼茬地上空歌唱，凤头麦鸡在灌满黄褐色积水的洼地和沼泽地上空如怨如诉地叫着，仙鹤和鸿雁带着春天的欢叫声高高地飞过。”

抛开四位译者对形象的把握并非全部完整不说（如，周译和草译中不是麦鸡在哀鸣而是云雀，智译虽然有麦鸡的出现，但是它并不是出现在沼泽地上。只有力译把各种鸟的位置安排妥当），光是在现有几处形象的处理上也有差别，例如到底是“盖满了冰块”还是“仍带薄冰”又或者只是“结了冰凌”？相信读者在读到此刻的时候，脑中

的想象一定不一样。又如,智译在描写鸟儿迎接春天的时候的欢叫声中,形象地加入"咕咕"这一拟声词,旋即使整个画面生动了起来,似乎比单纯的"发出春的叫喊","发出春天的欢呼","带着春天的欢叫"更加惟妙惟肖。

从这几组例子的分析来看,源语文本中充满了大量未定点和空白,促使译者采取不同的变异手段。这样的例子在翻译中不胜枚举。在译者为源语文本具体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即使并非迥然有异,但也会有些微差异的不同形象。那么这些变异再经过读者的阅读,又会产生不同于源语读者的感受,不同译文在不同读者脑海中所表现出来的画面更是千差万别了。但是需要强调一点的是,这两种译文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并不仅仅是语言表达形式上的不同,还有不同译者各自在脑海里经由具体化所产生的想象不同。或者说,是他们面对源语文本的空白和未定点时进行了不同的填充和确定,因而对源语文本进行了不同的解释,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翻译变异,最终得出了不同的译文。这正是我们第三章所说的文本的开放性特征导致了翻译变异的形成。

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不同的译文中得到一个与源语文本大致相同的印象。译者的任何翻译行为始终都是针对某一个源语文本,那么他就势必会受到该源语文本自身封闭性的制约。比如从上面这段春天的描写中我们大体上知道"春天悄悄地来了",复活节的前后下了"暴雨",出现了有"雾"的天气,后来邻近傍晚的时候,"云开雾散",预示着春的到来。草儿冒出"尖尖的芽儿",桦树漂着"酒香","蜜蜂"在嗡嗡"飞","大雁"在咕咕"唱","羊儿"在咩咩"叫",快乐的"孩子们"在欢腾,洗衣的"农妇"在唧唧喳喳地"交谈"。春天就这样奔跑着来了。也就是说,源语读者在读到源语文本的时候也应该和上述的画面大致相同。也就是说,尽管在我们面前是不同的云、不同的冰、不同的叫声、不同的花草,尽管我们可以对"大雁的叫声"、"冰块的形状"等作出各自不同的想象,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乌云"散、"冰雪"融化、"太阳"照耀、"大雁"飞、"云雀"叫、"蜜蜂"嗡、"孩子"跑、"妇女"唧唧喳喳、"庄稼人"叮叮咚咚这些景象,并且由这些景象激发在译者的脑海里呈现出不同的画面。

译文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效果，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文本除了包含着无数的未定点和空白处以供读者的想象力天马行空之外，它同样还包含着无数的确定性因素，包括文本自身的封闭性和文本自身的理念意义而维系着读者。正是因为文本含有这样或那样的确定性因素，译者的翻译变异不可能游离源语文本太远，不至于让读者摸不到原文的痕迹。

那么译文读者在读到这篇译文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想象呢？我们先来看看我国著名散文家朱自清的佳作《春》："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花里带着甜味"，"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与轻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响"，"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直逼你的眼"，"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从这一段对春的描写中，我们发现，在汉民族文化中对于春的描写也可以同俄国人描写春天一样具有相同的气息、好不欢腾的景象。换句话说，在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下，人们对春的感知可能会相同。那么我们继续推理似乎可以认为，即便是一个不懂俄文的中国读者在阅读托尔斯泰所描写的春的译文的时候，他也可以获得一种与源语读者在阅读源语文本时所能获得的大致相似印象。

第二节　翻译规范对翻译变异的限制

一提到"变异"自然而然会想到规范。除了文本自身的确定性因素对翻译变异有限制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限制因素——翻译规范。我们说，翻译变异是以研究译文为基础的，也即"以目的语文本"为研究对象。这不得不令我们想起描述翻译学所提倡的研

究方法。在经历了传统的翻译研究长达半个世纪的规定性翻译探索之后,研究者们越来越不能容忍翻译的语言学派所制定的那些转换模式对译者翻译行为的禁锢。更何况,大量的翻译实践以自己真实的翻译结果向研究者们证实,翻译是不可能完全遵循那些固有的、一成不变的转换模式来实现的。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一股新兴的以描述性研究方法为主的翻译流派悄然而生。在以原文为研究对象制定各种翻译转换规律不能得出满意结果的时候,研究者们把目光锁定在业已完成的译文。以这样的翻译事实为依据来探索形成这种翻译事实的原因似乎比单纯地制定翻译模式,从而去刻板地套用更具灵活性。

通过观察翻译变异现象,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变异行为所遵循的某些规范的轨迹。如前文对翻译变异连续性和相关性所描述的那样,每一种翻译变异成分都不是孤立的,它置身于特定的目的语文本之中,它要受到目的语文本中其他成分的影响。同时,每一种翻译变异成分也置身于特定的目的语文化中,受到目的语文化的影响。总之,翻译规范对翻译变异会有一定程度限制。但是对于不同的变异成分控制的程度是不一样的。翻译规范会对于与其稳定性关系最为密切的那一部分的翻译变异加以最严厉的控制。同时,译者也会受到进入他视野范围内的翻译规范最为严格的制约。那么到底翻译规范具体包括什么?又是如何制约翻译变异的呢?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翻译理论界对翻译规范的界定。

1. 翻译规范的概念

目前,翻译理论领域中的“规范”概念还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我们列举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1. 巴切(Bartsch)认为“规范是正确性观念的社会现实”;2. 图瑞(Toury)认为“规范”是“对翻译进行描述性分析的一个范畴,即某一译语社会里所共享的价值和观念,如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适当的,什么是不适当的,转化成在特定情况下正确的适当的翻译行为原则”;3. 赫曼斯(Hermans)认为“规范是心理和社会实体,是人们互动交际中重要的构成因素,属于社会化进程中的一部分。从广义上讲,规范涵盖常规

与法令之间的全部领域”(参看韩江洪、张柏然,2004:53)。

对规范概念何时进入翻译研究领域的问题也是说法不一,英国的贝克尔(Baker)认为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图瑞首先引入的。但是赫曼斯却认为,应该是从波波维奇于1968年和1970年对翻译规范问题的讨论开始。但图瑞本人称,并不是他自己将翻译和规范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而是利维和霍尔姆斯。起初利维并没有指出翻译规范的概念,他也没有明确指出,到底是什么影响翻译的选择,但是他指出,翻译是一个作决定的过程。这句话的潜在意思就是说,无论是在翻译的哪个阶段,包括从原文的选择、翻译策略的确定,到翻译时具体的遣词造句,译者都需从诸多的选项中作出唯一的选择。这种选择与生物完成一次进化要面临很多选择的情形十分相似:只有那些适应生存环境的,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生物物种才会被保留下来,才会被选择,这也是达尔文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核心。生物的自然选择是遵循一定规律的,通常都是受环境因素的控制。翻译选择也不例外。

从总体来看,译者的选择并不是杂乱无章,也是遵循一定的规律。但是究竟是谁在操纵或影响着翻译行为一直是个疑惑。波波维奇(Попович)揭开了这个谜团。波波维奇认为,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作出选择的原因有一部分就是规范,正是规范导致了不同译者在选择上的差异。以色列的翻译理论家图瑞在利维和波波维奇的基础上,以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为出发点,对“规范”和“翻译规范”概念进行了更为详细的研究。图瑞指出,规范是“将某群体所共同分享的普遍价值观和思想……转化为适合于并且能够应用于具体情境的行为指令(performance instructions),说明什么是规定要做的,什么是不允许做的,什么是可以容忍和接受的。”翻译是一项受规范支配的活动,译者不必过分拘泥于在以源语为依据的“等值”和以目的语为依据的“接受”两极之间进行取舍。“在翻译过程的每个阶段中以及在其产物及译文的每个层次上,翻译规范都在运作”(陈德鸿、张南峰编,2000:130)。

在明确规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且会在整个翻译中对译者的行为有不同程度影响之后,翻译理论家们开始从不同角度对翻译规范

作各自不同的分类。比如，图瑞将翻译规范划分为三种，即基本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继图瑞之后，赫曼斯对翻译规范的本质和适用性等方面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他在图瑞提出的三个"规范"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四种不同层次的制约：惯例、常规、规则和法令。后来，诺德又划分出结构规范和调整规范，而彻斯特曼则划分出产品规范（或期待规范）和生产规范（或过程规范）。至此，翻译规范的名目繁多、越分越细。但不论种类多少，翻译规范概念有效地取代了对等的概念成为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关键性的术语。那么规范是如何对译者的变异行为进行制约的呢？我们以彻斯特曼的期待规范为例：

彻斯特曼的期待规范是指"读者对翻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期待而建立起来的一种规范"（转引自孙会军，2004：69）。比如对读者可接受性和译文风格等方面的期待。试看一例：

> Вскоре после манифеста семнадцатого октября задумана была большая демонстрация от Тверской заставы к Калужской. Это было начинание в духе пословицы "**у семи нянек дитя без глазу**."（Б. Л. Пастернак，«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转引自杨仕章，2003：189）
>
> 译文 1：圣旨在十月十七日颁布之后，很快地筹划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游行的路线是从特维尔门到卡卢加门。这次游行的发动工作非常混乱。（力冈、冀刚译）
>
> 译文 2：十月十七日的宣言公布不久，就策划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游行。游行路线从特韦尔城门起到卡鲁日城门。但这次游行却没搞成，应了一句俗语："人多嘴杂事难办。"（顾亚铃、白春仁译）
>
> 译文 3：十月十七日公告发布以后，很快就考虑举行一次从特维尔门到卡鲁日门的示威游行。这次正像俗话所说："一个人担水吃，两个人抬水吃，三个人没水吃。"（蓝英年、张秉衡译）

在这三段译文中，不同的译者针对"у семи нянек дитя без глазу"这个俗语采取了不同的变异手段。译文 1 直接将这个俗语用

一个汉语的形容词词组“非常混乱”来表示,译文2和译文3分别用了两个普遍的中国俗语“人多嘴杂事难办”、“一个人担水吃,两个人抬水吃,三个人没水吃”来替换。那为什么三个译本的译者都没有选择原文的直译方式呢?他们的翻译变异是受到什么限制呢?按照期待规范的要求,从读者的可接受性来看,如果考虑到方便目的语读者的接受,三个不同译本的译者都不约而同地直接为目的语读者铲除了阅读上的障碍。他们避免了采用生搬硬套的直译方式,使中国读者比较顺利成章地理解原文的意思。至此,我们说译文1、译文2、译文3都是符合为读者更能接受这样一个翻译规范限制所作出的不同翻译变异。如果在这样一个规范的约束下得出“七个保姆孩子没人管”的译文则会被批评者评论为不合时宜的变异形式。但是,如果目的语读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译文中流露出来的原文语言形式或思想内容异质性,甚至表现出对差异性的一种期待,那么如果译文中少了这种差异,读者反倒觉得它没有真实地再现原著。受到这种期待规范的限制,译者的翻译行为就要做适当的改变,那么产生“七个保姆孩子没人管”的译文形式就更加符合这种期待规范。需要强调一点的是,不管译者的翻译变异如何,这两种不同形式的期待规范都是客观存在的,只是由于不同的译者受到不同规范的制约从而得出不同的译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翻译变异要受到翻译规范的制约,翻译规范会对译者的翻译活动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译者在“此”翻译规范的影响下不会得出“彼”翻译变异形式。因此,译者为了使自己的译文能够顺利进入目的语文化,他的首要任务要对自身所存在的社会的规范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并不断地挖掘和补充。

综上,规范是客观存在的,这一点我们毋庸置疑。任何翻译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完成的,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行为或多或少地会受到规范的制约。每个译者在成为译者之前都会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努力获取社会上现有的各种规范的相关信息,试图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译者,希望自己的译作能够被目的语社会的其他成员所承认。当译者的翻译行为和目的语规范相吻合的时候,他的劳动成果才能得到承认和接受。因此,当译者自己的创新行为与目的语规范偏离的程度太大时,他就会根据

自己的能力随时调整自己的翻译变异策略，尽量对自己的变异行为进行限制，以使自己的翻译行为尽量符合和靠近社会其他成员的要求和期待。而如果违背或者偏离规范太多则会使译文的接受大打折扣。比如，孔慧怡曾经(1999)指出，中国大陆从事古典诗词英译的人虽然不少，而且他们所抱的热诚和文化使命感比起国外的译者来说可能更强，但由于他们“忽视了英语诗歌规范的演变过程和当代读者所认同的规范”，因此“大多数人的译作并没有造成影响，甚至可以说未能进入英语文化的视界”(孔慧怡，1999：128)。这正是由于译者事先没有对各种相关规范进行充分调研的后果。

2. 翻译规范对翻译变异的限制

在对翻译规范做了必要的梳理之后，我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不能否认翻译规范的存在，虽然它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体系，但却实实在在地存在在那儿，有待于人们的挖掘和完善。翻译规范正是以它这种无形的存在制约着有形的翻译变异活动。那么翻译规范是如何对翻译变异产生制约的呢？我们从翻译变异自身的历史性属性反观翻译规范问题，从而认为翻译规范对翻译变异的限制作用也应该从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来具体考察。首先来看历时性限制。

2.1 翻译规范的历时性限制

规范是一个历史范畴，它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向前推进。图瑞本人曾指出，“规范是一些不稳定的、总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存在。也就是说，规范总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它会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而变迁，任何规范(包括法律)都需要变化，以适应前者的变化”(李德超，2004：72)。规范的历时性体现为不同时代的生活群体之间对某一特定事物会产生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趣。规范会通过时间的累积，在经历了普遍传授和自身适应的过程之后一代一代地继承下来，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比如清末民初对译作的判断标准和当今对译作的判断标准肯定是不一样的。

规范并非永远静止不变，某一时期流行的规范在另一时期可能被修正、更改，甚至被一种新的规范所代替。因此，随着规范的改变，遵从先前规范的译作在新的规范面前或许将不再被认为是“标准”或

"典范",而违反先前规范的译作,如果它恰好与改变后的规范相符合的话,那它反而会被重新确认为是"标准"或"典范"得到推崇。比如,清末民初时期翻译的小说几乎毫无例外地采用意译或译述的翻译手法,到了30年代却一举转变为近乎木讷的直译方式。我们说这种出人意料的转变正是不同历史时期规范的约束所致。

这样一来,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首要任务是应该努力获取自己同时代所形成的固定的、具有一定约束能力的各种惯例、规则和法令,并进而努力遵循各自时代的不同规范。翻译规范的历史性对翻译变异的制约就表现在,不同时代的译者会根据各自生活时代的规范来约束自己的翻译行为,从而使译者翻译变异的手段有明显不同,结果,同一源语文本在不同的时代会产生不同的译本也就不足为奇。

我们再来看一例:汉语句法在没有受到西方语法影响之前是不使用不定冠词的,因此,类似于"一个惊喜"这样的表达在当时是被看作对汉语语法的违背。(按照19世纪初的汉语表达规范应该翻译为"又惊又喜")但是,按照鲁迅提倡保留原文异质特色翻译观的要求,"一个惊喜"的翻译在当时也登上了台面。这些曾经被看作是异化的译文已经逐渐为当代的汉语语法接受,或者是由于译者受制于原文的牵绊,或者是译者的有意而为之,久而久之,"有些生硬的洋话,经过时间这个熨斗熨来熨去,也渐渐变得自然了。三十年前特异的说法因为一再为人采用,已经成了'土产',再过一两代也许给人视为陈腐"(思果,1996:48)。

在不同翻译规范的制约下,翻译变异只能是在规范的允许范围内实现,符合翻译规范的翻译变异被认为是正确的、合理的变异。生活在不同时代的译者会掌握不同的规范,在翻译中他们会遵循自己所处时代的惯例、规则来建构目的语文本,从而使同一源语文本在不同的时代会产生不同的目的语文本。但是在这一时期符合规范的翻译变异在另一个时期也许被视为异己的情况也同样不可避免,我们说,这正是翻译规范的历时性因素对翻译变异的完美体现。

2.2 翻译规范的共时性制约

规范的共时性是指同一时代,不同生物群体之间受社会地位、年

龄、性别和文化等不同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趣。比如，我们经常所说的同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我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参见鲁迅，1993：141）正所谓：“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籍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转引自卞建华，2005：43）

翻译规范的共时性表现为翻译规范的多样性。翻译规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必须指出，新的规范出现后，旧的规范并不会马上消失。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往往还会出现多种翻译规范同时并存的局面，比如图瑞指出的“主流规范”、“前卫规范”和“过时规范”概念。但是这种翻译规范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翻译活动不受规范的制约。以晚清时期的翻译为例。意译是晚清翻译的时代风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没有相对比较忠实于原著的直译。

同一时代的读者，对同一文学文本的理解会因其各自期待视野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个读者，也会因其期待视野的变化，而对同一文学文本产生不同的理解和感悟。这说明，不同群体的读者对同一事物往往会有不同的期待和要求。具体到翻译行为，不同的读者会以不同的评判标准来看待译文。所以，即使是在同一时代，同一源语文本也会有不同的目的语文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名著重译也是为满足不同群体读者的不同期待而为之的善举。

比如，90 年代后期，我国翻译研究出现一些新倾向，其中之一就是意译之风的上扬，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的增强。因此，这一时期的翻译以“通顺”为主，尽量体现汉语的表达习惯。按照这种翻译规范，那些“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的翻译变异形式会被当成误译而改成“日落山阴”。而与之相反，鲁迅的翻译活动恰恰需要保留源语文本中的这些异质要素和表现手法。鲁迅的翻译活动始于 19 世纪初，当时主流的翻译规范是以“意译”为主，而且删改情况时有发生。但从 1909 年他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开始，他的翻译观出现了转变，开始

由“意译”让位给“直译”。该小说虽然还是用当时文坛上流行的文言文译出，但是它在许多方面与晚清主流的翻译规范有很大的不同。之所以采用这种“直译”的方法理由是从语言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白话文还不是很成熟，需要用这种引进外国语言形式的方式丰富大众的语言，促进语言的现代化。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为了利于文化交流，鲁迅主张应该尽量传达原文异质文化的异质特色。也正是在这种观点的主张下，当年那些所有不顺的字眼，诸如“沙发”、“咖啡”、“蜜月”、“幽默”、“罢工”等现在已经逐渐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这样，由于翻译规范的制约，译者的翻译变异都是在各自翻译规范的限制内行事。因此，我们在评价译本对错的时候，也不能把译本孤立地拿来进行评判，要结合不同译者可能遵照的不同时代的不同翻译规范，或者是用同一时代不同群体所遵照的不同翻译规范来衡量。避免出现孔慧怡曾经指出的，“20 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的一个缺陷就是，学者们往往按照当前的文化规范，对以往的翻译作出否定性的评价”(孔慧怡，1999：12)的现象。很多学者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翻译规范，未能顾及译者翻译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缺乏应有的历史观。比如，在当前有关异化和归化的讨论中，很多人都根据当前对翻译功能的认识，批评以往的译文舍弃了原文的文化意象，或是过多地使用了具有汉语民族特色的语言成分，使读者难以体验到异国情调。然而，我们认为这种评价是有失偏颇的。

更为重要的是，英国翻译理论家贝克尔(Baker)认为规范概念认为，翻译研究的主要分析对象不是个别的译文，而是一个彼此相互连贯的译文语料库(参看廖七一，2001：392—394)。这与我们翻译变异的形成有紧密联系。试想一下，规范概念的存在促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意识地、主动地去了解客观存在的规范，译者应该主动地通过各种途径拓宽自己对规范的认识，但是由于不同译者的经历和精力的限制，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将所有的惯例、规则和法令全都毫无遗漏地纳入自己的视野，因此，不同译者对规范的不同掌握势必会影响他自身翻译行为的实现。那么，遵照不同翻译规范所形成的翻译变异就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是受到“此”规范制约的译文和受到

"彼"规范制约的译文之间不应该是毫无瓜葛、彼此割裂的关系，而应该是受规范影响而组成的彼此连贯的译文库。关于此，我们在最后一章目的语文本关系问题研究中还会进一步阐释。

第六章　翻译变异和翻译对等

前文我们用了4个章节从翻译变异的界定、翻译变异的属性、翻译变异的成因、翻译变异的限制四个角度对翻译变异现象的来龙去脉做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分析。至此，翻译变异的身影在我们的脑海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我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许渊冲模仿老子《道德经》第一篇写了一章《译经》："译可译，非常译；忘其形，得其意。得意，理解之始；忘形，表达之母。故应得意，以求其同；故可忘形，以存其异。两者同出，异名同理；得意忘形，求同存异；翻译之道"（许渊冲，1996：56）。这是老一辈翻译理论家以自身多年的翻译实践道出的翻译之理。从这一段简短的表述中我们似乎看到了翻译的真谛。但是，我们的心底一直还有一个声音在呼唤，那就是翻译对等。试想一下，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翻译变异对翻译理论的强大冲击力的时候，翻译对等的概念一直是我们谈论的焦点。虽然翻译对等这种说法越来越遭到现代很多翻译理论家的诟病，但是传统翻译理论是建构翻译理论体系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他们的卓越贡献曾经也将继续在翻译理论研究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我们研究翻译变异的时候，如何看待翻译对等的问题呢？翻译对等和翻译变异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们是不可调和、相互斗争、非此即彼的吗？传统的翻译理论一直没有给我们确切的答复，即使是现代很多翻译理论家对翻译变异越来越持有宽容的态度，仍然没有将二者并列起来加以详细讨论。事实胜于雄辩，在翻译研究的历史长河中，翻译变异问题是始终存在着的，只不过它一直在人们努力追求翻译对等的宏伟目标中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它有如翻译对等的孪生兄弟在翻译学的研究中始终不离不弃。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顺着翻译理论的发展足迹逐步探索。

第一节　翻译理论中的对等理论综述

众所周知,翻译对等问题一直贯穿着整个翻译史。早在20世纪中叶现代翻译理论诞生之时,“对等”(equivalence)这个术语就已经相伴而成长起来。但是在某些语言中,例如,法语中,“等值物”是用于我们今天所指的语言学意义,即可以用来替换其他词语或表达的词语,这个意义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已经被固定下来。现代翻译理论中使用“对等”这个概念的历史并不长。例如,俄罗斯文学翻译理论家托佩尔(Топер)曾经指出,首次将对等这个概念用于翻译学的是机器翻译,而正是雅克布逊(Якобсон)建议将这一概念用于人工翻译。

首先明确一点的是,“对等”从引进中国以后,由于自身术语翻译的不确定性带来自身概念界定的模糊性。比如在俄语中,用于表达对等的术语有很多,如 адекватность, полноценность, тождество, 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ь。尽管有学者努力区分这些概念,并指出 адекватность 多数指的是翻译结果,而 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ь 多用于表述翻译过程,但是,我们仍然无法把他们同汉语中的“等值”和“等同”概念完全相对应。比如桂乾元认为翻译等值表示的是译文和原文两者之间的同值关系,而同值指的是译文和原文有相同的效果或作用。比如,吴新祥和李宏安认为,等值概念的内涵是建立在思维与语言统一的基础上的,不但包括作品思想艺术内容等值,也包括作品言语形式的等值。如果细究起来,这两个概念都有失偏颇,比如,说形式等值,形式怎么可能有“值”?说内容等效,那么形式会否有缺失?如果不考虑术语的细微差异,我们将所有关注译文和原文对应关系的表述统统用“对等”概念取而代之,那么各派对“对等”这样一个翻译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是如何理解的?

肯定一点的是,“对等”概念从在翻译理论界出现开始到现在,始终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但不管怎么说,不仅语言学派比较关注对等的问题,其他学派的翻译理论即使不赞成,似乎也不能对它视而不见。例如,英国翻译理论家贝克尔就曾经声称,对等

并非有多高的理论价值,她完全是为了方便才使用这个概念的。如此一来,对等概念作为各个学派竞相讨论的焦点,已经成为翻译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并且只要存在翻译活动,对翻译对等(translation equivalence)的界定似乎永远不会结束。那么各个学派现有的翻译对等观是什么样的呢?根据根茨勒的观点,我们对翻译理论中对等的研究情况大体分为几类:绝对对等、不对等、相对对等。

1. 翻译绝对对等

翻译对等作为翻译研究的基本概念一直是很多翻译理论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它为翻译研究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新的研究视野,也为很多译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灵感源泉。翻译对等这个概念自身的表面意义听起来很像是绝对的等同或绝对的一样。尽管研究者们越来越意识到翻译对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应该像以严密著称的自然科学中的"绝对零度"(-273℃)一样,事实上很难达到也从未达到过一样,但仍有学者将翻译对等问题置于严密的逻辑推算意义上,认为翻译绝对对等是可能的。最明显的是莱比锡学派的代表人物卡德(Kade)等人的主张。他们把源语文本分解成若干个结构单元,认为译者应该从一系列对等项或选择项中挑选出"最佳对等项",然后由这些各个单位组成一个线性序列。这一学派在翻译研究中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尤其是数学研究和形式逻辑法,以"对等"为出发点,研究和追求翻译单位的对等。结果,翻译成为一个编码转换的过程。前西德翻译理论家科勒也曾指出"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翻译可以被描述为换码或替换:即用语言系统 L_1 中的成分 b_1、b_2 和 b_3……来替换语言系统 L_2 中的成分 a_1、a_2、a_3……"(参看朱建平,2004:44)

总之,在翻译理论史上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译文和原文应该达到完全一致,译者应该完全忠实原文本或者原作者,源语文本中的艺术形式、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都要毫无遗漏地转换到目的语文本中去。很显然,这种观点略显极端并具有强烈的规定性。作为一项复杂的文学翻译活动来说,终究经不起实践的考验而被历史淘汰,但是,他们这种用自然科学进行翻译研究的方法并且追求永恒对

等的态度为把翻译学作为一门科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道路。

2. 翻译不对等

另外一种极端的观点即不承认或者不考虑翻译对等的问题。首先根茨勒本人就认为对等理论是有害而无益的。描写翻译学的代表人物图瑞也声称,对等只是一个"理论术语",可以用来描述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之间所具有的一种或一类抽象和理想的关系。他主张从译文出发,否定了统治传统翻译研究几千年的对等的研究,开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新天地。但同时,由于对等这个概念的否定,许多原来依赖这个概念或建立于该概念的观点也被相继颠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关于"翻译"的概念和定义。以往对翻译的定义都是以对等为中心而展开的,但如今这个原来可供依靠的立足点已不复存在。因而,描述翻译学试图从对翻译中规范的研究角度出发,继而达到对翻译法则的认识,希望在总结诸多翻译法则的基础上,来重新解答何为翻译这个最基本的问题。紧接着,翻译研究学派直接接受了图瑞的关于"译文就是目的语系统中……的既成事实"的假设,更加关注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所发挥的作用。因此,对翻译研究学派而言,对等根本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彻底否定对等概念的流派中,解构主义学派的福柯和德里达观点是绝对不能绕过的。他们二人彻底否定任何形式的对等。他们认为原文只能依靠译文才能存活,文本本身没有确定不变的含义,因此每翻译一次都要改变原文的意义。所以,文本的意义是由译文来决定的(参看郭建中,1999:5)。这样一种以译文为主,认为译文是使原文存活下去的手段的翻译观使我们彻底认识了语言之间的差异和各种语言的特定表达方式,从而彻底否定了对等关系的存在。总之,在上述描写的各个流派中对翻译对等的问题基本观点一致,那就是否认翻译对等,无视翻译对等的存在和必要性。这是翻译对等研究的另一种极端观点。

3. 翻译相对对等

还有第三种观点,就是基本都承认翻译对等的存在,只是各自对翻译对等认可的程度有强有弱,认为翻译对等只能是相对对等。

3.1 赞成并为之辩护的

翻译理论的语言学派基本是赞成对等理论的，他们也大多承认绝对的翻译对等是不可能的。为了解决到底应该在什么程度和层次上达到对等，研究者们提出“翻译单位”概念来寻求解决之路。在翻译单位的问题上，前苏联的翻译研究走在最前列。根据前苏联翻译理论家巴尔胡达罗夫（Бархударов）的观点，所谓翻译单位就是“在译文中具有对应物的原文最小单位”（Бархударов Л. С.，1975：174—189）。“就翻译过程而言，翻译单位是在什么层次上寻求翻译对等的问题。就翻译作品而言，翻译单位是判断翻译对等的工具”（郭建中，2001：49）。按照这样的翻译单位定义，先后出现了词素层的对等，词层的对等，短语层的对等，小句层的对等，句子层的对等，段落层的对等，篇章层，文化层的对等等。换句话说，翻译对等是以各种翻译单位为原点展开的。有了翻译单位这个依托，各个学者纷纷开始建构各种不同的对等类型，比如奈达（Nida）区分动态对等和形式对等（参看谭载喜，1999）；莱比锡学派的卡德区分了一对一、一对多、一对部分和一对零四种类型（李文革，2004：138）；波波维奇（Попович）区分了语言对等、范式对等、文体对等和篇章对等（Попович А.，2000）；巴尔胡达罗夫（Бархударов）区分了音位层、词素层、词层、词组层、句子层和话语层对等；什维采尔（Швейцер）区分了句法对等、语义对等、语用对等。（参看 Швейцер А. Д.，1988）科米萨罗夫（Комиссаров）区分了五种对等类型：交际目的层、情景描写层、情景描写方法层、话语结构层、词汇-语义对应层（参看 Комиссаров В. Н.，1999）。总之，翻译语言学派为对等模式的建立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这种从语言层次上划分翻译单位的做法均是以承认对等为前提的，因此他们是坚决支持对等的。

3.2 赞成但并不是唯一翻译目标

1）赞成翻译对等，但认为只是用来描述译文和原文之间诸多关系中的一种。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功能翻译学派。他们虽然也承认对等的概念，但同时也认为对等就只是翻译充分的一种表现形式（李文革，2004：145）。他们只是把对等看成是译文与原文之间诸多关系中的一种。他们将对等原则视作特定情景下采用的原则，在他们

看来这些法则是要服从于翻译的目的或功能。译文和原文之间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是由翻译目的决定的。翻译目的不同,二者之间关系自然不同。

2）赞成翻译对等,但认为只有差异的存在才能保证对等的存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解构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巴恩斯通的观点。我们前文说过,解构主义的另两位代表人福柯和德里达是彻底否定对等概念的,但是巴恩斯通(Barnstone)例外。按照他的观点,译文和原文的对等关系并不影响将译文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对象来看待。他认为我们一方面可以并且应该将自己限制在达到语言对等的可能性之上,无论采用何种翻译方法都应该判断它所达到的对等的程度,但同时,他指出,一部优秀的译作就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会因为自身的种族特征而价值有所减损。在评判翻译行为的时候,应该以寻求对等时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大小为依据,“没有差异就没有对等”。或者可以说,正是由于差异的存在,才导致了“对等的度”的存在(参看朱健平,2004：43)。

第二节　翻译理论中翻译变异的显隐

在对翻译理论中翻译对等问题回顾之后,我们基本上对翻译对等有了相对清晰的了解。综上所述,对翻译对等的理解基本上存在三种观点：绝对对等、相对对等、不对等。那么在对等理论日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翻译变异是处于什么位置呢?

首先,在翻译理论的语文学派初期,翻译被当作一项极具创造性的活动广泛推广和宣传。众多的文学家、翻译者都参与到翻译行列中为各国之间的文学交流作出巨大的贡献。翻译的语文学派基本主张翻译是一门艺术,因此,对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创造非常重视,在充分肯定译者才华的前提下,对译者的各种删减、增加、修改等行为漠不关心、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结果,在俄罗斯以及整个欧洲范围内出现了诸如“适应本国习气”的翻译论调。这种对翻译活动的宽容态度在我们看来可以视为翻译变异的雏形。我们暂且不谈当时翻译变异的程度如何,但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翻译变异从有翻译活

动一开始就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在这一时期，对等还是一个相对模糊、无法确定的概念，因此，无论是翻译变异的问题，还是翻译变异和翻译对等的关系问题都并未能浮出水面。

随后，20 世纪 20—60 年代，西方译论同语言学同步发展。语言学的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在这种背景下，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也相继问世。翻译的语言学派为翻译研究作出的巨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他们大多以朦胧的学科意识为出发点，以语言的共性论为基础，不遗余力地为建立一门翻译科学而做着不懈的努力。但是在我们肯定翻译的语言学派所制定的各种翻译模式推动了翻译学发展的成绩前提下，我们仍然看到翻译语言学派的各种局限，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翻译的语言学派并没有将翻译这项复杂的行为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环境中去加以考察。不管怎样，在这一时期，“忠实”是永恒的翻译标准，但是在实践中这样一条法则却常常令译者顾此失彼；“变异”是理智上很难接受的概念，而往往在翻译的事实中却是随处可见。这样一种悖论不得不令我们重新思考，到底翻译活动的本质是什么呢？变异和对等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有学者指出，“翻译之难，难在译者没有充分的自由”，“难在译者盲目的忠实对应而无法达到精神的共鸣，难在得与失之度的把握”（许钧，2003：6）。那么这种难需要怎样来克服呢？我们遵照翻译语言学派的研究者们所制定的若干翻译对等原则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吗？不管怎样，很明确的一点是，在翻译的语言学派盛行时期，在对“对等”的追求过程中，翻译变异始终是不可能被立于台面的，只能是处于一个打工仔的位置在翻译对等的光环下默默地生存。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研究者们越来越不能容忍翻译语言学派研究方法过于单一的弊端，并且“以原文为主”的翻译研究方式得出的结果略显简单和理想化，翻译实践中的很多现象都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尤其是翻译语言学派过分关注原文中的“不变量”问题常常引起文学翻译家的不满，致使研究者们不得不另辟蹊径，翻译的研究学派应运而生。翻译研究学派是以探讨和研究译文的产生和作用为主的。翻译研究学派从一开始就以描写的姿态注重分析译文和原文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说到目前为止，以原著为中心还没能被翻译研

究学派所彻底抛弃的话，那么霍姆斯对翻译过程的关注绝对令译文和原文关系上升到平起平坐的地位。早期翻译研究学派的霍姆斯(James Holmes)认为“翻译过程所作出的抉择和决定都是主观的，有时则出乎意外”(转引自李文革，2004：181)。也就是说，他将翻译过程中的主动权交给了主观行动人——译者。这样，由译者所掌控的翻译行为，包括翻译变异旋即浮出水面，翻译开始走自己不同的路。随着翻译研究范围的扩大，人们对翻译概念不断有新的认识。从霍姆斯开始，对目的语文本关注呈现上升趋势，在“多元系统”派那里，一切翻译活动实际上都要由目的语文化里的各个系统来决定，“翻译就不再是个其性质和界限一经确定就不再变化的东西，而是依赖于一定文化系统中各种关系的一种活动”(转引自李文革，2004：188)。在该理论的指导下，翻译的关键在于目的语文化读者的眼里是否把一个文本视为翻译，而不是要翻成什么样子才能成为翻译。至此，翻译变异的自由度也相应扩大。

受多元系统理论的影响，以色列的图瑞正式提出了以译文为中心的翻译理论。图瑞是坚决主张以描写方式研究翻译。以他为首的描写翻译学派对翻译变异的态度十分宽容，它将各种各样的翻译如直译、意译、改写、改编、复写、重写等都纳入研究的视野，认为任何一种翻译都不可能完整的、原封不动地移植到目的语文本中，都不得不经历不同程度的“过滤”和“变异”，因此不同译者对同一原文或者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翻译的同一原文都不可能完全一致。这种翻译观点动摇了传统对等理论的基础，彻底摒弃了翻译中一对一的观念，更加注重决定译本产生和被接受的常规和制约因素。

如果说从传统到现在，翻译理论中翻译的地位正在由从属走向独立，那么在文化学派的眼里，翻译的地位得到最大化的彰显，翻译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原文，译文成为左右目的语文化的一种势力。20世纪七八十年代，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玛丽·斯奈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by)主张将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参看李文革，2004：229—235)。高举“文化”旗帜的勒弗菲尔和巴斯奈特更是彻底颠覆了词语对等或者篇章对等的“忠实”，认为翻译即“重写”、即“操纵”(勒弗菲尔语)，翻译对等即原语和译语在文化功能上的对等(巴斯

奈特语)。为了能使译语读者在译语文化中所获得的效果与原文读者在原语文化中所获得的效果对等,译者可以在文化视野的关照下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巴斯奈特这种略显激进的主张遭到根茨勒的否定,根茨勒认为这种宽泛的界定“功能对等”似乎给任何添加、变更、删减都开了绿灯,因此从文化学派角度看来,翻译变异拥有最为广阔的施展空间。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解构主义翻译流派以辩证的、动态的和发展的哲学观来看待翻译问题。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翻译观念,将译文和原文、译者和作者视为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在强调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下,认为翻译的目的保护和表现这些形式之间的差异,翻译的目的不是“求同”而是“存异”。我们认为这种从形而上的角度审视翻译性质和作用的观点不乏新意,但又略显极端。他们过分强调差异,彻底否定对等(巴恩斯通除外),在我们看来是不可取的。比如,德里达甚至否定了原文本的创造性这种反叛最终只能让解构主义翻译理论陷入混乱。从解构主义的翻译观我们很容易看出,他们否认“忠实”,肯定“再创造”,势必夸大了译者和读者的作用,掌控翻译行为的译者翻译变异的自由度扩大,甚至会出现不负责任的胡译和乱译,这并非我们所希望的结果。

9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盛行,在它们的笼罩下,翻译研究披上了神秘的政治色彩,翻译已经成为强势国家侵略弱势国家的手段,语言霸权、文化霸权都在翻译活动中显露无遗。翻译研究者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以往的翻译对等完全是建立在语言和文化不平等基础上的对等,这样一种不平衡状态下得出的翻译结论势必是不忠实的、不确切的、不可信的。后殖民主义者不仅抛弃了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也批判了语文学派的翻译,而把翻译完完全全看作是一项国际性的政治活动。因此,在这样一种翻译背景下,翻译对等无从谈起,翻译变异的空间再一次被夸大,并成为一种政治手段。

翻译活动还在继续,翻译研究范围还在不断扩大,翻译的本质得到越来越多的阐释。我们不能在众多的观点中找到唯一一把万能钥匙解决所有的翻译问题,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只要翻译活动

不止，对翻译本质问题的争论就会不休，那么相关的翻译变异的显隐问题就会一直存在，因为影响翻译变异的若干因素同样也是影响翻译活动的主要因素。我们无法准确为翻译变异的“始”和“止”划定界限，但是我们相信，它和翻译对等概念一样应该也值得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第三节　翻译变异和翻译对等之间的关系

在对翻译对等理论进行了必要的梳理，对翻译变异在整个翻译理论史中的显隐做了必要总结之后，耳边又重新回忆起本章开头所提出的那些问题：如果正如我们所说的，翻译变异和翻译对等既然都曾经存在过，那么它们之间应该是非此即彼呢？抑或是还有其他的关系？根据前面的描述，我们大体可以粗略地判断出，对于翻译变异和翻译对等的关系问题有几种相左的观点：一种是承认翻译对等而彻底否定翻译变异（比如翻译语言学派的绝对对等派代表）；一种是承认翻译变异而彻底否定翻译对等（比如翻译解构主义学派代表德里达和福柯），他们否定任何形式的对等，认为对等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还有一种是既承认翻译对等又不排斥翻译变异，（比如翻译解构主义学派的代表之一巴恩斯通），并认为正是有了差异的存在才有了对等的度。我们是十分赞成巴恩斯通的观点，即对等应该是建立在差异的基础上，而差异正是由翻译变异结果来体现的，这种差异包括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之间体现出来的差异，还应该包括不同目的语文本之间体现的差异，即使并不是每一部源语文本都有机会被重译，但是它的潜在目的语文本之间始终潜藏着不可避免的差异，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巴恩斯通把判断翻译行为的依据归结为在寻求同一和对等时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的大小。据此，我们进一步推测，“差异的大小”恰巧是通过翻译变异来体现的，那么翻译变异和翻译对等之间一定存在某种关系。按照巴恩斯通的观点推测，翻译对等应该是以翻译变异为依据。我们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应该仅仅是这种单方面的依据关系，还应该包括翻译变异向翻译对等的转化，也就是说，翻译变异和翻译对等之间应该是互相转化和相互依存的

关系。那么这种相互转化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是如何体现的呢?

对等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在翻译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成为许多学者推崇的一种翻译标准。在基本上赞同相对对等的前提下,研究者们纷纷设立各种翻译对等层次来达到自己的翻译目的。与最初翻译语言学派通过研究“翻译单位”来确立对等模式不同,现在的翻译理论将对等的范围越扩越大,基本上已经超越了斤斤计较于词语或者句子层面,而是扩大到篇章、文本甚至文化层次的对等,如我们反复强调过的文化学派对原语和译语在文化功能上对等的追求。然而,客观地讲,翻译理论中只有一个单一的对等诉求是违背翻译理论发展进程规律的。正如翻译标准在逐渐趋向多样化一样,我们认为对等也应该建立一个庞大的体系。

回顾以往对翻译对等体系的建立,传统的翻译理论基本停留在对内容和形式等问题的思考,如对等“不但要求译作与原作有相同的信息、相同的思想、相同的形象、相同的意境,相同的情调,而且要求有相同的言语节奏、相同的言语风格、相同的言语韵味、相同的言语美学价值”(吴新样、李宏安,1990:2);而前苏联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则提出了“对等翻译”的要求,认为对等的译文应该传达原作的内容和形式并再现原作形式上的特点,这实际是希望译文能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能达到对等,尤其是对语言形式更加关注。前文说到,翻译的语言学派在为达到翻译对等的问题上曾经提出翻译单位的概念作为衡量对等的尺度,关于这一点苏联的翻译理论是最有发言权的。从巴尔胡达罗夫到什维采尔到科米萨罗夫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翻译对等划分类型,力图建立翻译对等体系。相比较而言,科米萨罗夫的对等体系相对完整:“从最开始的交际目的层开始,翻译行为体现得最为自由,到最后一个词语的对等层,翻译行为体现为直译的方式。可以说,科米萨罗夫是俄罗斯迄今止对翻译对等层次划分最为详细的研究者之一,但是尽管如此,他的分类仍然有不足之处,那就是未能将翻译作为一个动态的体系,把历史因素、文化因素等涵盖进去,使翻译对等层次依然停留在词组、句子、篇章等层面,没有扩大到更高的文化功能层面。虽然有提及文化因素的问题,但只是对文本中微观的文化因素技术处理问题感兴趣,而并不是从宏观的文本

文化功能的角度加以考虑。从奈达开始，对等的层次打破了内容和形式之争，转向效果对等，即要求译文读者对译文理解应能使他们感知到原文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国内也有学者提出“翻译对接受者（听众或读者）的效果，应该与原文对原文接受者的效果相同”（金隄，1998：24）。二者异曲同工。动态对等理论生命力持久，至今仍不失其实践意义。但是，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奈达的“动态对等”虽然对于文化、交际功能及意义问题有所论述，但是他译论的出发点是从《圣经》翻译开始，因此其理论观点有失普遍性。总之，只拘泥于源语文本信息层次的翻译对等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翻译实践活动，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对等体系另辟蹊径或者做重要的补充。翻译研究学派使翻译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无论是以目的语文学系统来制约翻译的多元系统学派，无论是主张在译语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研究翻译的描写学派，无论是从翻译文化功能的角度认为翻译对等应该力求原文和译文文化功能对等的文化学派，他们一脉相承的特点是将翻译单位从词、短语、句子、语篇最终转移到文化、历史和功能等上来，为对等体系的建立增加了多重维度。

其实，从现有的各类对等体系来看，无论哪一种对等体系的建立都不能涵盖整个翻译活动的所有方面，我们期望能在对等体系的大厦中不断添砖加瓦，以期建立一个将所有可能的层次都涵盖进去的对等体系。按照文化学派的代表人勒弗维尔的提醒，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掌握从宏观到微观处理问题的能力，学会按照文化-文本-文本结构-段落-句子-短语-词的顺序来看待翻译中的得与失。因此，我们所希望的翻译对等层次从两个方面建构，一个是静态层，即在文本内所有可能的内容和形式对等，包括词语层、词组层、句子层、段落层、篇章层，另一个是动态层，即在文本外所有可能的功能对等。翻译对等的终极目标是追求翻译单位在静态和动态各个层次的同时满足。我们也深知这种目标几乎很难达到，译者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多地满足各个层次。这样一来，我们不能因为它违背哪部分的对等而对它加以批评，只要它能满足一个层次我们就不能说它是错的，只是满足程度上的差异大小而已。

我们已经十分清楚翻译活动是不可能在所有层次上都得到满足

的，而翻译变异恰恰是由于不能达到全部满足而在各个层次上不得不采取的变通方式。而翻译对等和翻译变异是什么关系呢？

在对待翻译变异和翻译对等关系的时候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以无奈的心情对待翻译变异性，视变异性为文本翻译的不正常状态，甚至是有害的状态，以对等性否认变异性。这是对翻译变异状态采取的一种消极的态度，看不到翻译变异对于正确翻译文本的积极意义。从翻译变异和翻译对等的关系来看，这种态度实际上是以对等性排斥变异性，看不到变异性对于对等性的积极意义。另一种态度是崇拜翻译变异，不仅视翻译变异为完全合理的状态，并进而否定翻译对等，以变异性否认对等性。有些翻译学家认为，文本没有独立自主的意义，译者为文本创造意义，译者翻译的东西只是他自己的意义创造。或者更为极端的观点是认为根本不要去问文本的意义或作者的思想，翻译只是翻译出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我翻译到的东西是否是作品的意义或作者的思想，这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对我有用就行。这是从另一个方面割裂翻译对等和翻译变异的关系，只不过是以翻译变异排斥翻译对等。

我们认为，翻译对等和翻译变异是不可分割的，翻译变异有利于翻译对等，翻译对等只能存在于翻译变异之中。也就是说，由于译文是根据各种翻译对等类型实现的，因此各个译本的存在和平等都是毫无争议的。结果如何呢？由于有各种对等类型的存在，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要求以不同的方式翻译同一部原著或者说以不同的填充文本空白点的方式来具体化文本。这样一来，不同对等类型的存在也成为允许以不同方式阐释文本的翻译变异的固有潜在来源。固有的，是因为任何一个文本都会碰到这种可能。潜在的，是因为不是每一个文本都要求翻译 N 变以上，得出 N 个根据不同对等类型完成的译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说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表示为：

翻译对等类型——→翻译变异

但是我们也可以逆向来思考。我们认为正是由于翻译变异的存在才得以保证获得相对对等的译本。在根据不同的对等类型所采取的翻译方法是不同的，那么也就是说保证文化层次对等的翻译手段

和保证词语层次对等的翻译手段势必呈现出差异。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差异正是翻译变异的具体体现。用图所示:

翻译变异——→翻译对等类型

从广义角度来讲,我们说这两种翻译显现是紧密联系的,互相制约,互为存在的保证,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翻译对等↔翻译变异。

我们试着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 А кто бросит камень? — сказал 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очевидно довольный своей ролью. (Л. Толстой,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谁能够投石头打人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显然很满意他所扮演的角色。(注:《圣经 · 新约 · 约翰福音》第八章:众人把一个犯奸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要用石头投她。耶稣说,没有罪的人可以用石头投她。结果人们都散去。)(周扬、谢素台译)

"可是谁愿意落井下石呢?"卡列宁说,对他扮演的角色显然很满意。(草婴译)

"谁能下得了狠心呢?"卡列宁说。他显然很满意自己扮演的角色。(力冈译)(转引自杨仕章,2003:191)

这段是描写安娜回到彼得堡后很想见见自己的儿子,于是她就给利季娅 · 伊万诺夫娜(Лидия Ивановна)伯爵夫人写信要求同儿子见面。儿子卡列宁回复伯爵夫人上面这句话,表达自己同意了安娜的请求。不同译者在处理"А кто бросит камень"这句话的时候,根据不同的对等类型得出不同的翻译变异形式,比如从字词对等的角度来看,周扬的译本最贴近原著,我们暂且不说中国的读者脑海中的"石头打人"和俄罗斯人脑海中的"石头打人"是不是一个概念(通过周扬译本的夹注我们得知此时的石头是具有浓厚的文化含义的,包含着一个圣经故事。中国读者不了解这段故事是无法产生共鸣的),单从词语对应的角度,周扬作出的这种翻译形式是符合词语层

次对等要求的。可是我们再来看看草婴的译本，他采用了中国的成语“落井下石”尽管也表达了谁也不会去伤害的含义，但是在形式对应层次上已经无法企及，再到力冈的译文“谁能下得了狠心呢?”同样是达到效果上的对等，但是失去了形式，失去了“石头”，可以说是达到效果对等的翻译变异形式。三种对等建立在三种不同的变异形式上，得到了三种不同的译文。从而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三种变异形式甚至还有更多的未被表明的潜在变异形式才保证了翻译对等的成立，只是对等的程度有差异。

总之，由于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人们对文本的翻译必然是多样的，但每一种翻译都在自己的视野中看到了文本自身的一些方面，忽略了另一些方面。每一种翻译都是在保证一种对等情况下采取的必要的表达手段，那么势必在另一种对等层次上有所欠缺。每一种翻译变异都是不完全的，但每一种翻译变异都这样或那样地表现着原文文本自身，都达到了译者与文本的一定的“视界融合”。没有一种翻译是完全荒谬的。经过不同译者之间不断的讨论和修复，就可以达到翻译者之间的“视界融合”，也就是达到视界的扩大，从而达到与文本视界的更大的融合，达到对文本更为全面正确的翻译。没有翻译变异，就无法扩大翻译对等，扩大翻译对等就孕育在翻译变异之中。

第四节　翻译变异和双语词典

如果承认了翻译变异是普遍存在的，并且承认翻译对等和翻译变异是相互转化关系之后，也许有人会指出，那我们是否已经没有必要去按照双语辞典里的词条来选择合适的词义，双语辞典的存在似乎失去了效力。而如果肯定双语辞典是作为一个翻译工作者的必备工具，有些译文是完全可以与原文达到一一对应程度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目的语文本中的每一个词都可以在双语词典的词条下找到一个相对应的表达。初看上去，这种说法好像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可是，转念一想，这种理由其实并不成立，因为双语词典中每一个词条后面的每一个义项是怎么来的呢？归根结底是词典编纂者

对翻译变异作出选择的结果。也许当我们选择哪一部双语辞典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在这部双语辞典编纂之前，辞典编纂者实际能供选择的翻译变异有千千万，但是最终被选入词条中的也只是其中的1、2、3。这正是翻译变异所要面临的“被选择”和“被淘汰”的命运。我们在双语词典中所能看到的仅仅是被选择留下来的部分翻译变异。这就是为什么在后续翻译词典的修订中还会加入或者删掉某些义项的原因。谁也不能保证词典中的义项就是万能的，虽然大部分还是适用性很强。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以奎因(W. Quine)提出的“原始翻译”(radicaltranslation)概念佐证。

美国当代著名的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奎因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翻译的不确定性理论，该理论在语言哲学领域和西方翻译理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论证翻译的不确定性，奎因应用“原始翻译”概念。原始翻译是指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之间进行的翻译，翻译者对于被翻译语言没有任何事先的了解。奎因认为翻译就是通过“观察一个人正在作出的反应去发现他所使用的语言”，“翻译的正确与否取决于译者能否正确地解释他所观察到的刺激物并作出正确的反应”(李文革，2004：110)。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来描述一下他所采用的方法，我们仿照他所假设的一个野外语言学家想要把土著语翻译成自己语言的例子：比如当我们置身于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语言不通，当我们发现有一只兔子飞快跑过的时候，我们旁边的一个当地人迅速地高喊了一声：“заяц!!”于是我们尝试着把伴随这一刺激物的句子翻译成“兔子!!”我们得出这样翻译结论的根据就是这两个句子可能具有同样的刺激意义。但是，在奎因看来，这种翻译只能是猜测性的，刺激意义的相同性还不能一下子建立起来，因为在这样一个场景下真正刺激我们的还可能是“兔子的某个部分”、“兔子的某个姿态”等。也就是说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伴随着陌生人说的“заяц”的刺激和我们说的“兔子”的刺激是不是同类的。我们如果想要准确地翻译任何一个观察句就要经过多次的观察并在刺激出现的情境下征询当地人我们翻译的意见，最终得出一个从理论上来看相对正确的反应。

词典编纂人在最初编写的时候正是经历这样一个原始翻译的过

程，“只能从那些与刺激物相联系的句子开始，把所听到的语句与所看到的言语刺激联系起来，然后通过问询的方式，观察说话者的言语行为倾向，逐步了解这种语言，建立与我们母语语词的对应关系，编纂一部翻译手册”（转引自陈波，1998：121）。在奎因看来，词典编纂人在对某个词下定义时，实际上是在用另一个同义词去解释它，例如，把“单身汉”定义为“未婚的男子”。但是“难道我们要依据身旁的词典，把词典编纂人的陈述奉为法律？显然这会是本末倒置的。词典编纂人是一位经验科学家，他的任务是把以前的事实记录下来；如果他把‘单身汉’解释为‘未婚的男子’，那是因为他相信，在他自己着手编写之前，在流行的成为人喜爱的用法中已不明显地含有这两个语词形式之间的同义性关系。这里所预先假定的同义性概念大概仍须根据同语言行为有关的一些词来阐明”（奎因，1953：23）。根据奎因的阐述，他认为原始翻译永远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准确的。总是存在各种不同的甚至不相容的翻译，但这些翻译却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也就是说，它们均可在某种情境下被视为“正确的”翻译。

综上，奎因对原始翻译如何开始的解释为我们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启示。试想一下，每两种语言在刚开始接触的最初阶段都属于这种情况，即我们都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原始翻译。那么，后来经过这种原始翻译所得到的结果被词典编纂者们按照社会大多数成员接受的程度编纂成各种词典，以方便后来的读者或者译者。在词典中固定下来的那些一一对应的词语正是按照这种原始翻译的方式得出来的结论，同样按照奎因的观点，这种原始翻译永远不可能做到完全准确，即总是存在着各种不同或不相容的翻译变异情况隐患，这就需要词典编纂者们根据各自情境选择一种或多种翻译变异结果收入词条。

比如，还是以前面说的那只兔子为例：

例句 1：Лично мистер Гарольд придерживлася такого мнения, что заняя нефтяные участки на севере Ирана, Америка одним вчстрелом убьёт даже не двух, а трех зайцев.

(М. Ибрагимов., «Наступит день»)

译文：加劳德先生个人所持的见解是：美国夺得伊朗北部油田以后，甚至不是一箭双雕，而是一石三鸟。（王仲明译）

例句2：Но у него была душа зайца, а сердце хорька. (Г. Горбатов. «О смерти и жизни»)

译文：但是他胆小如鼠，心狠似狼。（陈小瑞译）

例句3：В течение недели все эти сводные и в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их командиры в свободные часы метлись по колонин и даже по городу, «как соленые зайцы». (А. Макаренк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ая поэма»)

译文：在一个星期里面，所有的这些混合联队，尤其是他们的队长们，就像"没头苍蝇"似的忙得满教养院，甚至满城奔跑。（磊然译）

（以上例句均引自《俄汉文学翻译词典》，龚人放主编，商务印书馆：230）

在这三个例句中，使用的都是同一个词语"заяц"，但是，显而易见，三句中没有一个用到"兔子"这个词典里的释义。这一方面说明"заяц"="兔子"的对应关系是经过原始翻译得出的一种结论，并被大众接受，成为约定俗成的词条，被收录到词典里，以供后人查阅，另一方面，原始翻译是不可能一次就结束的，只要有新的刺激还会产生新的刺激意义，还会有新的结果出现，例如，我们所列举的上述几个，它们在新的情景下建立了新的对应关系，一经时间的考证，也会被固定下来，所以词典的词条经常需要做进一步的补充就是这个道理。

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词典里的对应词语，只是在众多可能翻译变异中普遍得到承认的并被确认为在某一方面与该词语有对等关系的翻译才被保留下来，这也正是翻译变异向翻译对等转化的有力证明。这样，后来的译者再遇到同一个词时，便不必再像第一位译者那样绞尽脑汁地查找、比较和对照，只需要按图索骥，翻到该词条进行"选择"就可以了。省了"旬月踟蹰"，免了"头昏眼花"。

总之，任何一种翻译在原始翻译阶段都要经历翻译变异，后来的

翻译所依据的大多是在通过无数次原始翻译所得到的翻译变异的基础上进行的。当社会对通过原始翻译得到的翻译结果,无论是词语、还是句式被广泛接受,后来的译者也就会自觉不自觉地遵循这种结果。单独的词语如此,各种译名、电影名、作品名等的翻译都是遵循这样的规律,甚至一部作品的翻译变异结果也有被永久固定下来的可能。比如,那首脍炙人口的裴多菲的爱情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即使被某些研究者指责和原文有不符合之处,但是那四句经典的译文却被中国的广大读者永久地背诵下来,并推而广之,成为很多顺口溜的模板:

富强诚可贵,和平价更高;若为统一故,二者皆可抛。
原装诚可贵,质量价更高;若为成本故,二者皆可抛。
财产诚可贵,金钱价更高;若为求知故,二者皆可抛。
孝心诚可贵,前途价更高;若为真情故,二者皆可抛。
仪器诚可贵,性能价更高;若为利润故,二者皆可抛。
老婆诚可贵,老妈价更高;若为主任故,二者皆可抛。
学历诚可贵,能力价更高;若为关系故,二者皆可抛。
小命诚可贵,面子价更高;若为美眉故,二者皆可抛。
金钱诚可贵,生命价更高;若为老婆故,二者皆可抛。
自由诚可贵,婚姻价更高;若为爱好故,二者皆可抛。
聊天诚可贵,网费价更高;若为睡觉故,二者皆可抛。
业务诚可贵,质量价更高;若为成本故,二者皆可抛。
友情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亲情故,二者皆可抛。
经济诚可贵,豪华价更高;若为安全故,二者皆可抛。

总之,那些词典里规规矩矩地被我们信手拈来使用的对应词在原始翻译阶段是经过无数次翻译变异的结果。我们把这些翻译变异的结果固定为翻译对等的词条供后人使用。

但从另一角度来看,翻译词典里的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编纂人所选择的翻译变异也都不一样。它也和翻译文本一样受控制因素的影响,会有相应程度的变异。但是,词典作为一种特殊的记录手段,它的发展比较缓慢,即词条变更的速度比较

慢,但是并不意味着它就永远是约定俗成的。它将随着各种控制因素的变化,面临再次或者多次"被选择"和"被淘汰"或者补充新变异成分的可能。当新的变异成分再次被社会大多数人群所承认和接受,新的翻译变异结果再次出现并被固定下来,新的翻译对等关系再次被确立。这也正是翻译变异向翻译对等转化的最有力证明。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些古旧词语新译的现象,以及网络用语等,它们在新的条件下又有了新的意义。

第七章　翻译变异和目的语文本、源语文本关系研究

当翻译变异和翻译对等完成多次转化以后，一部部优秀的翻译作品就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承认翻译变异的存在就等于承认译本多样性的合理存在，可以说，翻译变异使译本多样性成为一种客观事实。尽管不是每一部作品都需要多次翻译，但毫无疑问，只要重译就势必和原译不同，这已经不仅仅是修改错误、商业利润驱使或者为展开翻译竞赛等原因造成的了，而是翻译活动本身所具有的翻译变异属性所引发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研究翻译，不能不涉及译作与原作的关系。翻译标准和原则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译作与原作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理解”（许钧，2002b）。以往在翻译研究中最关注的是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研究者们已经习惯了二者位置此消彼长的戏剧性变化。在对翻译变异进行适当的研究之后，我们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有了自己的定位，并且，翻译变异自身的连续性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对翻译变异的研究不仅可以解决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更进一步说明了目的语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以往翻译研究中所忽略或者没有仔细研究的一个环节。正是翻译变异串起了时间的链条，也成为目的语文本之间联系的纽带。

第一节　目的语文本、源语文本关系回顾

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之间关系问题一直是翻译研究者们所关注的。我们知道，对翻译阶段的划分是众说纷纭的，为了描述方便，我们根据斯坦纳对翻译历史四个阶段的划分为标准来探讨翻译问题。毫无疑问，每一个阶段都有各自对待翻译的态度和方式，每一个

阶段都有各自对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之间关系的理解。

1. 二者关系顺利开始：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主导地位交替出现

根据斯坦纳的划分，翻译历史是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的，古罗马文化是根据古希腊文化形成的，而古罗马的文献基本上都是翻译的。在分析古罗马翻译概念的时候，曾经有研究者根据相应的翻译方法划分出三种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关系层次。这些概念和方法是根据对语言相互关系的不同理解。第一种方法是“侵占”，也就是说，此时此刻译者化为一个“侵略者”形象向目的语文本进攻，而源语文本，确切地说即源语文本的内容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俘虏”，这个俘虏应该去适应新的生存条件。第二种方法是译者和作者的“竞争”，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的竞争。这种方法的目的是战胜作者和源语文本。这样，源语文本只能是被看作用译者的母语创造新文本的“灵感来源”。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译者依靠源语文本丰富了自己的母语。第三种方法直接来源于第二种。它也同样丰富了目的语，但是区别于前两种方法的是这不仅是占有内容，而且还把在翻译之前潜在于译语中的语言和审美能量释放出来。

可以见得，在古罗马的翻译理念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目的语文本，整个转换过程都是针对它的。源语文本只是出现新目的语文本的“刺激因素”，这个新目的语文本是完全独立的。我们说后来解构主义翻译观同样认为目的语文本是独立的，并且目的语文本要依靠源语文本存活的观点大概就源于此。

到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对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关系众说纷纭。在这一时期，英国诗人和翻译家德莱顿（Драйде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一方面认为译者不应该修缮源语文本（与罗马的“竞争”相比较），译者应该介绍源语文本原有的样子，而不是把它变得和自己很相像；另一方面，又尽量让罗马人把英语当成他们母语一样讲话，就像他们在英国的同一时代一样。因此，德雷顿所言对译者的要求是矛盾的：一方面不要违背于原作，另一方面，让作者说现代英国人说的话，也就是违背源语文本。这也是后来洪堡、施莱尔马赫、歌

德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所发现的翻译的两面性,也即认为翻译中的黄金分割点是不存在的。翻译永远是在两种翻译方法中做选择。在传统直译和意译翻译方法的基础上,德来顿提出了逐字译、意译和拟作三种翻译方法,并且他个人更崇尚意译。

这样一来,在翻译学漫长的第一阶段(18—19 世纪)里,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各自主导地位交替出现,并且伴随着相应的两种翻译策略,即后来所说的"归化"和"异化"。

2. 二者关系悲剧性发展:目的语文本"死了"

根据斯坦纳的观点,翻译学的第二个阶段是从泰特勒的《翻译原则随笔》和施莱尔马赫的《不同的翻译方法》两本著作开始。这也正是翻译理论诠释学派的开始。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如洪堡、施莱赫尔(Шлегель)等试图回答的是翻译现象的哲学问题。翻译研究者们感兴趣的不是"如何翻译"一部作品的翻译技术,而是关注"什么是翻译"这样一个哲学命题。从诠释学的角度研究翻译,是把翻译视为全球化哲学问题中的一个,即"理解"来研究。因此,正如斯坦纳所言,在这一时期,翻译研究发生了哲学转向,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成为探讨的焦点。相应地,不同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成为许多研究者们关注的对象,如洪堡、歌德、瓦雷里(П. Валери)、本雅明(В. Беньямин)等。正是他们伴随着这股哲学思潮为翻译追本溯源。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发现了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关系的悲剧性结局,它们悲剧性的关系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和译者语言意识之间关系的悲剧性特点。这一时期,有关死亡和消灭的主题贯穿于各种翻译言论中。例如,莫里茨(Г. Мориц)认为,翻译是"理解之死",施莱赫尔认为翻译是一场决斗:或者作者死,或者译者死等。

这种悲剧性的论断引起了人们对可译性问题的怀疑,归根结底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造成了这种怀疑的态度。翻译问题上升到语言哲学层面,不得不引发哲学家们的深思。然而,结果并非令人欣慰:语言的差异、语言内部形式的差异使翻译成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概念。"不同的语言之间没有概念上的和词语上的等值对应","目的语文本就是源语文本的代用品",类似的观点充斥着整个翻译理论界。洪

堡特别强调一种语言中无论哪一个词都不可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有绝对的等值物（如果不算那些表示纯物理客体的事物）。德国戏剧家（Ф. Геббель）在回答“为什么这么难翻译?”这个问题的时候说道：“问题在于不同语言的词语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才是完全覆盖的（意义上）。因为，每一个民族在称谓某种东西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从中找出对自己来说最主要的属性”。（Гюттингер，1970：478，笔者译）这种悲观主义的观点在西塞罗（Цицерон）和他的追随者以及德莱顿（Драйден）、多利（Э. Доле）或者路德（М. Лютер）那里都没有看到。

在这种悲剧色彩的笼罩下，翻译方法只能是二者择一，或者像一个了解译语的作者本人翻译那样翻译，或者像作者用作为他母语的译语写作那样翻译。而第三种妥协的、折中的方法，施莱尔马赫认为是不存在，也不可能的。在现代翻译理论中，这两种方法类似于韦努蒂（Венути）所提出的“归化和异化”。

总之，在翻译历时发展进程的第二个阶段对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关系的认识是：目的语文本原则上是不可能再现的，它和源语文本相比总是“死”的，译者陷入永远的痛苦中，他不可能达到与源语文本的完全对应。这是不可避免的语言事实。但是还有一点必须强调，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们在承认翻译是一个乌托邦式概念的同时，他们还强调翻译对母语发展的正面影响。翻译行为中的语言冲突相当于两个相互平等的语言单位相互渗透、相互磨合，其最终的结果是丰富了目的语。这一点似乎为目的语文本的悲剧性结局涂抹了一点英雄主义的色彩。比如洪堡在对待这问题的时候曾经指出“翻译是一种必需的文学类型，它的任务是扩大母语的含义和表现力”（Гюттингер，1970：485，笔者译）。

3. 二者关系平衡继续：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平起平坐

翻译学的第三阶段即是寻找规律性的语际对应关系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即对等。翻译的语言学流派中对等不仅仅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它还被确立为翻译的一个基本特征：正是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对应关系使我们可以把翻译与其他的元文本活动划分

开。因此，这个阶段里重要的问题是确立对等的标准。

翻译理论的语言学派最主要的特点是同语言学的同步发展。这一方面体现为语言学发展所取得的最新成果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另一方面语言学派的种类繁多也使翻译的语言学派纷纭。其中包括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美国结构学派、转换生成学派、交际理论派、功能学派以及苏联的语言学派等。如果按照时间来推算，最早提出对等概念的应该算是前苏联的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他在 1953 年的《翻译理论概要》一书中第一个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确切对等”的概念。从布拉格学派创始人雅格布森开始，对等概念成为语言学派永恒的话题。

费道罗夫提出了“确切对等”的概念，伦敦语言学派的卡特福德区分了“文本等值”和“形式对应”的概念，他们各自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翻译的本质在于确立“对等”关系。纽马克运用跨文化交际理论和语义理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著名的“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法，于 20 世纪 90 年代又提出了“关联翻译法”，强调对源语文本作者的忠实必须与对目的语文本读者的忠实相结合，二者相互统一。交际理论派重要代表人物奈达以圣经翻译为着眼点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理论，后来为避免人们误解他所认为的翻译不必考虑语言表达形式这一点，将动态对等改为功能对等，指出，翻译不但要求“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可以说，奈达的功能对等原作为处理语言差异提供宝贵的实践意义。对等理论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尤为盛行。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在此时诞生。功能学派的理论创始人赖斯的理论总体上是建立在对等理论基础上，认为翻译的实质是追求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的功能对等。赖斯的学生弗米尔突破了对等理论的限制，主张目的论，只将对等原作视作特定情况下采用的原则，必须依据翻译目的。苏联的巴尔胡达罗夫对等值关系的建立做了更为深入和具体的研究。他认为应该在 6 个层次上建立等值关系。而科米萨罗夫则更加突出翻译的语言学性质，认为必须从语法、语义、语用、修辞等各个方面来考察“等值”问题。

无论是卡特福德对功能等值的强调，还是奈达的“动态对等”或者“功能对等”，再到巴尔胡达罗夫对等值层次的独特论述，以及科米

萨罗夫从不同方面考虑等值问题，翻译理论语言学派的共同特点就是关注等值问题。由此出现了各种各样等值的类型和种类。这个阶段目的语文本是处于从属的位置，这一点从翻译的任务阐述中也可见一斑。上面我们提到的列茨盖尔的观点，他认为，译者的任务是用另一种语言的手段完整而确切地传达源语文本的内容，保留源语文本的修辞和情感特点（Рецкер，1974：7）。这个任务被认为是可以完成的，因为，虽然词的意义在不同的语言中不能有完全相对应的替代物，但是，代表源语文本内容的事物情景（предметная ситуация）以及文本的含义可以通过另一种语言的手段表达出来。

50—70 年代，翻译的语言学派占有统治地位。斯坦纳认为，尽管 70 年代开始出现了翻译的第二次哲学诠释学阶段，但是这个时期（70 年代）依然是翻译的语言学派占主流。在这个寻找规律性对应的阶段，语言学的发展使翻译理论的发展具有乐观主义的特性，正是对等概念的统治地位使得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终于能够平起平坐，不再使目的语文本因译者的过度“创造自由”而凌驾于源语文本之上，也不再使目的语文本因译者的过渡“亦步亦趋”而自卑于源语文本之下。

4. 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没有悲剧色彩

第一个将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文本关系作为研究问题提出来的是前捷克翻译学流派的代表列维（И. Левый）、米科（Ф. Мико）、波波维奇（А. Попович）（20 世纪 60—70 年代）。列维和波波维奇都是研究文学翻译的，他们都试图从捷克结构主义思想挖掘自己的翻译理论。在捷克结构主义思想代表人物中，穆卡尔朱夫斯基（Я. Мукаржовский）是最典型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自己的著作《艺术是符号事实》（«Искусство как сем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факт»）（1934）中确定了文学作品的特点，强调文学作品的“不可传达性”，他指出：

> “作品——是在感觉世界表现的，允许人们无限制理解的事物。但是文学作品也不能就完全确切地归结为这种事物，因为由于时空的重置，它有时会完全改变自己的面貌和自己的内部

结构……这些改变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如果我们把一部诗歌作品的很多译本拿来比较就很容易看出。”（Мукаржовкский Я，1994：191）

穆卡尔朱夫斯基认为文学事实（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факт）作为一个符号活动是变化多端和有生命力的，捷克翻译理论家们根据他的这种文学交际观开始系统研究文学翻译的方法，并且特别关注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之间的关系、作者和译者的关系等。尤其是波波维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如“目的语文本相对于其他文学文本来说是不是一种特殊的文本？如果是，那他的特点是什么？它在其他文本中是否有它的地位或者他代表着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Попович，1980：24）他在回答这类问题的时候用了很多诸如元交际（метакоммуникация）、翻译的元交际语境（мета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й контекст перевода）、元语言活动（метаязыков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元文学（металитература）、元文本（мета текст）等概念，建构了一系列“元”现象（метофеномен）。他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各个文本之间相互联系的不同方式类型学”。为此他把所有的文本分成原型文本（прототекст）和元文本（метатекст）。其中元文本是“原型文本的模型，是联系的产物，是两个文本之间互文不变量存在的方式”。（Попович，1980：184）

这位捷克学者制定的元文本类型学其目的是确定目的语文本在其他元文本中的地位。波波维奇强调，在“所有实现文学文本的方法中，目的语文本是最有利于原始交际人生命延长的依托。由此，当译者为把源语文本翻译成另外一种文学的时候，他会尽量避免损失自己的独特性”（Попович，1980：147）。为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合理分析原型文本（прототекст）（即源语文本），并创造性建构元文本（метатекст）（即目的语文本）。分析阶段非常重要，因为在解释源语文本的时候可能产生很多新的意想不到的结果。“我倒是很敢于确定，很少有哪个优秀的评论家会比一个优秀的译者更了解作品。”（Попович，1980：148）译者活动的第二个阶段和之前的分析活动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交际者（文本）符号的复杂性，并根据译者的创作才

能实现这种关系。

在体现作者对待原型文本所持的肯定或否定立场的时候，波波维奇使用了“确切”翻译（肯定关系）和“自由翻译”（否定关系）这两个概念，其中，自由翻译中包括了大量的解构成分在里面。根据这些关系，元文本分成“已证实文本”（аффирмативные）和“有争议文本”（контроверзные）。文本的第一种联系方式的显著特点是文本的机械式相似性，而第二种方式的特点是倾向于发展原型文本的总体特征而不是个别特征。根据波波维奇所言，目的语文本应该是一个没有悲剧色彩的文本，因为在这个文本中实现了与第一原始材料的相互证实联系（аффирматив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这种关系验证了目的语文本要受控于源语文本。总之，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的关系此时可以描述为一个文本和另一个文本的“证实联系”（аффирмаитивная связь）的典型模式。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关系在科学发展的这个阶段是一种没有悲剧色彩的关系，其中源语文本占主导地位。

5. 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译者死了

前文我们提到，在西欧翻译学中与翻译语言学派平行发展的还有另外一个分支，斯坦纳把它称作翻译的哲学转向，这一转向使翻译研究重又返回到了翻译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翻译哲学流派常常援引诸如海德格尔（Хайдеггер）、加达默尔（Гадамер）、德里达（Деррида）、福柯（Фуко）、巴尔特（Барт）的观点，我们说，正是他们确立了20世纪下半叶整个人文思想发展的方向。有很多哲学家自愿将翻译列入自己的研究视野。比如利科尔（Рикер）的《翻译类型学》等。西方翻译学中的哲学转向不是一蹴而就的，正是加达默尔的诠释学重新搭起了两代人学术思想的桥梁：施莱尔马赫-加达默尔-利科尔-斯坦纳。

在出现哲学转向的这个时代里，如同洪堡和施莱尔马赫时代一样，我们又重新听到了悲剧的声音，译者再一次被推向死亡：

“翻译的真正不幸在于，隐含在句子中的整体构思不可能通过另一种语言句子的相应成分来做简单的替换，那样译出来的作品通常是一个十足的怪物，也就是一堆字母，从这些字母中升华主要精神。”(Гадамер,1991: 59, 笔者译)

同时他还指出，翻译中不可避免地会失掉语言的某种属性：

“翻译中会损失语言独一无二的属性，即翻译中的任何一个词都会产生其他的词，语言中的任何一个词也会唤醒其他的词，产生新词，打开通向言语流的通道。一个译句，如果一位年高德劭的译者没有把句子变成我们无法发现的源语文本的句子，那么它也照样是图画和风景的区别。一个词有意义绝不仅仅是在一个体系中或者是在某种语境下，它自身在语境中的存在其实就足以推测：词永远不可能脱离它自身具有的多义性，即便是语境给它限定了一个含义。某一个词在某一个言语事件中所具有的含义不限于此时和此在的现有含义。”(Гадамер,1991: 59, 笔者译)

斯坦纳对翻译哲学观点研究最为详尽，主要是他著名“诠释学运动”的提出，这个观点的主要内容是指：翻译是译者阶段性的、渐渐对源语文本的渗透和占有活动。斯坦纳试图揭示译者和源语文本复杂关系的背景，包括信任的时刻，侵略性和在敌人的地盘为攫取“俘虏”(源语文本的含义)的干涉，以及一种复杂的将他语言和母语言结构“融合”的病态过程。此时此刻，我们又要重新在归化和异化之间作出选择。此时此刻，西塞罗翻译中的悖论又萦绕耳边：译文应该读起来像原文/译文应该读起来像译文。总之，在翻译研究诠释学派发展过程中，译者总是处于一个悲剧角色。

6. 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延续、发展、互补

阐释学派对翻译的本体论属性作出解释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应该清楚，与它并肩发展的还有另外一门哲学同样希望有自己对翻译的解释，对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关系的理解，这就是以本雅明、德里达和韦努蒂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翻译流派。

首先是本雅明，本雅明是解构主义的“先行者”。他的《译者的任务》写于1923年，其中心思想是要证实翻译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向读者传达源语文本的含义、源语文本的内容，更何况，译者根本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因为原文的内容和形式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形式改变的时候也就破坏了原来的有机统一，因此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是完全不同的。本雅明进一步指出，目的语文本是不需要为读者服务的，目的语文本自身存在着，由源语文本而生，但是源语文本也在目的语文本中生长。本雅明试图让人明白，他对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关系的讨论与传统（特别是语言学派）翻译学拥有着完全不同的基础。解构主义研究者们已经不再谈论那些传统地用来描述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关系的概念，诸如等值性、确切性、忠实性、等同性等，而是将二者之间的关系确立为派生的、有生命延续的关系，即目的语文本是由源语文本诞生出来的。但是，与其说是从源语文本中诞生出来，不如说是对源语文本生命的一种“体验”，因为目的语文本比源语文本诞生的晚，“原作的生命每一次都会在译作中得到更为完整的繁荣”。

其次是德里达，德里达举起解构主义的大旗重新阐释了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之间的关系。他将二者的关系概括为“共生”，即平等互补关系。德里达用“无限回归的意义链”来形容各种文本的关系，认为一切文本之间都是无限循环，一切文本都具有“互文性”，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这样一来，也就无所谓“原文”和“译文”的划分了。

后来，解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韦努蒂也提出了把译文看作译文、把译文看作有自己的独立性的理论依据。解构学派认为译作和原作的关系是一种延续和创生的关系，原文本因为经过翻译而赋予了新的意义，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因而，译本不是原作的附庸，而是它的再生。于是，译作根本无须忠实于原作（参见李文革，2004：311）。

总之，在解构学派看来，不同的语言在意义、句法和语音上的差异，构成各种不同的表意方式，而翻译正是要在这种“同”和“异”的纠结中正确地表现异（参见李文革，2004：311）。按照解构主义的观

点，翻译不是“求同”而应该“存异”。

第二节 目的语文本、源语文本关系新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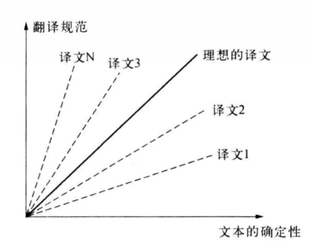
在对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关系回顾之后，我们对二者的关系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些观点基本可以概括为两大类型，一类是认为二者有关系，另一类是认为二者没有任何关系。第一类中又可以分为三种，一是认为源语文本占主导地位，二是认为目的语文本占主导地位，三是认为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处于平等地位。

我们首先肯定一点的是二者一定是有关系的，译文再走样也还是能发现原文的影子，否则，如果一点影子捕捉不到那基本可以算独立创作了。在承认二者有关系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问题。国内的学者对待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观点，除了和西方大抵相同的观点之外，有必要提及是许均和朱建平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对待这个问题上许均的观点是“译作与原作同源而不同一，译作在原作之后而不在其之下”（许钧，2002b）。“译作与原作同源而不同一。”所谓“源”，指的是“原作所意欲表现的世界”，它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如人性与神性、现实世界与超验世界、仿自然与超自然等因素，以及现实与感情，物质与精神等方面”。（同上，19）许钧指出，“译作与原作的关系中，最为本质的就是这种同源的指向。……译作与原作的同源性，确保了译作与原作不可能割裂的血缘关系”。因此，译者在建构原作特质的过程中，“要在打破语言层面的障碍时，透过原作的语言层面，指向原作意欲表现的世界”（参看许均，2002b）。

我们的观点与朱建平的观点相似，即承认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之间是有关系的，并且承认二者是一种既同又异，交叉互补的关系。但是，我们和朱建平观点稍显不同的是，翻译变异的介入，一方面将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的关系界定为既同又异的关系，同时，它还暗含着，不同目的语文本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正是靠具有连续属性的翻译变异组成一个链条，在翻译发展的漫长道路上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共同来为解释源语

文本做着不懈的努力。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同”正是突出翻译等值的传统论点,即无论译作的形式如何改变,我们总能找得到原文的影子,或者是形似、或者是神似,并且追求译作和原作完全的等值应该成为每一位翻译家的毕生追求,这同时也是前文我们提到的文本的确定性对翻译变异的制约所必然产生的“同”。其次,“异”正是考虑到翻译变异的特点,即无论译作和原作在多大层次上或者多大程度上与原文等值,我们仍然会因为文本的未定点的不同填充,译者的各种发挥、语言差异的无法抗拒以及文化差异的自然规律而完成形态迥异的目的语文本,不同目的语文本总是会出现斑斑点点或是形式,或是韵味,或是风格上的差异,这也是每一位翻译家自身所不能超越的翻译的局限。那么,翻译家该如何是好? 前文所提到的翻译对等和翻译变异的相互转化让译者的肩膀轻松了许多。也就是说,我们不否认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的“异”,更追求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的“同”,我们将二者统一起来追求建立在翻译变异基础上的翻译等同。这样一来,二者的关系可以用坐标轴来表示:



在这个坐标轴中纵向轴代表翻译规范,横向轴代表文本的确定性,中间的一条实线代表“理想的译文”,在这两个轴线之间的范围内所有不和实线重合的虚线代表一部原著的不同翻译变异形式。这些翻译变异的集合构成了一部部优秀的作品。译作和原作的关系就是

无限接近、无限相似，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是不能用“实线”联结的相“异”之处。这样，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只能是一种既同又异的关系，翻译变异在无限接近翻译对等的范围内摇摆，我们世世代代所得出的各种译本也都是与原作在某一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谈到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关系的问题时，我们回忆起前文谈到翻译变异属性的时候详细论述的翻译变异的连续性问题。翻译变异的连续性用来解释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之间的关系再恰当不过了。我们知道，将变异引入翻译研究领域实际上就隐藏着将连续性放入研究机制中来。翻译变异的连续性和翻译变异的相关性、历史性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一部部崭新译作的形成。正是有了历史的变迁，加之不同翻译变异的不断更替，才使得翻译变异形成一个连续的时间“流”，它并没有凸显在人们的视线里，却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翻译活动的长河中流动。我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它的的确确存在。研究翻译变异就是要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清它的存在。在这样一条隐形的时间“流”中，各种译作如一条链锁上的各个结点一样形成一条“意义”链。每一部译作在每一个节点上发挥着自己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不同的译作有它自身存在价值的重要原因。翻译变异不应该是将源语文本彻底否定，或者抛开源语文本另起炉灶，它应该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有机整体。不同的译作就在这样一种无限循环的关系中彼此相互补充、相互交叉，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程度对源语文本做着无休止的阐释。这一点我们在谈到翻译变异规范性制约的时候也曾经说过，翻译规范因为其自身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因素深深制约着翻译变异。译者在不同翻译规范的限制下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译本。我们说翻译规范概念还有一点值得强调的是把一部作品不同的译文看作一个连贯的“译文库”，译文之间的关系可以描述为彼此相似但又有异的译文集合，不同的译文是在不同译者笔下，受到不同规范的限制，使用不同的语言，跨越不同的文化，受到源语的激发，从不同的角度对文本进行不同程度翻译变异的结果。我们仍以Лермонтов 的«Парус»为例：

Белеет парус одинокий

В тумане моря голубом!...
Что ищет он в стране далекой?
Что кинул он в краю родном?...
Играют волны-ветер свищет.
И мачта гнется и скрыпит ...
Увы! Он счастия не бежит!
И не от считсия бежит!
Под ним струя светлей лазури,
Над ним луч солнца золотой ...
А он, мятежный, просит бури,
Как будто в бурях есть покой!

译文1：**帆**

在大海底深蓝色的浓雾里，
一只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
它在寻求什么，在遥远的异地？
它抛下了什么，在可爱的故乡？……
波涛在汹涌着，海风在呼啸着，
桅杆弓起腰来发出轧轧的声响，
唉，——它不是在寻求幸福，
它也不是在逃避幸福！——
它下面是澄清的碧色底水流，
它上面是黄金色的阳光——
而它，不安的，在祈求着风暴，
仿佛是在风暴中才有安祥！

译文2：**帆**

蔚蓝的海面薄雾茫茫，
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
它到遥远的异邦寻求什么？
它把什么抛弃在故乡？……
呼啸的海风翻卷着波浪，

桅杆弓着身子嘎吱作响，
哦，这不是在寻求幸福，
也不是躲避幸福的远航！
船下涌过清澈的碧流，
船上洒满金色的阳光，
不安分的帆儿却祈求风暴，
仿佛平静就在风暴中蕴藏！

译文3：**帆**
在大海的蒙蒙青雾上，
有一叶孤帆闪着白光。
它是在远方寻求什么？
它把什么遗弃在故乡？
风声急急，浪花涌起，
桅杆弯着腰声声喘息…
啊，——它既不是寻求，
也不是在把幸福逃避！
帆下，水流比蓝天清亮，
帆上，一线金色的阳光……
而叛逆的帆呼唤着风暴，
仿佛风暴中才有着安详。

（飞白译）

译文4：**帆**
在那大海上淡蓝色的云雾里
有一片孤帆儿在闪耀着白光地！
它寻求什么，在遥远的异地？
它抛下什么，在可爱的故乡？
波涛在汹涌——海风在呼啸，
桅杆弓起了腰身轧轧地作响，
唉！它不是在寻求什么幸福，
也不是逃避幸福而奔向他方！

下面是比蓝天还清澄的碧波，
上面是金黄色的灿烂的阳光，
而它，不安地，在祈求风暴.
仿佛是在风暴中才有着安详！

（于振译）

译文5：**帆**
蔚蓝的海面雾霭茫茫，
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
它到遥远的异地找什么？
它把什么抛弃在故乡？……
呼啸的海风翻卷着波浪，
桅杆弓着身在嘎吱作响……
唉！它不是要寻找幸福，
也不是逃离幸福的乐疆！
下面涌着清澈的碧流，
上面洒着金色的阳光……
不安分的帆儿却祈求风暴，
仿佛风暴里有宁静之邦！

（顾蕴璞译）

在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莱蒙托夫佳作中，诗人为表现孤独和自由主题塑造了孤帆这一诗歌意象，它漂浮于大海，祈求着风暴，表达了诗人内心那股冲破牢笼的强烈渴望。上面我们所列举的五个译本从整体来看各具特色，其中于振的译本对仗工整，朗朗上口，飞白的译本诗意浓浓，回味无穷，尤其是最后两句“而叛逆的帆呼唤着风暴，仿佛风暴中才有着安详”甚至成为经典被广为传颂，而顾蕴璞的译本中“乐疆、祈求、宁静之邦”的用语使整部译作文气十足。从细部来看，对于文本中很多潜在的未定点和空白处填充手段互不相同，比如对于“雾”这个意象，不同的译者具体化的方式不一样：到底是“浓雾”？“薄雾”？“青雾”？“云雾”？“雾霭”？在处理“帆”这个意象的时候，只有飞白的译本翻译成“叛逆的帆儿呼唤着风暴”，其他基本

都是“不安的”“帆儿”“祈求着风暴”,我们似乎能够感觉到飞白对这叶孤舟那种强烈骚动的情绪,如此见出译者对这个形象更加入木三分的体验,或者说他正是希望通过自己对源语文本未定点和空白处填充的结果激发读者更多的深思。总之,不同译者脑海中帆的形象或者那幅“海面飞帆”的图景是各有千秋的。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知道是有一叶孤舟在海面上迎着风暴前行,无论译本有多么不同,它们都是通过源语文本意象的激发而产生的联想,它们拥有同一个激发源,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文本的确定性保证了译本和源语文本不会没有相似之处。因此说所有的译本都是在和源语文本有相似之处的基础上,对源语文本从不同角度填充,进而得出彼此有异的目的语文本,所有的目的语文本组成一个集合对源语文本作着不同程度的阐释。

总之,我们坚信,翻译变异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它势必在翻译活动的历史长河中伴随着翻译对等一同成长并与之相互转化。我们要认清它在翻译活动所扮演的角色,合理公正地对待各种翻译变异。对译者翻译行为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我们还要努力从不同的角度去不断地丰富源语文本。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求每一部作品必须有若干个译本同时存在,但我们必须清楚,每部作品都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翻译变异形式,只是目前尚没有付诸文字形式而已。

结束语

翻译活动不止，翻译研究不休。我们的研究在日臻完善的翻译理论建构中到底有什么价值？换句话说，本论文的研究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

我们认为，本书的主要贡献和独特之处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生物变异规律纳入到翻译研究之中，提出翻译变异的概念。

达尔文的生物变异原理以其巨大的理论功力影响着人类发展的各个领域，翻译研究也不例外。本书通过引用生物变异相关规律对翻译理论中一直被忽略的翻译变异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第二，研究指出翻译变异具有生物变异一样的各种属性：相关性、历史性、连续性。

研究认为翻译变异的相关性体现在把文本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时候，翻译过程中无论是形式、结构或者内容上的改变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的诸如风格、韵味等的相关变异。翻译变异的历史性体现在，翻译变异蕴涵着时间的概念，它可以把跨越几百年甚至几个世纪的翻译活动用时间的链条串在一起，避免孤立地看待翻译活动。翻译变异的连续性体现在各种翻译现象并不是孤立、杂乱无章的，它们彼此之间或多或少都可以找到某些相互联系的地方，这些翻译变异虽然并存，不互相排斥，但它们在特定历史阶段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却不完全相同。

第三，提出翻译变异和翻译对等相互转化的新型关系。

通过对翻译变异的界定到翻译变异的成因，再到翻译变异的限制等，我们为翻译变异在翻译理论中的地位正名。在探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翻译变异与翻译对等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进而提出翻译变异和翻译对等相互转化的关系。我们认为，翻译对等和翻译变异

是不可分割的，翻译变异有利于翻译对等，翻译对等只能存在于翻译变异之中。人们对文本的翻译必然是多样的，但每一种翻译都在自己的视野中看到了文本自身的一些方面，忽略了另一些方面。每一种翻译变异都是在保证一种等值情况下采取的必要的表达手段，那么势必在另一种等值层次上有所欠缺。每一种翻译变异都是不完全的，但每一种翻译变异都这样或那样地表现着原文文本自身，都达到了译者与文本的一定的融合。

第四，对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做了梳理。

通过总结翻译历史上二者关系的发展历程提出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之间应该是既同又异的关系，并且“同”正是突出翻译对等的必要性，“异”正是考虑到翻译变异的显著特征。除此之外，由于翻译变异自身所具有的连续性，正是它将不同的目的语文本之间联系起来组成一个时间的链条，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对源语文本做着无休止的阐释。

当然，本研究只是通过几个章节粗略地勾勒出翻译变异的雏形，试图通过翻译变异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翻译活动的本质。但由于水平、精力和时间等因素的限制，我们的研究还稍显粗糙和不够成熟。若使研究做到真正的全面、概括和相对准确恐怕只能假以时日，留待日后了。

参 考 文 献

(一) 外文参考

[1] Nida, E. 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3.

[2]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В. Другость: герменевтические указатели и границы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2002. №6. с. 78 – 102.

[3] Анатольевна С. Л.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и экстра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вариативности перевода.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к. ф. н. М. 1997.

[4] Бархударов Л. С. Язык и перевод. Вопросы общей и частной теории перевода. 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75.

[5] Беньямин В. Задача переводчика.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 переводу « Парижских картин »Бодлера. http://wwh. nsys. by: 8101\klinamen\fila10. html.

[6] Бродович О. И. Вариативность перевода и категория 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и. //Материалы XXVIII Межвузовской научно-метод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й и аспирантов: Вып. 5.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и перевода. С-Петербург: СПбГУ, 1999. с. 10 – 13.

[7] Ванников Ю. В. Проблемы адекватности перевода. Типы адекватности, виды перевода и переводче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 Текст и перевод. / Отв. ред. А. Д. Швейцер. М. ,1988, с. 34 – 39.

[8] Вербицкая М. В. Теория вторичных текстов: Автореф. дис ... д-ра филол. наук. М. 2000.

[9] 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 перевода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М. Междунар. отношение. 1978.

[10] Гадамер Х. -Г. Д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и герменевтика // Герменевтика и д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 Под ред. ШтегмайераВ. ФранкаХ. Маркова Б. В. СПб. 1999.

[11] Гадамер Х. -Г.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прекрасного.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91.
[12] Гадамер Х. -Г. Текст и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Герменевтика и д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СПб. 1999. с. 202 – 242.
[13] Гак В. Г. , Григорьев Б. Б.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перевода: Французский язык. М. Интердиалект + . 1997.
[14] Гарбовский Н. К. Вариантные формы фонетического и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го уровней в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й речи моряков //Вопросы систем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ечи: Сб. статей /Под ред. Н. К. Гарбовского. М. Изд-во МГУ. 1987. с. 123 – 129.
[15] Гербель Н.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В кн. : Лирическ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Шиллера в переводах русских поэтов. т. 1. 2. СПб. 1857.
[16] Гинзбург Л. В. «Разбилось лишь сердце мое ...» М.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83.
[17] Гюттингер Ф. Разговор цитат // Мастерство перевода. М.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70.
[18] Гумбольдт В. фон. Язык и философия культуры. М. Прогресс. 1985.
[19] Деррида Ж. Письмо и различие. СПб.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2000.
[20] Егер Г.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ая и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ая 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ь// 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 перевода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М. Междунар. отношения. 1978. с. 137 – 156.
[21] Игоревна С. А. Адекватность и вариативность перевода морских и военных терминов 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м тексте. Дис ... к. филол. наук. Москва. 2002.
[22] Комиссаров В. Н. Общая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М. ЧеРо. 1999.
[23] Комиссаров В. Н.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е. М. ЭСТ. 1990.
[24] Комиссаров В. Н.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90.
[25] Комлев Н. Г. Слово, денотация и картина мира//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81. №11. с. 25 – 37.
[26] Латышев Л. К. Курс перевода: 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ь перевода и способы её достиже-ния. 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81.
[27] Латышев Л. К. Технология перевода. М. НВИ-Тезаурус. 2000.
[28] Левин Ю. Д. К вопросу о переводной множественности. //Классическое

наследие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81.
[29] Левый И. Искусство перевода. М. Прогресс. 1974.
[30] Меликян А. Перевод как система доязыковых различий. http://wwh.nsys.by:8101\klinamen\fila9.html.
[31] Миньяр-Белоручев Р. К. Теория и методы перевода. М. 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цей. 1996.
[32] Мукаржовский 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эстетике и теории искусства.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94.
[33] Мурзин Л. Н. Язык, текст и культура. //Человек-текст-культура: Коллект. монография.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1994. с. 160 – 169.
[34] Нестерова Н. М. Перевод как « генератор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х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е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е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е. Вып. 4. Материалы IV Междунар. науч. конф. по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ю «Федоровские чтения» /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гос. ун-т. 24 – 26. окт. 2002. г. СПб. 2003. с. 251 – 256.
[35] Никольский Б. Л. Понятие инварианта и варианта в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ке // Вариантность как свойство языковой системы: Тез. докл. М. 1987. Т. 2.
[36] Попович А. Проблемы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 М. Высш. шк. 1980.
[37] Потебня А. А. Мысль и язык. //Потебня А. А. Слово и миф. М. Правда. 1989. с. 17 – 200.
[38] Рецкер Я. И.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и переводческая практика. 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74.
[39] Седельников И. И. Вариативность языковых средств в переводе: Автореф. Дис ... филол. наук. М. 1987.
[40] Сулейменова Э. Д. Понятие смысл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Алма-Ата. 1989.
[41] Топер П. М. Перевод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Крат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 1968, т. 5.
[42] Топер П. М. Перевод в системе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я. М. Наследие. 2000.
[43] Толстой Л. Н.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2.
[44] Федоров А. В. 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орию перевода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М. изд-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ин. яз. 1953.
[45] Федоров А. В. Основы общей теории перевода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3.
[46] Фуко М. Слово и вещи. Археология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 СПб. 1994.
[47] Цвилиинг М. Я. Качество перевода научно технических текстов и проблема выбора эквивалента//Тетради переводчики. №23.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9. с. 102 – 112.
[48] Цвиллинг М. Я. Поливариантность перевода как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и методиче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Научный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текст. М. Наука. 1991. с 179 – 193.
[49] Чернов Г. В. Чем текст перевода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оригинального текста// Переводи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отв. ред-ры: Швейцер А. Д. Рябцева Н. К., Василевич А. П. М. ИЯзРАН 1997. с. 102 – 117.
[50] Швейцер А. Д. Вариативность языковой нормы в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м и социальном аспектах. //Сб. научн. Трудов МГПИИЯ им. М. Тореза/ Вып. 73. М. 1973. с. 94.
[51] Швейцер А. Д.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ка: Теория, проблемы, методы. М. 1976.
[52] Швейцер А. Д.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Статус, проблемы, аспекты. М. Наука. 1988.
[53] Шлейермахер Ф. О разных методах перевода//Вестник Моск. ун-та. Сер. 9. Филология. 2000. №2. с. 127 – 145.
[54] Якобсон Р. О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аспектах перевода//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 перевода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М. Междунар. отношения. 1978. с. 16 – 25.
[55] Ярцева В. Н. Проблемы вариативности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уровней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языка//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83. №5.
[56] Ярцева В. Н. Проблемы языкового варьирова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Языки мира: проблемы языковой вариативности. М. 1990.

(二) 中文参考

[57] 北岛. 时间的玫瑰[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58] 毕黎. 达尔文回忆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59] 卞建华. 文学翻译批评中运用文学接受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1).
[60] 蔡新乐. 从德里达的翻译思想看理性主义的翻译理论建构[J]. 中国翻译,2001.(4).

[61] 蔡新乐.论翻译过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1).
[62] 蔡毅,段京华.苏联翻译理论[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63] 蔡毅.关于翻译理论中的几个基本概念问题[J].中国俄语教学,2003.(3).
[64] 蔡毅.关于国外翻译理论的三大核心概念——翻译的实质、可译性和等值[J].中国翻译,1995.(6).
[65]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66] 草婴.略谈文学翻译[A].耿龙明主编.翻译论丛[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67] 草婴译.安娜·卡列尼娜[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68] 常敬宇.汉语词汇与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69] 陈波.奎因哲学研究——从逻辑和语言的观点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70] 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71]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72] 陈肇明.1997.说"翻译难"[A].许钧.翻译思考录[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73] 程义伟,李春林.鲁迅与果戈理的《死魂灵》[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6).
[74] 杜杉伞译.文化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75] 费孝通等.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76] 冯玉律.思维方式、词语和翻译[A].外语与文化研究(第一辑)[J].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77] 伽达默尔.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下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78] 耿济之译.卡拉马助夫兄弟们[Z].上海: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
[79] 耿济之译.卡拉马佐夫兄弟 [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0] 龚鹏程.文化符号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1] 辜正坤.1989.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A].杨自俭,刘学云.翻译新论[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82] 辜正坤.当代翻译学建构理路略论——《文学翻译学》序[J].中国翻译,2001.(1).
[83] 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外国语,1998.(2).

[84] 郭建中. 汉译英的翻译单位问题[J]. 外国语,2001.(6).
[85] 郭建中编著.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86] 韩江洪,张柏然. 国外翻译规范研究综述[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2).
[87] 韩子满. 文学翻译中的杂合现象[D]. 洛阳: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2002.
[88] 贺麟. 1925. 严复的翻译[A]. 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4.
[89] 洪汉鼎. 理解的真理——解读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90] 洪汉鼎. 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C]. 北京: 东方出版社,2001.
[91] 侯向群. 接受理论与翻译探索[J]. 山东外语教学,1994. (1).
[92] 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93] 胡谷明. 篇章修辞与小说翻译[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94] 黄国文. 语篇分析概要[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95] 黄忠廉. 变译理论[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96] 黄忠廉. 翻译变体研究[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97] 季红真译. 简明文化人类学[M]. 北京: 作家出版社,1987.
[98] 加切奇拉泽,蔡毅,虞杰. 文艺翻译与文学交流[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
[99] 蒋骁华. 近十年来的西方翻译理论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8.(2).
[100] 金隄. 等效翻译探索[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101] 金元浦. 接受反应文论[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102] 卡特福德. 翻译的语言学理论[M].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
[103] 孔慧怡. 翻译·文学·文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04] 孔慧怡. 译诗应否用韵的几点考虑[J]. 外国语,1997.(4).
[105] 奎因. 江天骥等译. 从逻辑的观点看[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53.
[106] 拉波夫(W. Labov). 在社会环境里研究语言[A]. 语言学译丛(第一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107] 莱曼 WP(美)编著. 描写语言学引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
[108] 李德超. 传统翻译观念的逾越. 彻斯特曼的翻译规范论[J]. 外国语,2004.(4).
[109] 李磊荣. 论民族文化的可译性[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2004.
[110] 李文革. 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11] 力冈译. 安娜·卡列尼娜 [Z].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112] 连淑能. 论中西思维方式[A]. 顾嘉祖、陆昇主编. 语言与文化[C].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113] 连淑能. 英汉对比研究[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114] 廖七一等. 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115] 刘光准,黄素华. 俄汉语言文化习俗探索[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116] 刘禾. 跨文化研究的语言问题[A]. 许宝强、袁伟选编.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C].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17] 刘宓庆. 翻译与语言哲学[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118] 刘宓庆. 文化翻译论纲[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119] 刘勰. 文心雕龙·知音. 宇文所安. 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 [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120] 鲁迅. 1927.《绛洞花主》小引[A]. 鲁迅. 集外集拾遗补编[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121] 鲁迅.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一)[A]. 鲁迅全集: 第 6 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22] 陆卓元,萨丕尔著. 语言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4.

[123] 吕斌. 文化进化导论[M]. 上海: 学林出版社,1994.

[124] 吕俊. 对翻译学构建中几个问题的思考[J]. 中国翻译,2001a. (4).

[125] 吕俊. 翻译: 从文本出发——对等效翻译论的反思[J]. 外国语,1998. (3).

[126] 吕俊. 结构·解构·建构——我国翻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中国翻译,2001b. (6).

[127] 吕俊. 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c.

[128] 钮菊生. 从汉语看俄语无等值词汇的可译性问题[A]. 王福祥,吴汉樱编. 文化与语言[C]. 北京: 外语与教学出版社,1994.

[129] 潘文国. 汉英语对比纲要[M].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130] 彭增安. 语用·修辞·文化[M]. 上海: 学林出版社,1998.

[131] 戚杉. 达尔文及其进化学说[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132] 钱锺书.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A]. 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C].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

[133] 钱锺书. 管锥篇[M]. 北京: 中华书局,1979.

[134] 汝龙译. 罪与罚 [Z]. 南京: 译林出版社,1992.
[135] 沈苏儒. 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8.
[136] 思果. 功夫在诗外: 翻译偶谈[M].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
[137] 孙会军. 普遍与差异[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138] 收获[J]. 上海:《收获》文学杂志社,2001. (6).
[139]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1.
[140] 谭载喜. 新编奈达论翻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141] 田德蓓. 译者的身份[A]. 谢天振主编. 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C].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142] 田全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D]. 上海: 复旦大学,2003.
[143] 王秉钦. 文化翻译学[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144] 王宏印,刘士聪. 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诠释[A]. 杨自俭主编. 译学新探[C]青岛: 青岛出版社,2002.
[145] 王克非. 翻译文化——21 世纪译学研究课题之一[A]. 张柏然,许钧. 面向 21 世纪的译学研究[C].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2.
[146] 王克非. 翻译文化史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b.
[147] 王克非. 关于翻译本质的认识[J]. 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a. (4).
[148] 王文斌. 从两首唐诗的不同英译看文学翻译中的未定性和具体化[J]. 中国翻译,2001b. (2).
[149] 王文斌. 论译者在文学翻译中主体作用的必然性[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a. (2).
[150] 王岳川. 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151] 韦丛芜译. 罪与罚[Z]. 上海: 正中书局,1947.
[152] 吴国华. 俄语与俄罗斯文化[M].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0.
[153] 吴克礼主编. 文化学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154] 吴议诚. 关于翻译学论争的思考[J]. 外国语,1997. (5).
[155] 伍蠡甫. 现代西方文论选[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156] 谢天振. 译介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157] 谢天振主编. 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158] 徐通锵. 历时语言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1.
[159] 徐通锵. 语言变异研究和语言研究方法论的转折: (上)[J]. 语文研究,1987.

[160] 许钧. 1997. 怎一个"信"字了得——需要解释的翻译现象[A]. 许钧. 翻译思考录[C].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161] 许钧. 翻译思考录[C].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162] 许钧. 试论译作与原作的关系[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b. (1).
[163] 许钧,袁筱一等. 当代法国翻译理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164] 许钧. 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共鸣与视界融合——文本再创造的个案批评[J]. 中国翻译,2002a. (3).
[165] 许苏民. 文化哲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66] 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167] 许渊冲,谈重译. 外语与外语教学[J]. 1996(6).
[168] 杨仕章. 文化翻译论略[M]. 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2003.
[169] 杨武能. 阐释、接受与再创造的循环[J]. 中国翻译,1987. (6).
[170] 姚斯,霍拉勃,周宁,金元浦译.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171] 易芳. 初探文学翻译的变异现象[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2002.
[172] 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布龙菲尔德著. 语言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0.
[173] 袁莉. 关于翻译主体研究的构想[A]. 张柏然,许钧.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译学研究[C].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2.
[174] 张柏然,姜秋霞. 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J]. 中国翻译,1997. (2).
[175] 张春柏. 从语言哲学到翻译的功能——关于等值翻译理论的一点思考[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4).
[176] 张隆溪.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177] 张南峰. 特性与共性——论中国翻译学与翻译学的关系[J]. 中国翻译,2000. (2).
[178] 张廷琛. 接受理论[C].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
[179] 赵爱国. 语言个性理论及其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 (12).
[180] 智量译. 安娜·卡列尼娜[Z]. 南京: 译林出版社,1996.
[181] 周扬,谢素台译安娜·卡列尼娜[Z].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182] 朱纯深. 走出误区,踏进世界——中国译学: 反思与前瞻[J]. 中国翻译,2000. (1).
[183] 朱健平. 对翻译研究流派的分类考察[J]. 外语教学,2004. (1).

[184] 朱健平.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J].上海科技翻译,2002.(1).
[185]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C].上海：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1997.
[186] 朱文叔编.初中语文读本[C].第1册,1933.
[187] 郑泽生,耿龙明主编.俄汉翻译教程(上、下)[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三) 工具书

[188]《俄汉详解大词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89]《翻译研究词典》,谭载喜主译,王克非校,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190]《汉俄辞典》(修订本),上海外国语学院《汉俄词典》编写组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191]《现代俄汉双解词典》,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
[192]《现代汉语词典》增补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93]《俄汉文学翻译词典》,龚人放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94]《译学辞典》,方梦之主编,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